

# 红旗

HONGQI

17-18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合刊 ★

## 目 录

-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安子文 (1)
- 通讯: 评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张启勋 (14)
- 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檜、贊成投降、  
 詆毀主战派的.....金应熙 (21)
- 学习列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  
 ——讀《国家与革命》的体会.....黄宗汉 (25)
- 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課題 .....徐非光 (35)
- 反面教材不可不讀 .....陈展超 (37)
- 評介三本經濟史料书..... (40)
-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民族工业的命运 .....王 城 (41)
- 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沙为众 (44)
- 私营商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調查 .....徐道河 (47)
- 实用主义經驗論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汝 信 (50)

☆ 九月二十三日出版 ☆



#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安子文

## 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意义

最近期间，各级党委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都曾经着重地提出过造就新干部、培养新干部的问题。过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在干部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现在，毛泽东同志又向全党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较之过去，具有更加伟大的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又红又专的新人材。这是很清楚的。老的革命者总是要交班的，需要有革命的接班人。这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仅仅从一般意义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确保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认识它的重大意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由于在接班人上出了问题，使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者手中，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挫折，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其中，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出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一次是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两次，危害最大，教训最深。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欧洲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别，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蒲鲁东派和巴枯宁派，在工人中的影响，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得多。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才赢得了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分子的拥护。当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以后，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意识到，要公开打起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义，已经很困难了。列宁指出：“过去，欧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总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而现在却往往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sup>①</sup>这就是说，露骨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市场已经缩小了。因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改变斗争策略，转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觉察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露出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苗头，并且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能不有所顾忌，一般地说，他们的活动是比较隐蔽的。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负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使运动继续前进。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党的著名领袖伯恩斯坦，便公然打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随后，德国党的另一个著名领袖考茨基，也转上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某些领导人，没有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没有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斗争。他们对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完全失去了警惕性。加之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和平发展时期，盲目崇拜合法运动、迷信议会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正在党内泛滥。所以，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就不仅篡夺了德国党的领导权，而且还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望，把持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大力推行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帝国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革命形势大好的紧要关头，他们完全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国主义的压力，出卖和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发动世界大战的帮凶。结果，第二国际完全破产，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也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了。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彻底粉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妄图利用列宁逝世的机会，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及时地识破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观点，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捍卫了列宁主义，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继续掌握在忠于列宁事业的布尔什维克手里。由于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

<sup>①</sup>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2页。



争取得巨大的胜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开的阶级斗争转为曲折隐蔽的形式了。同这种变化相适应，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也不再采取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党内建立反对派、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办法了。他们装成忠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样子，口头上表示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长期潜伏在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由这样一小撮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组成的。他们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就一步一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践踏列宁和斯大林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篡改列宁的革命学说，力图改变苏联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又利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不择手段地在国际上兜售共修正主义路线，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就使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在世界革命运动内部起了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给帝国主义帮了大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次大反复表明，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政党也是一分为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就一定会有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修正主义的派别；有修正主义的政党，也一定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总是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由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掌握革命领导权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自从世界上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以来就是这样。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必然反映。

任何时候，像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总是极少数。要革命的人，总是多数。那些极少数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之所以能够得势，就是因为利用多数人对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面目辨别不清，对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丧失了警惕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次大反复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善于识别哪些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哪些人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特别慎重地挑选和培养革命接班人，把领导革命的责任交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防止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篡夺领导权。要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容易的。把人看错了，是常有的事。一旦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许多人由于平时毫无察觉而感到十分突然，也是常有的事。接受这些教训，不仅领导上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更重要的是要对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进行教育，使大家具有这种警惕性，具有识别和抵制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一切暗藏敌人的力量。形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力量，才有可能使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藏身之地；即使能够暂时隐蔽，一旦露出头来，就会被大家识破，并遭到抵制。如果



对于各种各样的敌人不加警惕，不以极大的努力来培养革命接班人，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专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会瓦解变质，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这样，历史就会大倒退，革命就得重来。

半个世纪以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这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修正主义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呢？不，它同样是有阶级根源的。铁托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论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论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都必须同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除了采用暴力手段以外，还实行“和平演变”的办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进行渗透，企图腐蚀和溶化我国国内某些不坚定的分子。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企图用修正主义思想来败坏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国内的阶级敌人，改头换面，混进共产党内，混进国家机关，搞反革命的两面手法，运用合法手段，同我们进行斗争。人们记得，一九二一年，俄国白卫分子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反革命暴乱时，曾经提出一个阴险的口号：“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他们挂着“拥护苏维埃”的招牌，只是不要共产党，这在一部分人中间是会产生欺骗作用的。现在，阶级敌人更进一步了，他们不仅“拥护苏维埃”，而且也“要共产党”。他们企图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挂起人民政府的招牌，篡夺某些单位的党政大权，实行反革命的政策，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这种手段，较之俄国白卫分子的手段，更加阴险毒辣，欺骗作用更大。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一切野心家篡夺领导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青年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欺骗青年，讨好青年，在青年中散布资产阶级影响，把一部分青年拉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也特别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年青一代的蜕化变质上面。这一点，他们是并不隐瞒的。

国内的阶级敌人看到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就认为自己也出头有日了。他们根据历史发展中的暂时逆流来替中国算命，说什么“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他们说：“掌握了青年，就可以夺回江山。”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子女灌输反动思想，要他们的子女继承资本主义、封建



主义的衣鉢；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腐蝕和毒害我們的革命干部和广大青年，力图挖社会主义的牆脚，栽修正主义的根子。一句話，他們在和我們爭奪接班人的斗争中，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国外的階級敌人也在打同样的算盘。他們很懂得，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当代的久經考驗的革命者身上是注定要落空的，于是，便想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找出路。臭名远揚的杜勒斯說，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是可能的，“从几百年来說那是絕對肯定的。这大概是几十年的事”<sup>①</sup>。美帝国主义的謀士李普曼也說：“瞻望将来，我們在模糊的远景中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我們可能看到共产党中国最終（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演变成为类似今天的俄国的国家”<sup>②</sup>。

国内外的階級敌人說的和做的已經是这样的明明白白，我們的接班人問題，正是他們注意的一个焦点。

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修正主义的教訓，就好办了。看到国内外的敌人在打什么主意，就好办了。我們就可以采取正确的措施。

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分析和总结了历史的教訓，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階級斗争的形势，在提出了正确的路綫和政策的同时，十分尖銳地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問題，指导我們在新的階級斗争的条件下提高警惕，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好革命接班人，保证永远革命下去，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建設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也是一項长期的任务。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是有可能通过一代革命者的努力来实现的；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就非通过許多代革命者的坚持不懈的奋斗不可。在培养接班人的問題上，必須高瞻远瞩，起碼要看五代、十代。培养接班人是千年万代的大事，最要紧的，是要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革命走回头路。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好，是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重要的組織保证。

## 二、革命接班人必須具备的条件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須具备哪些条件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們必須：第一，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絕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

<sup>①</sup> 杜勒斯 1958 年 10 月 28 日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

<sup>②</sup> 李普曼 1964 年 4 月 10 日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发表的文章。





者。第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五个条件，是选拔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它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出发来制定的，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这些条件又同当时的革命任务相适应，而具有不同的具体的内容。

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考察干部，主要是通过他在这些革命斗争中的觉悟和表现。在社会主义时期，考察干部，则必须看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那一边；是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个人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即使他的资格再老，党龄再长，功劳再大也不行。有的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在当时是一个好干部。但是，到了新的革命阶段，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继续改造自己的自觉性，因而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了。这样的干部，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就不能再称为好干部，就不能成为好的接班人。

在当前革命阶段上，应当怎样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呢？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言行一致，不仅在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在四十多年中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传下去，一直传给子孙万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接过来。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好干部，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种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例如，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却不对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甚至宣扬阶级调和论；口头上拥护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却支持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口头上拥护革命的辩证法，实际上宣传“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口头上拥护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实际上却在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涂脂抹粉；口头上拥护历史唯物论，实际上拒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等等，诸如此类的人，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心全意地为本国的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一切劳动人民。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和从事一切斗争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为大多数人服务，就是站在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这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这一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积极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的干部只有坚决搞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不支持群众搞社会主义，就不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而是站在少数人一边，像赫鲁晓夫那样站在百分之几的人一边。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触犯了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利益，或者他的亲戚朋友的利益时，他就袒护剥削阶级家庭，包庇亲朋好友，这个时候，在这种问题上，实际上他就站到反对社会主义的少数人一边去了。有的干部，自认为对社会主义是忠实的，但是，当自己所领导的干部，自己所信任、所熟悉的人，不搞社会主义时，不但不划清界限，坚决同这些人作斗争，而且找出各种理由来原谅他们，迁就他们。这样的干部，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站到反对社会主义的少数人一边去了。还有个别的人，因为自己的部下干的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和自己有牵连，不但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包庇犯了错误的部下，怂恿他们，甚至同他们合伙去干破坏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样的人，就完全走上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只有

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搞社会主义，都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人，才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种忘掉了阶级，忘掉了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忘掉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忘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忘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只图个人私利，为一小撮人效劳的人，肯定不能做革命接班人。

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团结绝大多数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和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要搞好革命，搞好建设，就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团结是有原则的，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在社会主义时期，搞社会主义是我们团结的最高准则。凡是搞社会主义的同志，即使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同自己的看法有分歧，或者他存在某些缺点甚至犯了错误，也应当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他认真地团结起来。凡是不搞社会主义的人，不管他是自己的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也好，是过去最得



力的干部也好，都必须严肃地同他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只有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才能同他讲团结。如果在搞社会主义还是不搞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不分是非，空讲团结，那就是无原则的团结。至于对极少数的反党阴谋家、混到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定要正确地地区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只要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了，我们就有了力量，就有了巩固的阵地，我们的党和革命的事业就一定更加兴旺发达。不论出了什么牛鬼蛇神，不论情况如何危急，我们都能够应付裕如。不懂得团结绝大多数人，不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坚持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发扬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把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保证。如果不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走群众路线，下情就不能上达，正确的意见就反映不到领导机关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不应有的抑制；领导机关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甚至受到品质不好的干部的蒙蔽，以假为真，就不能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还可能被阶级敌人钻空子，受他们的欺骗，上他们的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损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有民主作风，要让大家讲话，让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然后同大家商量。要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呼声、要求，经过分析，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只要真正能够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出来，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能靠官僚主义，只能靠民主作风，不能靠独断专行，只能靠群众路线，不能靠压服，只能讲道理。大家决定的事，也可能有错误，那不怕，大家一起吸取教训，一起改，就比较容易纠正错误。讲民主，讲道理，讲群众路线，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正确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形成的一个好传统。过去，我们坚持这个传统，保证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当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必须时刻警惕，决不要丢掉这个传统，而应当使这个传统为一代一代的接班人懂得，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压制民主，蛮不讲理，独断专行的人，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有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当我们党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以后，我们



的党员和干部更加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凡是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行，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行，不论多少大小，都是错误的，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下决心改正。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就应当诚恳接受。有的同志，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看不到别人和别的地区、别的单位的长处，看不到自己和本地区、本单位的短处，缺乏一种虚心向先进学习的精神。有的同志，听到人家讲自己的成绩，就兴高采烈，听到人家讲自己的缺点，就很不高兴，听不进去，甚至用种种“理由”为自己的缺点辩护，或者吹毛求疵地对待人家的正确意见，拒不接受批评。所有这些，都会严重地损害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只有经常地检查工作，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才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才能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使小错误不致铸成大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彻底做到，修正主义者是根本做不到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能够走在群众的前头，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而修正主义者则必不可免地要被自己的错误所埋葬，为群众所抛弃。由于缺乏经验而犯错误，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由于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而坚持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具有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才能像老的革命者那样逐渐地积累起丰富的经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只要我们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来挑选和培养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一定能够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即使在革命发展的中途出现某些曲折，甚至在某些环节上出了修正主义者，只要广大的革命接班人具备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条件，也一定能够顶得住任何风浪，胜利地粉碎修正主义者的阴谋。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条件，为广大干部的革命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为党的干部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是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当然也是现在的当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够更好地熟悉业务，掌握技术，学会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本领，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够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条件，必须认真地进行学习、讨论，广泛深入地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一定要按照这些条件来观察干部，教育干部，培养和挑选各级领导岗位上的接班人。一定要使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一切有志于革命的人，自觉地按照这些条件来要求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一定要使党内外



的广大群众懂得这些条件，并且按照这些条件来推举和监督自己的领导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接班人

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浪中锻炼出来的。新的革命者要取得革命前辈所具有的革命品质和本领，也必须到群众斗争中去学习，到革命的大风浪中去锻炼。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sup>①</sup>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只有通过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才能够产生和发展起来。革命的新生力量，革命的接班人，也只有在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才能够源源不断地造就出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将考验一切人，改造一切人。一切有志于革命的人，都应当亲身参加到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在运动中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确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很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还是缺乏直接经验的。许多同志有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这样，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在新事物面前，许多同志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至于年轻干部，许多人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没有亲身经历过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知道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是什么味道，不懂得阶级敌人的手段多么阴险毒辣，不知道地主、资本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必须从头学起。因此，无论是年轻干部，或者是老干部，都应当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特别是要毫无例外地都到三大革命运动的最前线，即到基层单位中去锻炼。凡是沒有经过基层锻炼的干部，都应当过好这一关。就是过去有基层工作经验、而现在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也需要补上这一课。

<sup>①</sup>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如果不到基层单位中去锻炼，不从亲自蹲点当中取得三大革命斗争的直接经验，就不会真正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就没有发言权，就不可能成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坚强可靠的骨干，就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资格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缺乏三大革命斗争的直接经验而又要做领导工作，就势必把事情办坏。如果不是根据自己蹲点取得的经验去领导工作，而只是听汇报、看表报、打电话，往往不能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不能发现工作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别人蹲了点向他汇报，他也听不懂；别人有问题向他请示，他也不好下决心，或者下决心下错了。用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去指挥工作，危险得很。实际上，不到基层去蹲点，不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基层。如果基层单位存在着严重问题，甚至已经蜕化变质，他们就会利用上级的官僚主义去指挥上级，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危害。

到基层单位去锻炼，必须切切实实地蹲下来，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参加劳动，参加革命斗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真正深入到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中去，从头到尾、善始善终地，把运动的整个过程搞完，取得完整的经验。那种下乡、下厂走马看花、转一圈就离开的人；那种像钦差大臣一样，到群众中发一通议论、收集一点材料就回机关的人；那种下去以后，仍旧只依靠干部的口头汇报、书面材料进行工作，不愿意深入群众亲自调查研究的人；那种下去以后，只传达上级指示，不根据上级指示认真研究和解决下面存在的问题的人；那种下去以后长期住在招待所，住在机关里，不愿意同群众一道生活的人；那种下去以后，不积极参加体力劳动，游手好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那种虽然生活在群众当中，但是对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淡态度的人，等等，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叫做到基层单位中，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都不能叫做蹲点，最多只能叫做“走点”或“看点”。如果由于贪图安逸、怕生活艰苦而不愿意到群众中去蹲点，这实际上就已经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开始蜕变了。

在组织广大干部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使他们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现在，一个以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为特征的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在形成。党的各级组织应当继续大力领导好这个学习，要帮助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把丰富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并且使一切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到革命实践中去，把书本上学到的革命理论真正变成自己的行动。这样就可以使干部更快地成熟起来，使革命接班人更快地成长起来。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经涌现并且正在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革命人材。领导的责任，就在





于发现他们，培养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做好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第一，把广大干部组织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分期分批地广泛深入地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党取得政权以来的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教育锻炼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好的学校。除了年老体衰和有病不能下去工作的同志以外，各级干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分期分批地参加到这个运动中去。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率领工作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使所有的干部在思想好、作风好、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骨干的带领下，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增长才干。那些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考验和基层工作锻炼的同志，应该比较长期地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补上这一课，为今后进一步革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组织干部到基层、到群众中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做法，应当形成为制度，一直坚持下去。

第二，认真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使干部在劳动中同工农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保证干部革命化的必要条件。干部参加劳动，不能是一阵风，要经常化，制度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要求之一，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一项永远的制度，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都要实行。老干部、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这项制度。

第三，进一步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要逐步创造条件，使工人和农民有学习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的机会。要使学校教育更好地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除了继续升学的学生以外，要把青年学生更好地组织到农业和工业劳动战线上去。这样逐步地做到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优秀的有文化的工农群众和与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就会大批地成长起来。这是生长革命新生力量、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稳妥可靠的道路。经过这条道路，就会涌现出一批能上能下，既能当干部、又能当劳动者，既有书本知识、又有生产技能、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新型干部。

第四，经常地深入地考察干部和积极分子，了解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当伯乐，善于发现“千里马”，善于发现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考察干部要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大节，看本质，反复地观察干部，不仅要听其言，尤其要观其行，力求把人看准。

第五，放手地使用干部，大胆地把经过基层工作锻炼和劳动锻炼的新生力量提拔起来，让他们去挑重担子。同时，要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给他们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第六，教育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新干部，



关心新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归根到底，要靠老干部来做。一切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者，都应当以身作则带好接班人，为新生力量的成长而高兴。是不是满腔热忱地欢迎和关心革命的新生力量，是不是积极地培养革命的接班人，这是测量每个干部的党性强弱的一个标志。

第七，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意义，克服干部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这种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表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当前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的培养接班人的伟大战略任务了解不够，体会不深；也表现在有些同志不大了解新生力量成长的实际情况，需要干部的时候就向上级伸手要，不积极培养，也不主动发现；还表现在干部工作上的一套清规戒律，论资格，排辈数，比级别，套框框。很明显，这种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迅速地克服，就会压抑新生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起来。

第八，经常检查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国家机关的、群众团体的各级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执行情况。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中锻炼干部，造就干部，并且使干部经常受到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监督。

第九，把各级、各方面的政治工作机构建立起来，把对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切实实地加强起来，大力促进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化。要在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在群众中，加强对干部的了解，有的放矢地对他们进行教育。

第十，对于上述各项措施，都要有长远打算，全面规划。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做好培养新生力量、培养革命接班人、特别是培养党和国家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接班人的规划。要健全和加强各级（包括基层）、各方面的领导核心，使它们真正成为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有指挥作战能力的司令部。凡是还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单位，要有计划地进行整顿、调整和加强。在领导核心中，要把久经考验的老骨干同年轻优秀的新生力量搭配好。各级、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准备好接班人，把培养对象和培养办法落实下来。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同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已经向我们阐明了。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切切实实地做好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工作。在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全党的努力下，我们党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样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使革命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一代一代地成长起来，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通讯

# 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編者按：張啟勳同志給本刊的一封來信，對馮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初版，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二版，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七次印刷，前後共印八十六萬多冊）的一些重要觀點，提出了原則性的批評，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據編者所知，在馮定同志所著的另外兩本書中，即《平凡的真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初版，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二版，一九六〇年一月第十次印刷，前後共印三十九萬多冊）、《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務》（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一九六〇年五月第二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三版，前後共印四十萬冊），同樣存在着張啟勳同志來信中所批評的這類觀點和其他還需要批評的觀點，我們希望讀者和作者一起對此進行研究和討論。

## 一、張啟勳同志給本刊的來信

編輯同志：

上個月我向《中國青年》投了一份稿，這篇稿子主要是對馮定同志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書的內容有不同意見。今天他們把原稿退還給我說：“您的來稿經我們研究，覺得在本刊上不適合用”。我想，現在我們都在大學毛澤東著作，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我在讀過馮定同志那本書之後，覺得其中許多地方所寫的論點，與我們的革命思想相違背，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本書在青年中流傳很廣，如果對書中的那些不妥當的觀點不加批判，是會害人的。因此，我願意把他們退給我的原稿，向貴刊投寄，請《紅旗》編輯部同志研究，並且希望你們能組織大家對這本書進行討論，以便澄清問題，提高認識。在此以前，我曾把我的這些觀點向許多同志提出，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趣，都來參加討論。他們之中，大多數同志同意我的觀點，也有個別同志不完全同意，但都說該書中的許多提法是有問題的。所以，我覺得就這本書組織一次討論，對正在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同志，對我們當前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是有好處的。我也很希望能得到《紅旗》編輯部的指正和幫助，因為我的學習很差，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不是那麼深，對一些問題的批判也難免有不妥之處，儘管如此，我願本着學習的態度，提出這個問題。



当然，我不知道这份稿子适合不适合贵刊，如果对贵刊不适合的话，请你们也将原件退还给我，最好能加批语，以便指导我今后读书。

张 启 勋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 二、张启勋同志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评

编辑同志：

在无意之中，从一个同志的书架上发现馮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由于我对通俗的政治理论书很感兴趣，所以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一遍。读后觉得书中有些地方的写法不太合适，有些观点很值得商榷。因此，愿意提出来与馮定同志和其他青年同志们一起讨论，弄清是非，特别是书中那些具有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一九五七年再版。在再版的时候，作者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基本思想没有改变。馮定同志在《再版添话》中说：“拿再版和初版相比，书中的基本思想和轮廓、结构等，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我所谈的，多数问题是根据该书一九五八年第七次印刷本，个别问题也参考了该书一九五六年的初版本。

现就下列一些问题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第一，在书中第五节《人为万物之灵》的第六段中有这么几句话：“是的，不仅在地球上，而且在其他的什么星球里，也可能甚至也一定会有人类的；不过这个假说至今尚未证实，而证实了是否能够借星际交通工具来往也还是问题。但是就是证实了，也丝毫没有减少‘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能够借星际交通工具来往了，那么我们就得和新发现的人类友爱地、亲切地进行和平的竞赛；虽然从我们来说，这样的竞赛还仅只是理想中的事，而今天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sup>\*</sup>。

作者在谈论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时，竟然认为今天人类“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其目的是“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这种提法，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的，也不能把它算作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内容之一。什么是今天世界上最迫切的事情呢？我认为，只有更好地、更快地解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即更好地、更快地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才是今

\* 本文引文中的着重点是张启勋同志加的。



天世界上最迫切的事情。这些矛盾又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我认为，只有坚决实行这条总路线，才能解决当前世界各种矛盾，而不能采用什么“让亿万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因此，世界人民，首先是共产党人，应该把一切力量放在如何正确地、迅速地组织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上面，而不应该放在“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竞赛”上。这样的世界观，这样去认识世界，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现在，赫鲁晓夫集团正在大肆宣扬“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认为只要他们搞这种“三和”，天下就可“太平”，万事就可大吉了，而馮定同志的这个主张，恰好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显然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十分荒唐的。我们知道，肯尼迪曾向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宣布过：美帝国主义愿意给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年的和平时局，条件是不许苏联干涉东欧国家的“自由化”，不许苏联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试问，美帝国主义这样凶恶猖狂，亿万的人民怎么能在这种条件下去比长比短呢？如果不坚决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又怎么能够决定取舍呢？再说，现今世界社会制度的长和短，早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亿万人民面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阵营。从那时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在不断地增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日益地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清楚地看到新生的力量必将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比长比短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最后决定取舍的问题，只有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

第二，在第七节《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规律》的第六段中，作者这样认为：“……在有些国家，如像在我国已经经历了来的，只要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那么革命就是仍以民族解放为主，革命就是仍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革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平发展了。”

这种举例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都很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英勇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接着就投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了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企图窃取抗日胜利果实。为了消灭蒋介石，我们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消灭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解放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于同年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显然，不



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不彻底地粉碎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不建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要在中国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馮定同志在这节里谈到中国革命转变这样重大问题的时候，根本不提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抽象地认为，有了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而且还要谈到，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是充满着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决不像馮定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和平发展的。

第三，在一九五六年初版第七节《群众是主》（再版时改为第八节，标题是《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中的后半部分，作者在阐述个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时，看来他是拥护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报告的。书中这样写着：“如果群众自愿崇拜个人，听信这个人的话，以至知道了社会的不断前进归根到底还是靠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于是不仅积极行动起来，而且不能不从个人崇拜，转而不再个人崇拜”。作者这种认识和推论，是与列宁教导我们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相违背的。从总的意思看，作者所说的“不能不从个人崇拜，转而不再个人崇拜”的实质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把群众对领袖的爱戴，像赫鲁晓夫那样，说成都是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广大的劳动人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而发自内心地来拥护和听信自己政党的领袖，是因为这个领袖能够想到群众所想的事；说群众要说的话，能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因此，人民群众拥护他、热爱他、听信他的话，是很自然的；同时，也会对有这样一个好党好领袖而感到骄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阶级觉悟越是提高，群众对这个领袖也就会越拥护，越热爱，越听信他的话，怎么能够说群众能从拥护这个人，转而不再拥护了呢？

接着，作者又继续说：“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终究被揭露和开始被克服，归根到底还是群众在起作用”。作者在说这句话时究竟把自己放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呢？这句话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的赫鲁晓夫发言或演说中常常提到。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攻击，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他这种“揭露”和“克服”，是别有用心。正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所说的：“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因此，我不能不怀疑馮定同志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目的究竟是什么？

可能是馮定同志觉得像上面那样宣传赫鲁晓夫的思想，过于露骨了，在一九五七年再版的时候，改变了一种写法。他说什么决不能“夸大个人作用”，“不应将领袖‘神’化”，“如果将领袖‘神’化，认为领袖当做个人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认为倚靠领袖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可知道一切和创造一切，那么对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有危害的。”领袖的作用“总是有一定的份量和一定的范围的；而且不管份量多重和范围多大，只要离开了群众，就会



‘寸步难移’，和‘一筹莫展’的；如果还要‘一意孤行’，那末結果不是經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夸大个人作用的最大危害，就是在于使广大的群众不知不觉忘記了自己的力量，阻止了群众的觉悟，抑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因而也容易使領袖或少数的重要政治人物犯錯誤，引致严重的不良后果；至于养成风气，使青年們都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而說話做事只会‘随风轉舵’的人反而得钻空子，好像还是小事。”

只要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写法虽然改变了，但是“基本思想”正如作者在《再版添話》中所說的“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而且應該說，他反对所謂“个人迷信”的观点，是更加系統、更加恶毒了。

第四，在第九节《成事在人》中，作者在談到解决世界矛盾时說：“現在，从全世界范围來說，就是要解决旧的資本主义制度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間的矛盾，而我們是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的。”

馮定同志对解决世界矛盾的这种提法，應該說是背离了革命立場的。今天，从世界范围來說，解决这个根本矛盾的方法，不是我們願意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的問題，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法，这要看客观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我們說，我們坚信資本主义制度一定要被推翻的，一定要灭亡的。但是，这并不是說社会主义国家要用战争去解决这个世界矛盾。关于这一点，讓我們再来重溫一下《紅旗》杂志編輯部写的《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就清楚了。在这篇文章中說：“必須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來說，它們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許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又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絕對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別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論点。这个論点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說的“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論点。既然这样，馮定同志要我們“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无的放矢了。

至于資本主义国家内部，既然資產階級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階級，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受剝削受压迫的无产階級和广大劳动人民，就一定要起来革命的。怎么样革命呢？馮定同志为他們規定了一条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革命的道路，馮定同志的“和平的办法”的内容都包括些什么，我現在还不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現代修正主义者天天在叫喊用“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資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并且把这种“和平过渡”吹捧成“拯救”世界人民的至高无尚的法宝。現代修正主义的老爷們这种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起来革命的理論，正在遭到所有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主义——資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灭亡的阶段——就是吃人的野兽。毛泽东同志說：“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学景





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今天世界上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在对待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野兽时，就应当像武松那样，而不可能另有他样。

作者在本节谈到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时说：“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关系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的关系，又是不同的”。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作者接着又说：“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对于当权的和对于在野的，又是不同的；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当权的统治阶级关系中，对于比较稳健的和对于一味冒险的又是不同的”。冯定同志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平列起来，不加原则的区别，显然是错误的。拿美国来说，在美国，不管他是当权的也好，在野的也好，统统都是狼，它们之间的矛盾，怎么能够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相提并论呢？按照一些人的期望，这两种狼都不要争权夺势，让给人民掌政最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再看一下，当权和在野之间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当权者不想下台，想继续统治人民，在野者很想上台，想统治人民。不管他们两家，那一个上台，对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都是同样的受压迫、受剥削。当然，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矛盾，是应当看到的，是应当利用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是不能调和的。肯尼迪上台也好，约翰逊上台也好，还不都是“一丘之貉”吗？尽管他们人换来换去，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属于一个统治阶级。对所谓“稳健”的也好，“一味冒险”的也好，统统都是如此。所谓稳健的，只不过是更奸诈更狡猾罢了。因此，我们在对待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争夺统治人民权力的狼，从根本上说来，应当是一个原则、一种态度——坚决反对。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滑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早就在叫喊说美帝国主义者中间也有“头脑清醒分子”吗？他们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也有爱好“和平”之意，说他们也在为“和平”而“操心”，也有“明智”的表现。面对这些事实，我们除了积极揭露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外，不能有什么其他态度。如果有的话，那是骗人的，是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的，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

第五，在第十一节《群众观点》中说：“共产主义并不否认一己的利益，也不否认个性；而是说，只要阶级消灭了，那么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就会互相接近而一致起来的。”

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有原则性错误的。怎么能够说只有阶级消灭了，才能使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呢？人们要问：现在在中国的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难道个人的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只有对立没有一致吗？在我们国家里，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解放并掌握了政权，广大农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也都随之翻了身。所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都拥护代表自己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党和政府。从根本上来



說，个人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現在党和政府为了使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都代表了我們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因此，我国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号召，都是一呼百应地响应，并积极投入各项建設运动。至于个人爱好和个性的問題，那是永远也不会完全一致的，就是阶级消灭了，也还是不能一致的，因为后者的一致和前者的一致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东西。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有矛盾的，这就要求大家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本末倒置，那么他必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批評以至于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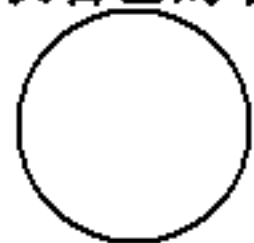
作者在阐述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举例說：“比如董存瑞和黄继光，正因舍弃了一己的生命不仅可以挽救許多同志的生命，战役的胜利和革命的胜利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的同胞的生命，而且还为新生、后代建立永久和平幸福的生活，于是就出現‘視死如归’而使人可歌可泣的業績来了。自然，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間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詳細的比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

我看作者对我們的英雄先烈們的評价也太主观片面了。怎么能够說我們的共产主义战士和英雄，在为党为祖国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立功的时候，沒有去很好地考虑这种行动是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呢？怎么能够錯誤地认为“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呢？如果說他們在这种伟大动人的場合上只凭感情和冲动办事，这不是对我們英雄的誣蔑嗎？我們当过兵的同志以及今天尚活着的董存瑞式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們，是不会同意这种对英雄的誹謗的。我們认为，董存瑞也好，黄继光也好，楊連弟也好，丘少云也好，罗盛教也好，他們在准备为祖国牺牲的时候，是經過了比較和考虑才做出选择的，因而他們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毅然决然地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交給他們的光荣任务。我們的这些英雄是有远大理想的，有高貴的共产主义品德的，有正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他們的牺牲，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光輝榜样。如果作者不相信这点，請你去問一下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还活着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吧。在写到这里时，由于深受先烈的英雄事迹所感动而不能不再高呼：烈士永垂不朽！

以上就是我讀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后提出的个人意見。由于時間关系，只看了一两遍，所以对問題的理解可能也有片面或根本不对头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願意大胆地提出来与作者商榷，也希望其他青年同志們对上述問題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后望来信指导。

致以革命的敬礼！



张 启 勛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 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桧、 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

金应熙

近来看到周谷城先生和别人讨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感到他的文艺观点是和他的历史观点密切关联的。例如他现在讲的“无差别境界”“断而复续”等等，就和他一贯主张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那一套一脉相承，同是阶级调和论。因此，我觉得有对周谷城的历史观点展开讨论的必要。周著《中国通史》中包含有许多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周谷城从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有人指出《中国通史》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促请他注意修改，他还悻悻然表示不能接受，并且指责批评者的态度是错误的。<sup>①</sup>现在在我仅就这本书论述南宋初年对金和战问题时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一事，举例指出周谷城错误的严重。

南宋对女真贵族的侵略应该投降还是抗战，秦桧是有识之士还是大汉奸，自来已有定论，本是绝对不应成为问题的。三十多年前，当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急要解决战与不战的问题的时候，有人企图为秦桧翻案，说南宋不该抗战只该投降，这实际上是为当时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投降路线寻找“历史根据”，随即受到严厉的驳斥。一九三八

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日寇加紧诱降，汪精卫公开投敌；有些日本人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表扬秦桧，鼓励投降。他们对于这一项“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是毫不隐讳的：“在汪兆铭已经发起了和平救国运动、中国主战论和议和论的对立已成为吸引我们注意的切实问题的今天，说明南宋初期的和战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往往被人拿来和今天的状况比较议论的），这应当是我们（日本）历史家的职责”<sup>②</sup>。他们还公然叫嚷“中国应当向秦桧的议和论学习”<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周谷城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当时沦陷的上海初版发行的《中国通史》中竟也袒护秦桧，打击主战派，基本上重复申述了日本人著作中的论点，岂不是公然为敌伪张目吗？

让我们来看周谷城是怎样替秦桧翻案，宣传民族投降主义的吧。

- ① 见《新建设》1958年第9期所载周谷城对古田同志批评的答复。
- ② 见外山军治：《岳飞与秦桧》序言，东京富山房1939年日文版。
- ③ 这是日本《外交时报》上一篇论文的题目。见《外交时报》第794号，1938年出版。



“和则存，战则亡”——这是民族投降主义者在侵略者面前得出的结论。周谷城为了证明“宋对金的屈服妥协成了必然之势”<sup>①</sup>，为了证明当时主张继续抗战只是大言误国，就不惜颠倒黑白，完全漠视一一四〇年前后南宋反抗女真贵族侵略的大好形势，并且把英勇抗击侵略的武装力量说成一团糟。

在反抗女真统治阶级侵略的武装力量中，民众自发的抗战组织占有重要的地位。单以河东、河北数十万民兵而论，他们一直牵制着女真的大量兵力，屡次击败敌人，连粘罕的大营也一度几乎被民兵攻破，女真贵族因此不敢轻易渡河南下。一一四〇年岳飞所部对金作战的胜利，是和岳飞连结河朔忠义的做法分不开的。对于民兵的英勇战功，许多历史家是同声赞许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于抗战初期在华北各地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有某些所谓“历史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武装却十分痛恨起来，对两河忠义的民兵恶毒咒骂：“宋国的人们，口里高唱抗金和收复失地，成立义勇军的不少……不过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统制的，比盗贼差不很远”，并且完全抹杀忠义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sup>②</sup>。可怪的是，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对于抵抗侵略的人民武装，竟也抱着轻蔑的态度。他声言“动乱的民众，在种族战争激烈之时，常为两造所欲夺取之势力”，“谁能取得成千成万的大众，谁的实力便要增加”<sup>③</sup>。这说明了在周谷城心目中人民武装绝不能成为抵抗侵略的主体，而最多只能是统治者所争取、所利用

的一枚卒子。周谷城甚至认为会有起义农民领袖率领“成千成万的大众”去投奔侵略者。这是对中国人民大众的极大侮辱。事实上周谷城除了把先为土匪后当汉奸的李成、孔彦舟等人冒称起义农民外，并没有能举出南宋人民武装投向侵略者的任何例子。对于人民武装反侵略的战绩，周谷城是根本不放在眼内的。对两河忠义他只一语带过，毫未提及战功，而另外他在书中说到明末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时，更非常轻视地说：“其实这时的流贼已被大明的统治阶级与满洲的游牧贵族打得疲癯残疾，尚复有何战斗力可言？永明这时与他们联络，给他们以封号，终属无益。”<sup>④</sup>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周谷城对于李定国在桂林、衡州消灭了清朝两个大将（孔有德等）的部队，震动全国和后来支撑西南危局的事迹，当然不该毫无所知的，为什么偏要不顾历史事实发表这种含沙射影的议论？我很怀疑，周谷城当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对于公开和隐藏的汪精卫的分裂阴谋，又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

周谷城又极力丑化赵宋政权属下的军队。他列举所谓“武人”的三大缺点，并总结为“武人只顾私利，不上前线，专事剝削，不恤人民，且彼此之间，各相夸耀，互生仇

①③④ 《中国通史》(下册)，1941年9月桂一版，第738、737、916页。

② 见前引日本《外交时报》论文。



疾”<sup>①</sup>。軍隊的情況如此，再打下去自然沒有勝利希望，因此南宋“當局者有了戒心”，不得不“力主和議”。

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南宋軍隊本來是一支為地主政權服務的軍隊，不免帶有地主階級軍隊腐化、怯戰等一般特點，將領中也會有些驕橫不法，臨陣先遁，甚至聞恢復之議則怫然不樂的人。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趙宋王朝原有的武裝隊伍基本上已經在對金戰爭的初期中被打垮，後來的部隊是在反侵略戰鬥中新建立起來的。其中將校尤其兵士大部分來自秦晉齊魯等淪陷地區，“還我河山”的要求很強烈，反侵略的戰鬥意志還是比較旺盛的。由於堅決抗戰得到民眾的支持，有些部隊的軍民關係也比較良好。以岳飛、韓世忠和吳氏兄弟為代表的廣大將校在民眾和士兵的推動下是英勇抵抗女真貴族侵略的。<sup>\*</sup> 正因為還有這一面，所以在一一四〇年前後宋軍在抗擊女真貴族中曾經獲得多次重要勝利。如果宋軍真正像周谷城所描寫的那樣一團漆黑，那末這些勝利就將成為不可解釋的史實，而女真貴族也早就可以長驅直進，不需要玩弄“以和議佐攻戰”<sup>②</sup>的陰謀了。為日寇侵華服務的日本史學家，出於對中國人民抗戰力量的敵視，就歪曲歷史事實，別有用心地污蔑當時南宋軍隊“是由匪賊和敗殘兵出身的，素質很壞”，硬說“軍閥諸將恐怕失掉私兵，總是缺乏犧牲的精神，而且互相爭奪勢力，不相協調”，因此“縱然可能偶有一二場局部小勝，希望取得全面的大勝利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周谷城為替秦檜投降辯護而詆毀南宋抗擊女真的軍隊，其議論與日本侵略者的腔調何其酷似！

在談到秦檜等漢奸時，周谷城的感情就完全不同了。他襲用趙翼的說法，把反對議和投降的人叫做“義理派”，而把贊成投降的稱為“時勢派”<sup>\*\*</sup>。在他看來，義理派都是些“不負實際責任”的人，“高談闊論”，“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和這相反，時勢派像秦檜等人則是“大有識見”的，其主張是“切中時勢”的，他們為“對金人妥協”做了許多“預備工作”，有效地取得了“可以與人妥協的資格”，最後在秦檜所主持的一一四二年和議中收到了“巩固統治權力”的效果。就這樣，周谷城明目張膽地宣傳了“賣國無罪論”。

周谷城借口時勢需要議和來試圖洗脫秦檜的賣國罪行。我們知道，對於同一種“時勢”，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估計的。一一四二年以前南宋抗金的局面是，軍事上、財政上都大有起色，前綫捷報頻傳，女真後方的

① 見《中國通史》（下冊），1941年桂一版，第745、746頁。以下引用周著原文，凡見於這一章的，不另注明。

②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七·太宗紀。

③ 《岳飛與秦檜》，第187頁。

\* 岳飛、韓世忠等人在作戰中往往都能身先士卒，岳、韓兩人之間曾有嫌隙，後來也以抗敵大局為重，弄嫌修好。岳飛所部相約“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肉”，軍民關係比較好。這些事實說明周谷城所舉的三大缺點都不是普遍的。

\*\* 事實上周谷城對時勢派的定義是矛盾、混亂的，例如他竟把主戰的韓侂胄算作時勢派。



人民武装正要大举响应，进军中原。这在一切志切恢复、要求“还我河山”的人们看来，自然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不可错过的良机。但是从决意屈辱投降的人们看来，对女真的侵略招架一下只不过是争取妥协的“预备工作”之一，只不过是为了取得“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也就是所谓“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作战只是投降的手段，他们当然就会认为万万不能再打下去，应该赶快签订屈辱的和议了。他们的心里还要嘀咕，万一岳飞等人連結两河忠义民兵取得了抗金的胜利，自己的政权是不是会动摇哩。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估计中，周谷城是完全同意了后一种亦即汉奸卖国贼的估计的，他的书中就是把“击败伪齐刘豫”、“一度击败金人”等和南宋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一并算作妥协的预备工作，既然一切都是为妥协投降做准备，那末周先生对大汉奸秦檜的赞许也自然没有什么希奇了。

秦檜所締結的和議，就是投降，就是向女真统治者臣服称藩、跪拜奉詔。如果卖国贼秦檜而可以说成“切中时势”的“有識者”之一，那末，不但岳飞、韓世忠等抗战派的功績和民族气节要一概被否定，而且对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民族气节岂不是也应该一律否定嗎？

周谷城还替秦檜表功，說和議巩固了赵宋統治权力。人所共知，秦檜在被俘之后，南归以前，就已死心塌地投靠女真贵族，身充撻懶的軍事參議，为他起草誘降楚州守将的檄文；南归以后，一向挟金人以自重，到

了再任宰相，就更公开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分，要挟赵构。<sup>\*</sup> 这样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搨客，他心目中只有女真贵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权位，并没把赵宋政权放在心上。正如一个宋人所說的，秦檜的主张和議，“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民，中不為息兵待时”。和議締結后，秦檜凭借金人的气势，独攬大权，赵构备受胁迫，經常在靴中帶着刀子准备自卫，到秦檜死后才放下心来。所謂赵宋統治权力的巩固在那里？所以，說秦檜議和巩固了赵宋政权的讲法，不过是为秦檜辯护的一种手法，同抗战期間大汉奸汪精卫和頑固派蔣介石所宣揚的“曲綫救国論”是一模一样的。

以上所举出的周谷城袒护秦檜、贊成投降、詆毀主战派的言論，直到一九五六年修訂《中国通史》下册的时候，周谷城除了改动个别字句外，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近年来已先后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周谷城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我以为結合抗战初期的形势来批判这种宣传卖国路綫的言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写了这篇短文，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

- 
- 在主张投降屈辱这一点上，秦檜和赵构是一致的，但是两人却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赵构投降是为了苟且偷安，为了确保儿皇帝的地位，而秦檜主张投降則由于他是金人的奸細。两个人之間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 学习列宁研究

##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

——读《国家与革命》的体会

黄宗汉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特点，也是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

列宁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始终非常重视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指导革命行动。他反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sup>①</sup> 列宁本人正是最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他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目前，当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的时候，认真学习列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对于我们学好革命理论有很重要的意义。这里，我想谈谈个人在读《国家与革命》中，所体会到的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

### 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

为学而学，还是为用而学？无的放矢，还是有的放矢？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列宁研究革命理论，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革命斗争的需要。他还在年青的时候，就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而去认真攻读他所能找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此后，每当革命形势提出要求，或当马克思主义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和糟蹋的时候，他总要带着问题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著作，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回答革命运动中提出的问题，批判机会主义观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国家与革命》及其写作过程，就是列宁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带着问题研究经典著作的明显例子。这部伟大著作写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革命危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sup>①</sup> 《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9页。





的問題。处于帝国主义陣綫最薄弱环节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經成熟。以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經是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领导他们夺取政权，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迫不及待的课题。

可是恰恰在这样的时候，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却把国家问题弄得极其混乱，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荒唐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例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胡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迷信议会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sup>\*</sup>。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更在这时大力贩卖上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力图引导苏维埃政权充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因此，在这个时候，批判机会主义观点，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政治实践意义。列宁说：“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

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列宁全面而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有关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法兰西内战》、《论住宅问题》、《论权威》、《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以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和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等等。列宁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个基本方面：关于国家的起源和阶级本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等等。《国家与革命》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而透彻的论述和发挥，回答了俄国革命实践提出的问题，粉碎了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和进攻，向群众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告诉群众“为了使自已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这样，《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巨著，就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纲领，成了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行动指南，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表现在《国家与革命》的写作上，而且贯穿在列宁一生的理论活动中。例如，当民粹派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阻碍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时，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年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或转引自《国家与革命》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



青的列宁，就深入地钻研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并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彻底批驳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阐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一九〇五年，当俄国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要求布尔什维克制定革命策略时，列宁就认真地去研究有关革命和起义的著作，特别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等总结欧洲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经验的著作，并结合俄国实际，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名著，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機會主义策略，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策略，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等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反革命势力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修正主义者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时，列宁就全面而系统地钻研了《费尔巴哈论纲》、《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巨著，彻底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反动哲学思潮，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成果，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克魯普斯卡娅說：“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是为了‘請教’马克思，以便从他

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sup>①</sup>“他不是以书呆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是以一个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的人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sup>②</sup>对于列宁說来，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伟大的革命科学，永远是指导革命行动的锐利武器。

### 对比研究和批判反面材料

列宁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既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又非常重视同反面材料作对比研究，重视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克魯普斯卡娅說：“列宁不仅研究马克思写的著作，而且还研究资产阶级营垒中他的敌人們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他在同这些敌人的論战中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把‘批評家’的意见仔细地作成概要，择出其中最显明、最典型的东西，并将马克思的言論与之对比。他仔細分析‘批評家’的言論，竭力指出它們的阶级实质，把那些最关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突出地摆出来。”<sup>③</sup>

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深入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而且仔細研究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如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

①②③ 《論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8、5、335—336頁。





和社会主义)等等。列宁研究反面著作同样非常认真,把这类著作也作了笔记,加上评语。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除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材料外,还有摘自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的材料,以进行比较和批驳。例如,笔记开头在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后,紧接着就揭露伯恩斯坦对这句话的歪曲。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胡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无产阶级应该放弃夺取政权,放弃革命,而靠缓慢发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列宁批判说:“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马克思的意思完全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革命应当把它,把这个现成的机器打碎,并用新的来代替。”①

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著作对照起来研究,而且还同第一国际时期及第一国际以前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著作对照起来研究。《国家与革命》为了揭穿考茨基恶意混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界限,就对照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论点,严格划清了两者的界限,明确指出他们之间的三个根本区别:(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

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不懂得必须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

为了深入掌握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列宁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成的结论,而是常常不厌其烦地亲自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些机会主义著作。有一次,他读了马克思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在信中对拉萨尔所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给予严厉的批评,说这书是“小学生”的作文。于是列宁就去读拉萨尔的这一著作,把它作了笔记,加上评语。在评语中他对比说:“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所感到兴趣的就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向前的运动,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进运动。在拉萨尔这里则是反复咀嚼黑格尔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实质上就是抄袭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引文的论述和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述。”②

①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

②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6页。



列宁不仅重视研究和批判机会主义著作，而且也很重视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的谬论。《国家与革命》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的谬论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的批判，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诬蔑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批判，都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批判中，列宁总是揭露机会主义者怎样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为资产阶级效劳。

列宁还很注意研究有关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作，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从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那里批判地吸取养料，并加以革命的改造。由于列宁认为“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sup>①</sup>，因此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深入钻研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他的《哲学笔记》就是有力的说明。

目前，当现代修正主义大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列宁这种研究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在越南阮爱国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中，要我们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每个问题上，都对照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刘少奇同志说，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学习，“我们就会真正懂得客观形势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又是如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面孔就

会一目了然，清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我认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这样做，一定可以大大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百倍地增强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力量和信心。”<sup>②</sup>

### 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每一个原理

对每一个原理历史地、具体地并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注意它的历史背景，考察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掌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这是列宁研究经典著作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国家与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研究，就是这样。这部著作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全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著，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过程。

在第二章中，列宁首先研究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指出这两本早期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已经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共产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即“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然后“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4页。

② 1963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集中在已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①</sup>但是，列宁說，由于革命經驗的限制，在这里，“国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就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

接着，列宁研究了馬克思总结欧洲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的著作。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写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中，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階級专政”这一科学概念，并闡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任务。一八五二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根据法国階級斗争和革命的經驗教訓，指出“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无产階級必須“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把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机器彻底粉碎。列宁說，“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回答了“究竟应当怎样以无产階級国家来代替資產階級国家的問題”。“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但是，“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須消灭的国家机器的問題，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經驗的。”

在第三章中，列宁全面研究了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經驗的伟大著作《法兰西內战》。这部著作強調“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进一步指出必須彻底摧毁資產階級的軍事国家机器；并且回答了用什么东西代替被粉碎了的国家机器的問題：“公社是一个高度灵

活的政治形式”，“它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終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在这里还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基本特征、无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階級斗争以及公社的发展前景等等。《法兰西內战》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階級专政學說。

第四章，列宁考察了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論权威》、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給倍倍尔的信，《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为《法兰西內战》写的导言等著作；研究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怎样結合批判机会主义观点，进一步总结巴黎公社的經驗，論述和发挥了无产階級专政學說。例如，列宁指出，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对《哥达綱領草案》中关于“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批判，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最精彩的論述之一”；信中关于“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提法，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断”。在《法兰西內战》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法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指出資產階級絕對不允許被压迫階級掌握武器；根据巴黎公社的經驗，闡述了无产階級专政的一些极重要的思想，如进一步強調了无产階級革命必須彻底鏟除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論述了保证无产階級国家机关成为社会公僕的两个有效办法（国家机关人員由普选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和普通工人的工資相等），等等。列宁指出这些論述“可称为馬克思主义在国家問題上的最高成就”。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91、489頁。



为了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发展和消亡問題，在第五章中，列宁深入研究了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馬克思总结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說的发展史，总结了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国家和拉薩尔派关于“自由的人民国家”学說的斗争史，明确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經典性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①</sup>列宁对这段话作了詳尽的論述，他再次強調“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須經過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別的道路。”《哥达綱領批判》提出了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低級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級阶段的共产主义）的原理，列宁为了研究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对这个原理进一步加以論述和发展。列宁詳細地分析了两个阶段的特征、区别和联系，分析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法权”，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自行消亡等等。

由此可見，列宁探討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說时，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有关著作联系起来，并把它們同具体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从发展的观点进行系統考察的。通过这样的考察，列宁深刻地論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是怎样根据革命实践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在革命运动和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就有力地帮助我們掌

握了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及其分析解决問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認識了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同时，列宁通过这样的考察，令人信服地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貫穿馬克思主义学說的一条紅綫，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測驗真假馬克思主义者的試金石。

《国家与革命》在研究馬克思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說发展史的同时，全面地研究了国家这个客观現象本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并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巧妙地結合起来。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論国家》的报告中，曾強調从历史上探討某种現象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方法，是社会科学上最可靠、最科学、最能弄清問題实质的方法。

列宁在研究經典著作时，还非常重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是怎样对具体問題进行具体分析。例如，他在馬克思恩格斯等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俄譯本序言中，把馬克思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論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論作了比較。馬克思恩格斯针对英美“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群社会党人由于宗派主义立場而脱离了无产阶级”<sup>②</sup>等特点，坚决号召英美社会党人“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鏟除自己組織中的狹隘的頑固的宗派主义精神”。<sup>③</sup>他們针对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頁。

②③ 《〈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8、356頁。



产阶级很早就成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观点和路线等特点，坚决教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陷入庸俗观点、‘议会迷’和市僧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sup>①</sup>列宁说：“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sup>②</sup>。

列宁在进行这种分析对比的同时，尖锐地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恶意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简单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的做法。列宁指出，根据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教导提到首位，大力反对机会主义者“用议会主义观点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庸俗化和用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sup>③</sup>。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列宁是多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具体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现实斗争中来。

### 用新经验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列宁在理论研究中，既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过：“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

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門科学向前推进。”正是伟大的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各个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列宁对《资本论》非常熟悉和精通，经常引用其中的观点来分析实际问题。据统计，在《列宁全集》前三卷中，引用《资本论》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但是，列宁没有停留在《资本论》的观点上。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许多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规律和矛盾，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期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研究曾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同时举行进击才能获得胜利。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时期大大加剧，出现了跳跃式的状态；由于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

①②③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6、345—346、357页。





弱的地方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列宁得出新的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一切或大多数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民族殖民地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列宁也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把它们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按照原定的计划，这部著作最后还有一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教训”。显然，列宁是要在这章中用俄国革命的新经验系统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因忙于领导十月革命而未写成。列宁对于爆发革命而“妨碍”他的写作，感到高兴，因为他认为，“做出‘革命的教训’总比论述‘革命的教训’更愉快，更有益”。但列宁在其他许多著作中，已经对这些革命经验作了总结。

虽然如此，《国家与革命》第一至六章中，列宁不仅捍卫了而且也用了新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斯大林指出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教训，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乙）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

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

（丙）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sup>①</sup>

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这些发展，是在《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加以阐发的；其基本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已经有了。在《国家与革命》中：（1）明确宣称俄国无产阶级要为“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斗争。（2）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强调没有工农联盟，“民主制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3）指出“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像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

<sup>①</sup>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7页。



列宁教导我們不要“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sup>①</sup>，当然也要求人們不要把他的理論看做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虽发现了苏維埃，但他并不认为它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唯一形式。列宁說：“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階級专政”。

\* \* \*

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对比研究和批判反面材料、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每一个原理，用新經驗丰富和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等这些列宁研究經典著作的态度和方法，是列宁自己經常強調的理論联系实际方法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在这里，列宁为我們树立了理論研究和现实斗争紧密結合，讀書和战斗紧密結合的光輝榜样，永远值得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学习。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貫坚持和提倡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即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去研究革命理論，一貫重視和坚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們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对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方針作了精辟的論述。他反复教导我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必須采取“有的放矢”的态度，即“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

場，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統一的态度。反之，那种“为了单纯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即“无的放矢”的态度，是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党性不純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則为指导的方針，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sup>②</sup>二十几年来，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一直成为我們全党同志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根本准則。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現代修正主义者之間，正在展开一場越来越深入的关系世界革命前途、关系全人类命运的大論战。为了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研究当代革命問題，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我們必須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在学习中，我們必須認真学习和运用上述列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方法，認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如何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指示，認真貫徹刘少奇同志在越南阮爱国党校講話的精神；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毛泽东思想，更有力地开展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①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7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799、803頁。





# 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课题

徐非光

学习理论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对于最广大的同志来说，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积极参加实践斗争，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课题，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请教，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这些课题，指导自己的实践行动。这也就是带着问题学习的方法。

要带着问题学，就要先有问题。问题从哪里来？只有从实践中来。我们参加了实践，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反映到自己头脑中来，这就是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去学习革命理论，就比较容易使理论和实际真正结合起来。

同时，学习革命理论，能否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运用它，同实践经验的多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去读它，虽然可以记住其中的某些词句，但却不容易懂得其实质所在；一个革命经验丰富的人去读它，就比较易于领会和把握它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同样一本书，我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去读它，也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每读一次，那些与我们当时的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部分就往往会突出出来，给我

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会学习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由于当时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战争，还没有在实践中充分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从这些理论中比较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并获得为这种美好前途而斗争的力量。革命胜利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再来学习这些理论，它对于我们就亲切多了，但是，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时候，对这些理论的领会还不可能很深刻，也不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运用它。在经过一段实践之后的今天，再重新学习这些理论，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深刻得多了，并且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运用它了。这三种不同的感受，正是由我们的实践经验的多少所决定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去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请教的时候，我们能否正确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和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深浅、实践经验的多少有关。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比较善于提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有关情况了解



得比较清楚，因而也就比较善于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实践经验少的人，由于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提问题往往不能抓住要害，即或能正确提出问题，也会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而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运用理论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好比射箭，虽然射出了，未必中的。更坏的情况就是从主观出发，从想像出发去办事，使理论同实践脱节。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首先仍然决定于我们对当前实践的认识程度。

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说的理论。”<sup>①</sup>因此，积极参加实践斗争，从实践中提出课题来学习理论，最易于了解理论的精神实质。

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只有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才能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那些还没有或者还很少有实践经验的青年学生来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必要的，这可以使他们获得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达到逐步改造他们的思想的目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这些理论知识。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学到一些书本知识（这是必要的），但是还不等于他们已经完全理解和掌握了它。他们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反复学习，逐步消化，检验它，应用它，然后才能真正掌握它。

这当然也不是说，从实践中提出课题来进行学习，就不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担负领导工作和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来说，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认真多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多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样做，可以使我们高瞻远瞩，富有预见，把工作做得更好。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即使我们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我们还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地学习我们已经学过的东西，学习我们还没有学过的东西，使我们的理论水平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我国人民正在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极其丰富和极其生动的群众革命实践。它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课题，要求我们给以科学的分析，正确地认识它和解决它。同时，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新的问题又会不断出现，又会继续向我们提出许多新的学习课题。我们广大同志应当密切联系实际，带着从实践中提出的课题，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且把它们运用于实践中，经受检验，很好地为实践服务，从而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sup>①</sup>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9页。



# 反面教材不可不讀

· 陈 展 超 ·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对立方面。正面和反面，对立地统一于事物之中。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发展，正面战胜了反面，推动了事物的前进。然后，事物又在新的矛盾的过程中通过斗争向前发展，永无休止。一分为二，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我们应当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采取从客观，不从主观，从发展，不从停滞，从互相关联、互相比较、互相斗争，不从孤立、调和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掌握事物。

在学习革命理论上，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向来是我们最信赖的老师。我们必须勤勤恳恳地、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请教，从他们的著作中，学习真理，认识真理，找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武器。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更有能力地在极其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分清敌我，辨明是非，经常保持正确的方向，我们还需要认真地研读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观点，也就是要认真地研读反面教员提供的材料。

这种学习方法是我们党向来提倡的。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内阮

爱国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争论的每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认真地对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讲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研读反面教材。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也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真理是在同谬误的相互斗争中发展的。只有通过斗争，真理才能克服谬误，向前发展。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武器，它不仅要坚决地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观念，坚决地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彻底决裂，揭露它们欺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凶恶面目，而且要同从工人运动内部产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战胜了一切同它敌对的思想体系，日益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所拥护，所掌握，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一切重要的理论观点，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当我们自己置身于当前的实际斗争中，将反面教材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述相对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在什么样的斗争环境中提出来的，为了什么目的提出来的，它针对了哪些敌对观点，又是如何战胜了敌对观点的。这种从对照中的学习，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使我们在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得到实际的锻炼。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又充当反面教员，在给人民上课。他们为了对人民进行欺骗，总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硬说他们的论述，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是剖析了事物的本质，还是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到底是真道理，还是假道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阅读反面教材的时候，一下子都提到了我们的面前，要求分辨清楚。这样，也就促使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显微镜”，将这些“事实”、“道理”仔细地照一照，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有了这样一照，或者几照，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谬误终究遮不住真理的光辉；人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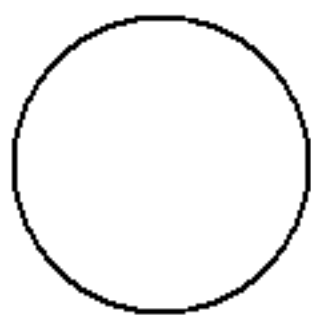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不仅同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同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言论相呼应，其中有的还是直接从后者抄来的，并没有什么创造。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卖人民利益，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的丑恶嘴脸就原形毕露了。

这种对照反面教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用这种方法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争论，“我们就会真正懂得客观形势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又是如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面孔就会一目了然，清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sup>①</sup>

认真地研读反面教材，可以使我们增加阶级斗争的知识，增长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这个学习很要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实践证明，来自反面的教育，常常是极其深刻的。特别是反面教员自我暴露，把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公诸于世，能够更有力地说服人，更深刻地教育人。一八四四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的斗争时，曾经这样说过：“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他们还老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私人的争吵。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而且会认

<sup>①</sup> 《刘少奇同志在河内阮爱同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1963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为轻率地抛开像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应当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能清楚地向这帮人证明他是个什么人的天大蠢事来”<sup>①</sup>。恩格斯的这段话，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的确，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反面教员，从他们的反动阶级立场出发，怀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仇恨心理、恐惧心理，力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总是不断地抛出大量的反动言论，干出各种各样的坏事来。这样，就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反面教材，使我们从“反面的启示”（马克思语）中，懂得了什么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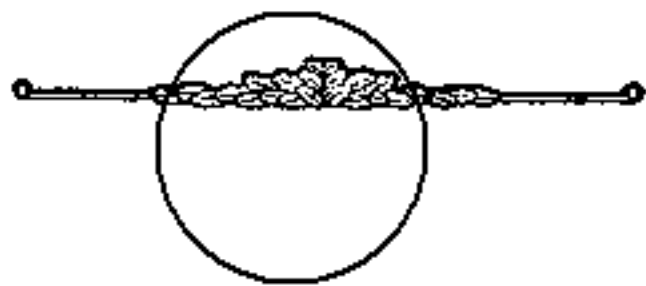
正因为这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我们党除了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以外，只要有可能，还将反面教材公布出来，登在报刊上，加以广播，让人人看到，人人听到，都来“欣赏”，都来鉴别。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我们敢于公布反面材料，是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敢于让人们看到、听到，是因为我们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定

地信任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利用我们公布的反面材料，欺骗人民。但是，这并不足为惧。广大人民是会通过严肃的、认真的思索和讨论，弄清事实，辨明是非的。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加了“免疫力”，增长了识别谬误的能力，将会锻炼出善于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作斗争的本领。

当然，研读反面教材，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譬如，反面教材又臭又长，语言晦涩难懂，令人读了味同嚼蜡。但是，既然是反面教材，可以从反面来教育人，那末，耐心地研读它，也是需要的；花费一些时间，也是值得的。我们应当抓住这个从反面提供的最具体、最生动、最实际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机会，而不要輕易地放过它。

总之，这种学习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真理，掌握真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通过这种学习方法来锻炼自己。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页。



評	介	三	本	經	濟	史	料	書
---	---	---	---	---	---	---	---	---

这几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属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单位，编写了一批典型企业的史料。其中有的是档案资料的辑录，有的是编者深入企业亲自所作的调查。为了调查、编辑、整理、校正这些资料，编辑人员经年累月地埋在堆集如山的档案中，细心剔选；奔走于各地，寻根问底，花费了大量的劳动。他们的这个工作做得好，是有学术价值的。

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要我们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并且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sup>①</sup>

在专史的研究中，经济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过去，没有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全国解放以后，各地建立了科学研究机构，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档案资料公开了，有些单位才开始有组织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下面评介的三本书：《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就是这一批成果中比较好的。

收集和研究经济史料，大体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辑录企业的档案、文献，《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就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方法，是向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一部分资本家作调查，《北京瑞蚨祥》就部分地采用了这种方法。从收集和研究资料的总体来说，两种方法都需要，很可能大量的还是采用第一种方法。但是，从获得资料的时机来说，后一种方法很值得重视。因为私营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企业内部的关系和管理制度都有了根本的变化，人事的变动也很大，急需抓紧时机，向工人、职员作调查，以便获得这些企业今昔对比的资料。否则，时过境迁，就要花费更多的劳动，甚至得不到这些材料了。

任何研究工作都应当从收集和整理第一手的资料开始。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学术水平提高着眼，应当提倡这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这件工作，看起来是默默无闻的，是琐琐碎碎的，但是，它却是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所必需进行的基础工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大量收集和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可以预期，不久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写出具有更高水平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来，写出具有更高水平的近百年的中国史来，写出具有更高水平的专题学术著作来。

<sup>①</sup>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3页。





#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民族工业的命运

——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

王 城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三联书店出版）是一本典型调查材料。编者收集了启新董事会、启新公司的原始档案和来往函件，并对启新的工人、资本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进行了访问和调查，经过加工整理，编成此书。

这本书，辑录了从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启新的前身唐山细棉土厂的建立，启新的创办、发展、没落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一共六十八年的历史。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现代工业的命运如何，它又如何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得到新生。可以这样说，启新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它对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它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都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的“船坚炮利”，刺激了清朝的统治阶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给了清朝统治者以严重的打击。他们认为，学习西洋制造枪炮的技术，不会超过外国侵略者，但是镇压人民的起义，则是绰绰有余的（即李鸿章所谓“若火器纯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而帝国主义也要求中国有一个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有力量“维持秩序”的政府。于是，洋务派的官僚们在“自强”的幌子下，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帮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办军事工业。启新洋灰公司，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洋务派的官僚创办的军事工业，不能孤立的存

在和发展，它需要有关的基础工业，例如军事工程的建筑，洋灰就是不可缺少的材料。这样，随着与军事工业相联系的其他工业的发展，投资人的范围也不能不相应地扩大。起先是“官办”，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即官商合办）的企业。本书《创办经过》一章，可以说明这一点。

根据文件，启新的前身唐山细棉土厂的资金是由清朝军械所各局、开平矿务局和香山地主各出资二万两组成的，是官商合办的企业。从督办开平买办唐廷樞给李鸿章的禀帖里可以看到，创办这个企业的目的是“造成之士，应先尽军械所官用，提取其盈余，再行发售民间销用。”可见这个企业的创建，在娘胎里就既服务于军事工业，又具有封建性质。这体现了当时创办的现代工业的基本特征。

同当时其他许多工业一样，这个工厂由于封建的束缚和经营落后，先天不足，在一八九三年很快就夭折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外国资本夺取在中国设厂的特权，刺激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即当时的“士绅”）要求设厂自救，清政府被迫放松了对新工业的控制。因此在甲午战争后出现的“设厂运动”的浪潮中，天津道周学熙于一九〇〇年着手筹备恢复唐山细棉土厂。但不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帝国主义分子仗着八国联军入侵的机会，霸占了唐山细棉土厂。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经周学熙费了许多周折（包括英国驻北京公使及天津总领事出面干涉），终于在一九〇六年收回重办，组成启新洋灰公司。这个公司成立后，周学熙借用了北洋淮军银分所和天津官银号的公款，开工生产，生产获利之后，方



才召集股本。可見启新最初的資本是由官僚資本轉化來的。从启新股東被選為董事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一百萬元的股本，大部分掌握在“北洋袍澤”一類人的手里（這些人到民國以後又變成總長、次長、省長、銀行總裁、經理等人物）。這又表明當時創辦現代工業的一個特點。當時，一些官僚，把辦工廠作為擴充自己經濟實力和政治資本的一種手段。收回唐山細綿土廠和創辦启新，都是在袁世凱的直接支持和參與下進行的。

启新的“創業”，既然憑借封建官僚的勢力，自然容易獲得種種的便利和特權。它在直隸、東北以及長江流域取得了優先設廠的特權；清朝的農工商部和民國初年的交通部會飭令京奉、京張、京漢、正太、道清、滬寧等鐵路局專用启新的洋灰；清政府批准启新的洋灰“無論運至何處，只征正稅一道，值百抽五，沿途概免重征。”等等。因此启新在開辦五年之內，股本由一百萬元增至二百八十五萬元，由一個廠擴充為兩個廠，生產能力由每日七百桶增至一千二百桶，並且於一九一二年吞併了大冶水泥廠，形成了启新獨霸水泥市場的局面。這種特權，直到一九二〇年以後才逐漸消失。启新憑借特權發家，當然不是意味着封建勢力在“扶持”現代工業的發展，恰恰相反，這種封建式的壟斷，排斥一般資本家競爭，說明封建勢力對於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起着嚴重的阻礙作用。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受封建勢力的束縛，同時也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由於帝國主義忙於互相殘殺的戰爭，暫時放寬了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一個發展的機會。從書中可以看到，水泥工業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我國先後建立了上海華商水泥公司、南京中國水泥公司和無錫太湖水泥公司，打破了启新壟斷水泥市場的局面。然而，戰爭一結束，帝國主義又卷土重來，中國經濟本來落后，水泥市場的容量極為有限，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律，這幾家水泥公司之間，不可避免地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本書《壟斷與競爭》一章說明，

華商和中國公司自一九二三年先後出貨以後，立即以跌價與启新競銷。華商地處上海，鑒於日本水泥的傾銷（在抗日戰爭前，日本水泥占進口水泥的第一位），自己首當其衝，於一九二五年又與實力雄厚的启新簽訂為期五年的聯營合同。中國水泥公司為了與启新、華商抗衡，於一九二七年收買了太湖水泥公司。以後這幾家公司為了吃掉對方，有時聯合，有時拆伙，有時三方互相火併，形成混戰，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簽訂聯營合同，一直繼續到“七七”事變。這種激烈複雜的鬥爭，固然是民族工業之間矛盾的表現，同時也表明我國民族工業在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帝國主義洋灰的傾銷下，市場有限，走投無路。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入我國，華北和東南沿海諸省相繼淪陷，启新實際上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走上了喪盡民族氣節與日寇合作的道路，名為私營，實為軍管企業。启新為日本帝國主義提供修築公路、港灣、飛機場和礮堡用的水泥，幫助日本侵略者屠殺自己的同胞。一九四二年以前，启新一度“生意興隆”，“造成華北銷數未有之記錄”。股東們自鳴得意地認為：“本公司營業前途之興榮蓬勃，可以操諸左券。”但抗日戰爭勝利後，启新給國民黨反動派的呈文中，却竭力為這一段不光采的歷史洗刷，說什麼一九四一年該公司之所以擴充設備，原系對日寇“表明自主自辦，戢其野心”，而且“暗中設法減低產量，以為消極抵抗之計。”更使讀者憤慨的是他們還把資敵的行為硬栽到職工身上，胡說什麼“其所以未將工廠停歇，是由于想維持職工的就業。……”你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里的一部分資本家（當然不是全部），就是這種嘴臉（據編者交代，這部分材料，已被焚毀）。

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本來同“資敵有據”的資本家是一家人，何況启新在內地的湖南辰溪廠和昆明廠已經和官僚資本勾上了關係，因此，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只來了一個“劫收”的下馬威，接着就把工廠發還給启新了。而启新運用依附北洋軍閥的經驗，給政學系官僚資本撥出一部分股份，并把政學系的人置於副總經理



的高位上，于是启新又有了新的靠山。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已处于灭亡的前夕，它进行的投靠美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政策，已使民穷财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在国内水泥市场日益过剩的情况下，还免税大肆进口美国剩余水泥，这只能置启新于死地。本书辑录启新给伪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呼吁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水泥厂商，危如累卵，破产之期，翘足可待”，结果是：“属会同业奔走呼号，盖已声嘶力竭，而所获结果，洋泥（作者按：即美国水泥）之源源进口也如故，各机关之购用外货也亦如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启新以“灰无销路，山穷水尽，绝对不能维持”，登报宣布停工。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工业的归宿。

启新虽然命途多舛，但资本家仍然发了大财。本书《资本积累》一章告诉我们，启新从开办到一九四七年，每百元的投资，其历年所得的股息、红利（除去通货贬值的因素），累计数达五百四十九元二角九分，超过原投资将近四倍半（其中尚未计入利用这些股息、红利进行再投资所取得的利润，和担任经理、董事一类职务的资本家的“薪金”，以及各种津贴、车马费、酬劳等），这都是工人的血汗。

启新的工人，在解放前像其他厂矿的工人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启新的工人，分里工和外工两种。里工是公司直接雇用的，依工作性质分为九牌。技术工人每日工资四、五角，普通工人只有二角二分，此外还有四、五百童工（十二、三岁），童工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一小时，干采石的钻眼、击碎石块和装车等“无甚技巧”的笨重活。夜班的童工，下午七时上班，翌晨五点下班，工资一角五分。据书中有关文件记载：“如多做一点，照一点半计算”。看起来多么“公道”，实际上是惨无人道的剥削。至于外工（也叫外包工，有七百人左右），解放前不承认是公司的工人，公司把工作包给大柜（即封建大把头），大柜再把工作分给小把头，对工人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这些把头，仗着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军警宪的势力，迫害工人，还动不动威胁工人：“谁不好好干活，就把谁送到宪兵队

去。”这实际上是超经济的剥削。启新工人生活的恶化，指出下面的数字就够了：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工资为基数，一九四七年七月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五。工人能生活下去吗？

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不能不激起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从一九二〇年洋灰棧二排六百余人第一次举行罢工起，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工人的斗争，从未停止。一九二二年启新工人有了党的领导，就从自发的斗争转入自觉地有组织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十月为了增加工资，里工和外包工九千多人举行了二十二天的罢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为建立红色工会的斗争和一九二九年斗倒伪公安局长郑锡钻的大胜利，以及反对黄色工会和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都是启新工运史上光荣的篇章。

本书最后一章是辑录解放后对启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史料。解放前奄奄待毙的启新，解放后得到新生。首先进行军事管制，接着帮助克服困难，然后进行民主改革（解散伪工会，成立新工会，推翻封建把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等）。一九四九年政府对启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并且于一九五二年进行了“五反”斗争，工人参加了企业的管理，当家作主了。

解放后启新工人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启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七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一十九点六九，使生产获得飞跃的发展。书中记载的老工人李玉岭的话说得好：“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只因有了党，才有我们的幸福生活，今后我还要争取在生产战线上多立功。”

启新的新生，是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启新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企业应走的道路。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本书的编者花了很大劳动，翻阅了四、五十麻袋的档案。在整理史料时，根据史料的内容分别章节编辑；在每一章之前，有简要的说明，介绍全章内容，表示编者的意见。对于某



些史料，編者还加了按語和注释，例如在《启新公司的成立》一节中，編者在按語中駁斥了帝国主义分子那森拒不交还唐山細綿土厂的“理由”。此外，还对史料中許多簡称、錯字和別字，作了校勘或注释。这都便利讀者閱讀。

感到不足的是本书偏重解放前的历史，而解放后的史料則嫌不足。在解放前的史料中，有些章节

史料不够(如《启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的章节内容单薄(如《工人运动》)。这些希望編者有机会加以补充。

科学研究工作必須掌握丰富的材料。整理资料的工作虽然大家都感到需要，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启新洋灰公司史料》这种典型調查书籍的出版，将会受到讀者的欢迎。

## 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沙 为 众

中国科学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經濟研究所合編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很好的资料书。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档案材料、會議记录、帳册、資本家之間的信函和訪問记录等第一手资料，揭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特点，反映出民族資本主义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命运紧密联系。书中对于民族資產阶级的两面性、資本家的剝削和勞資之間的斗争、企业的經營管理和資本家家族內部矛盾等，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其中有关民族資產阶级两面性的材料，尤为具体生动。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在一九〇五年由一个与日本有相当密切关系的华侨資本家簡照南，以十万元港币資本在香港創办的。經營了几年，就由于本身力量薄弱和遭受英美烟公司竞争打击而停歇。一九〇九年又投資了九万元港币，重新复业。辛亥革命以后，人民爱国力量不断增长，人民欢迎“国貨”，該公司也由亏损轉为盈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的一段时期，帝国主义的壓力暂时放松，国内由“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阶段，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逐步进入高潮，这时期“南洋”的基础虽然远較英美烟公司为差，但由于以“国貨”为号召，获得人民支持，业务获得很大发展。一九一六年在上海設厂，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島一带遍設分支机构，“五卅”运动期間，銷貨額达到最高峰，資本已扩充到一千五百万元，成为当时民族工业中有数的大企业。

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帝国主义压力的重新增强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压迫下，“南洋”的营业重趋下降。在民族資產阶级抛弃革命、附和大地主大資產阶级的反动的期間，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南洋”連年亏损达五百七十余万元，以至实行减少資本。一九三一年虽然轉亏为盈，但是，企业中已引进大量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經營日益腐敗。資本家勾結反动統治者疯狂地殘酷压迫工人，并幻想依靠官僚資本势力重振营业。一九三七年，簡家終于不得不出让股份和自己股份的行使权，使整个企业落入宋子文官僚資本集团之手。直到全国解放，这一民族資本企业才恢复了生命。

在长达三十二年的時間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竞争的主要对手，始終是英美烟托拉斯(頤中烟



草公司)。这种情况决定了它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特别错综复杂的关系。南洋的创立和发展,对英美烟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活动起了相当的抵制作用。它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同英美烟公司进行长期的市场斗争。在市场斗争中,“南洋”资本家采取了許多針鋒相对的手段,如减价、赠奖、以一种产品抵制一种产品、一个商标顶住一个商标等等。但是,它最有力的手段,是以“推销国货、挽回利权”为号召,争取国内人民和南洋一带爱国侨胞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南洋”将英美烟公司蛮横压迫的情况“诉诸社会”,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同情,“烟贩与吸家同时忿激”,使“南洋”的各牌产品的销路“同时为之猛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正是靠着人民爱国力量的支持,才能在同实力远较强大的外国托拉斯进行市场斗争中取得一定成效。书中辑入的有关材料,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出发点是为了自身的利润,它的力量又是比较薄弱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家,对于有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后盾的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和压迫,感到很大的畏惧,认为“小岂可以敌大?寡岂可以敌众?弱岂可以敌强?实为千古不易之理”。因而在许多问题上都倾向于妥协,这集中地反映在英美烟公司同“南洋”合并的问题上。英美烟公司曾先后三次提出合并方案,企图吞并“南洋”,只是由于条件没有谈妥,最后由于英美烟公司内部改变主意未曾实现。但在“南洋”的资本家中,妥协倾向是一直占着上风的。

当时,有些资本家也模糊地认识到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抗拒帝国主义压迫的有力支持,认识到自己“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因此主张保持“国货”招牌,扩大招股,“合政府(指北洋政府)及国人之力与之对抗”。但是,公司主要负责的资本家则担心同英美烟公司竞争“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

即为吞噬”,而“若与合并,则变为通家,如孩童之得有保姆护卫,时时可处于安乐地位”。并且进一步幻想借英美烟公司的“诚意”来“扶植”自己,借英美烟公司的势力共同抵制同业,“则一盆之肉终是两人食之,岂不利益哉!”在内部争论和英美烟公司强大的压力下,前一种资本家也惶惧动摇了,终于提出:“倘以虽有外援(指‘急速筹划、添招华股’,或与北洋政府‘合作’)亦不能御之为虑,则又不若早日降之,不失为蜀之安乐公之为愈。”

本书编者精心择录的许多资料,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和帝国主义关系方面的两面性,还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若干方面。在资本家往来的信函中,有些表露了不同程度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但主要负责的资本家则斥为是“过于迂腐”之论,并且认为“生意乃个人自由行动,……试问争气,争气为人所败,国人亦能争气补我损失否?”特别是他们认为“人之所能为世界社会造幸福,争国家权利、为国生光者,多是金钱”;“日本村井……与人合并……已为大富,何曾见一国人骂之,现反多人颂扬”;“总之,有钱的人敬重,无钱必为人鄙,……有大注金钱,名誉便好”。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上,终于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本书的编者序中指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与依赖是多方面的,只有与英美烟公司的市场斗争才是坚决的”。书中列举的材料充分证明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历史材料,也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官僚资本势力关系上的两面性。“南洋”的资本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捐税政策也曾表示过不满,并进行过一些斗争。但是,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官僚资本集团一直存在着很多的幻想和严重的依赖关系。他们曾表示愿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创议设立的“国营烟厂”合作,以使“血本有着,公诸国家,两得其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还曾在经济上支持汪精卫、陈公博等的反动政治活动。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官僚资本集团的妥协性最





突出地表现在它同宋子文的关系方面。“南洋”的资本家长期以来就和宋系官僚资本集团有密切的联系。后来，当公司由于资本家家族内部矛盾、经营管理腐败和市场竞争失败而陷入严重的困难时，资本家幻想借宋氏集团的力量恢复和加强公司的地位，他们竟以低价让给宋氏集团股份二十一万股，并且接受宋氏集团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把简氏家族自己所保有的其余一半股份二十余万股的股权，也让宋氏集团来全部掌握。这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终于在一九三七年落入后者的魔掌，成为一个官僚资本直接控制的企业。

不断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处境困难，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受着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所支配外，还力图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摆脱自身的困难。正因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工人的剥削是分外残酷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工人工作时间一般在十一小时以上，在产品供不应求时还经常采取加班加点办法，甚至强迫工人通宵工作；工人的工资都微薄得可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工人工资在企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平均只占百分之四左右，同期中的剥削率估算在百分之一千以上。

本书编者所收集的资料中，突出地表现了“南洋”的资本家所采取的关厂政策。一九二七年初，当公司销货额刚见下落时，“南洋”的资本家即关闭了香港厂，一九二九年又毅然关闭尚在获利的浦东分厂，接着把上海总厂也关掉。关厂政策，一方面说明了“南洋”的资本家不像一些小厂资本家那样留恋于勉强维持的局面，而是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有较全面的打算。另一方面，他们的打算，却完全是企图从进一步压迫和榨取工人中找出路。香港厂的

关闭，是和当时大革命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而浦东分厂，则是南洋各厂中工人组织最好的一个，资本家在关厂前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好安排，对报馆作好联络，并且通过总厂黄色工会分化总厂工人，拒绝援助分厂工人斗争。关厂期间，“南洋”的资本家趁着生产不景气以低价委托别厂代卷香烟，更假借美商名义开设一精华制烟公司包工代制。一九三一年老厂复工，工人再进厂都作新工人对待，工资大大减低，劳动强度大大加强。事后，资本家自鸣得意地宣称：“……卒将‘容共’时期所订种种不利资方之条约一律撤销，同时又将工厂内部工会式变相之职工俱乐部……自动解散。此种成绩，大约可得到今后成本比前轻得多，出货快得多，工作紧张得多，用人少得多。”

除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外，民族资产阶级还尽量以剥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作为增加利润的补充手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于其原料主要取给于农民，对农民的剥削也是严重的。南洋资本家在河南许昌、山东坊子等地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开办收烟场，利用预购、高利贷和压级、压磅等方式，残酷地剥削种烟农民。在许昌的收烟办法就规定“每担烟叶非额外加重二十斤不收”；还要强制烟农负担“里三分，外三分”的佣金，即每担须抽出六分作为佣金交给烟行。许昌收烟厂的“余磅”一项，在一九二〇——一九三一年间，平均占到收购量的百分之十二点三，最高时达百分之十六点三，也就是公司收购烟叶一百磅，而烟农实际要交一百一十六磅多。本书辑入了这类资本家剥削农民的材料，是同类型性质的其他书中所比较少见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一书也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第四编解放后的改造部分，对党的政策以及企业改造特别是人的改造的情况叙述得不够，也不全面；在编者序中把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定息简单提作贯彻“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政策，是不恰





当的。有些地方对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内幕情况表现得不够完整。例如，英美烟公司曾三次压迫“南洋”接受合并，第二次合并谈判是由英美烟公司自己取消前议而告中断，原因何在，资料未能清楚地指明。对于一九二七年以后资本家陆续关厂的原

委，一九三七年宋子文官僚资本侵入南洋的经过，材料都比较简单，不能反映出资本家的思想意图，特别是他们政治方面的考虑。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档案材料不足，可以通过调查访问来补充。本书对于调查访问材料的收集，还是重视不够的。

## 私营商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调查

——读《北京瑞蚨祥》

徐道河

《北京瑞蚨祥》，是商业企业的一本典型调查资料。这本书，叙述了北京瑞蚨祥绸缎洋货店的创办、发展、衰落和在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本书所包括的资料，一部分是从企业的档案中得到的，大部分是作者深入企业，亲自进行调查，直接得到的。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访问了工人、职员和资方代理人等几十个人，收集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花过一番辛勤的劳动。

北京瑞蚨祥，是我国北方素负盛名的一家绸缎洋货店，是由山东章丘县孟家出资开设的，创办于一八九三年。

北京瑞蚨祥的前身，是鸿记布庄。鸿记布庄经营土布批发业务。当清朝皇室崇尚洋务，修造铁路，民族工商业开始出现的时候，瑞蚨祥的资本就转向零售，改营绸缎、广货、布匹。

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烧毁了北京前门外最繁华的商业区，瑞蚨祥也变成了一堆瓦砾。但是，它很快就摆设布摊子，恢复了营业。

在一九〇一年复业以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帝国主义自顾不暇的时候，瑞蚨祥的业务，有了迅速的发展，“由一个布摊子变为一个拥有五大字号垄断一方的绸、布、皮、茶、洋货店”，跃居为北京市“全绸布业的魁首”。

这个时期，瑞蚨祥的神话般的发展，是怎样造成的呢？作者写道：“瑞蚨祥的整个发展时代，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封建军阀大混战的时期，一个劫掠的时代。四亿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造成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繁荣，被搜刮的人民财产集中到帝都，这就是瑞蚨祥资本积累的来源。”

瑞蚨祥一开始就同外国资本和本国统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当时，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和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都需要瑞蚨祥这样的商业企业。这就是瑞蚨祥暂时获得生命力的原因。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我国政局十分动荡，经济日趋崩溃，瑞蚨祥终于走了下坡路。

作者指出，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都”南迁，旧一代的官僚、军阀淪落，瑞蚨祥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服务对象，营业额大大下降。



面临这种突然的变化，瑞蚨祥不得不改变经营方针，以遗老遗少和农村的地主、富农作为服务对象。到一九三〇年以后，瑞蚨祥的营业额又见起色。但是，它的上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年代里，瑞蚨祥不但营业不好，而且资本大大削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亏损日益严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几乎奄奄一息。

瑞蚨祥的发展史，是曲折的。作者写道：“从北京瑞蚨祥经历的几十年来看，虽然每个时期都有高潮起伏，但总的趋势是由小而大，又由盛而衰，形成一个抛物线。”

## 二

北京瑞蚨祥的特点是带有浓厚封建性。作者指出：“瑞蚨祥是一个在封建社会里开设起来的家庭企业，从里到外缠着封建的、乡土的、家族的纽带”，企业内部“几种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在许多关系上带有两重性，即有资本主义的一面，还有前资本主义的一面。”

瑞蚨祥的资本家阶级内部有两种人，一种是出资人，即东家；另一种是经理和大小头目，即掌柜。东家和掌柜之间没有封建性的契约或合同的约束，他们可以自由散伙，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表现。但是，掌柜大都出身于本企业的学徒，同东家有历史性的师徒关系，同时，掌柜不出资本而参加企业分红，保留着封建社会企业“人力股”的残余形式。

企业内部职工也有两种，一种是雇佣来的“自由”工资劳动者，他们来店出店，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特点。另一种是从本企业学徒中培养出来的职工，他们大都是资本家的亲属或同乡。他们同资本家除了雇佣关系外，还表现出学徒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延续。

本书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瑞蚨祥的学徒制。

学徒，基本上都是资本家的同籍——山东人，他们同资本家大都非亲即故。学徒进企业以前，在受资本家严格挑选、验看的时候，要向资本家“叩

头拜礼”。学徒进企业以后，要受到严厉约束。例如，一天工作十六、七小时，第一年只许站着，不许坐着；在服装上，只能穿粗布无领大褂，不能穿细布绸衣；一年中除了洗澡和两次看戏由“大师兄”领着才能出去外，平时不准出门。当资本家家里有婚丧喜庆的时候，学徒就要去听候使唤，行“弟子之礼”。学徒从事较重的劳动，而收入极微。劳累、乏味的生活，不只消蚀了学徒的朝气，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学徒由于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折磨，有自动离职的，也有忍无可忍、触犯劳动制度而被开除的，也有得病死去的。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资本家和学徒之间这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的关系，是多么残酷！

封建性也渗透到瑞蚨祥内部各项管理制度里面。

维持瑞蚨祥资本家对企业实行封建性家长式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铺规”，约束着瑞蚨祥每个职工的生活行动自由。从本书列举的“铺规”条文中可以看出，“铺规”，不仅束缚职工在营业时间内的活动，而且规定职工在业余时间不能自由外出，不得在外过宿；职工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更不允许。触犯“铺规”，要受惩罚，甚至开除出店。因此，广大职工除了一年一次探亲外，整年过着禁闭式的生活。

瑞蚨祥由于带有浓厚封建性，因而也就处处显出它的保守性。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几页，就饶有风趣地描述了瑞蚨祥资本家孟洛川的一股保守劲，他反对一切新鲜事物，害怕革新，总想照老样子办事。

封建和保守的经营方式，在开始还多少适合于当时的北京社会。例如，瑞蚨祥不强调资金周转，而强调囤积货物，重视进货，从来不登报或贴广告，更不搞折扣、赠奖一套手法。这些做法曾经表现了瑞蚨祥的经营特点，赢得了“货真价实”的声誉。但是，这些经营特点，经不起外国资本的竞争。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北京时期，瑞蚨祥原来的经营方式就站不住脚了，它的经营特点也消失殆尽。



## 三

解放后，北京瑞蚨祥从资本主义商业企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商业企业。这本书，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叙述了这家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料。本书的下篇，包括私营时期的资料和公私合营时期的资料。书中对每个时期，都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业务经营的变化、企业的内部改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多次地得到党和国家在各方面的帮助，因而有了恢复和适当发展。北京瑞蚨祥也不例外。一九五〇年五月，国家调整工商业，在税收、贷款、公私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时，北京瑞蚨祥职工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团结资方人员，改变经营方针和方法，使企业面向工农群众。由于经营方针和方法的改变，营业有了显著的好转。这家商业企业的东西两店营业额由每天平均四、五百元上升到一、二千元。

北京瑞蚨祥同其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当它的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它就乘机占用工业资金，抢购物资，同国营商业争夺市场，打击私营同业，谋取暴利，进行投机违法活动。根据瑞蚨祥资方负责人在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中自报：他们行贿二十三笔，盗窃国家资财四笔，偷工减料五十一笔，获取暴利六十二笔，偷税漏税就更多了。

一九五二年，党和国家发动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五反”运动。这是一次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通过“五反”运动，瑞蚨祥的职工检举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揭露了工人中的蜕化分子和资本家组成的非法小集团，打退了资本家的进攻，并且建立了对企业的监督。

一九五三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瑞蚨祥申请公私合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经过政府批准，便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成分的

公私合营的商业企业。

瑞蚨祥接受公私合营，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势所迫。同时，它本身也有某些有利因素。首先，瑞蚨祥企业规模较大，从业人员较多，党政领导部门一向对它掌握较紧，企业内部的党、团和工会组织也比较健全。企业经过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的改革，已经为公私合营创造了条件；其次，瑞蚨祥的在职资方都是资本家代理人，他们本身对所有制改变的顾虑小些，他们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不能不感到老日子是不会再来了，目前的日子也很难维持下去。

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是根本性质的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充满了复杂曲折的阶级斗争。这本书对这个过程叙述得是比较详细的。它从私营时期的企业内部改革和店员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写起，叙述了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的经过、合营后的企业改革和优越性，叙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改革，并且以不少的篇幅，叙述了公私合营过程中和合营以后店员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作者写道：“在这期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斗争，只是多半是更加曲折隐蔽了，用工人群众的话说，资本家现在是‘打太极拳’了”。

在我国目前出版的经济史资料书里，像《北京瑞蚨祥》这样反映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书，还是很少的。从这本书里，不仅可以研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民族资本的特点，而且可以研究北京瑞蚨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党和国家发动职工群众所进行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这对于研究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帮助的。

《北京瑞蚨祥》是一本比较好的典型调查资料。缺点是对资料的选择和安排还有些重复的地方。如果把有些资料加以提炼，看起来眉目可能更清楚些。同时，希望在再版时，能把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新特点，加以概括，那会更好。



# 实用主义經驗論的主觀唯心主义实质

汝 信

关于經驗的問題是認識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圍繞着經驗問題始終貫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对立路綫的斗争。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某些先进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例如十七、八世紀的英、法唯物主义者，反映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新兴資產階級的要求，能够主张对經驗作唯物的解释；而在資本主义进入了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現代資產階級哲学家，都投入唯心主义的怀抱，用各种手段来欺騙群众，借以维护他們的反动的階級利益。現代資產階級哲学流派，从数十年前被列宁批判得体无完肤的馬赫主义，到目前还在泛濫流行的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唯心地解释經驗，其中尤以实用主义哲学的經驗論最富欺騙性与蠱惑性，影响較大。

实用主义者对經驗的理解，在实质上并没有超出以往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关于經驗的基本看法，只是采用了新的更迷惑人的形式而已。

从历史上看，对經驗的不同的解释造成了經驗論学派的分裂。大家知道，近代經驗論的創始人是杰出的英国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他同脫离实际、蔑視經驗的传统的經院哲学进行斗争，大力提倡尊重經驗，以經驗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并且对經驗作了唯物的解释。在他看来，經驗是一切知識的真正源泉。他坚持知識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理，认为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而人們对于自然界的認識則是第二性的。用他的話來說，知識是存在的映象。“人們若非想着发狂，一切自然底知識都应当求之于感官”<sup>①</sup>。

培根的后继者洛克，基本上坚持了对經驗的唯物的解释，但有时却向唯心主义动摇。洛克认为，人們的全部知識都建立在經驗之上，但經驗可分两种，即外部經驗（感觉）和內部經驗（反省）。一方面他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外部經驗的来源，认为“知觉是由刺激我們感官的一些外界原因給我們所产生的”，經驗的获得是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人如果不到产波罗蜜的东印度群島亲自尝尝它，則他便不会得到那种滋味”<sup>②</sup>。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內部經驗”只是我們的心灵活动，它“和外物毫无关系”，观念“是不能从外面取得的”。这样，他就承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館版，第22頁。

② 《人类理解論》，商务印书館1959年版，第628頁。



认某种經驗可以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独立存在，从而为唯心主义者曲解經驗敞开了方便之門。

由于洛克哲学的这种内在矛盾，以后唯心的和唯物的經驗論者都利用了他的学說。前者的代表是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貝克莱，后者的代表是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列宁說：“貝克莱和狄德罗都淵源于洛克。……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綫走向唯我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綫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sup>①</sup>

貝克莱认为，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无非是观念或感觉的集合，“它們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它們不可能在心灵或感知它們的能思維的东西以外有任何存在。”<sup>②</sup>由于貝克莱根本不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也就否认經驗的客观来源。在他看来，經驗的来源只在主体内部，“观念的原因是一个无形体的、能动的实体或‘精神’”<sup>③</sup>，經驗的內容也純粹是主观的，感觉經驗“創造出”外部世界的一切。貝克莱对經驗所作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解释，在历史上起了深远的恶劣影响，以后唯心主义經驗論者的种种“新理論”，都沒有脱离貝克莱的窠臼。

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則清除了洛克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抛弃了洛克关于内部經驗的理論，把物质世界看做經驗的唯一来源。他們指責貝克莱把整个物质世界归结为主观感觉的做法，乃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他們认为，我們的一切經驗都是通过外物作用于感官而获得的，經驗的內容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他們把

經驗叫做認識的“指路杖”，就是因为經驗反映着客观世界的性质，只有凭借經驗才能揭露自然的秘奥。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和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的对經驗的不同解释，其根本关键在于是否承认經驗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否承认不依赖于經驗的自然界、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唯物主义者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它在任何人类經驗产生之前早就独立存在着，而經驗則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它是“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sup>④</sup>，是外部世界的或多或少正确的反映或映象。相反，唯心主义者則认为，我們的經驗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实在，外部世界或者只是經驗的形式，只存在于經驗之中，或者根本无法知道它是否存在。他們竭力否认經驗的客观源泉，把經驗說成是純粹主观的东西。

以往的哲学史說明，要确定一个哲学家在認識論方面所持的立場，不仅要看他是否承认經驗对認識的作用，而且首先要看他怎样去解释經驗。我們在評判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的时候，重要的也在于透过他們关于經驗的高談闊論去认清他們所談的經驗的实质。

“經驗”是实用主义者最喜欢玩弄的一个哲学概念，他們一向以“經驗”为标榜，自詡“尊重”經驗，借以給自己披上一件骗人的“科学性”的外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奠

①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4、151頁。

②③ 《人类知識原理》。《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43、347頁。





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就宣称他的哲学从經驗出发，以經驗作为認識的源泉，并认为过去的經驗論哲学都不够“彻底”，而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彻底的經驗論”。另一个美国实用主义的魁首杜威，则把他的工具主义称为从經驗中产生并以經驗为依据的經驗論哲学，并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将經驗的可能加以合理化，尤其是集体的人类經驗的合理化”<sup>①</sup>。实用主义者这样喜欢談論經驗，主要是因为他們企图利用經驗这个概念进行詭辯，掩飾他們的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照实用主义者說来，以往經驗論哲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就是把經驗这个概念的范围限制得过分狭小。他們則把經驗的范围无限扩大，使之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实用主义者对經驗的解释是混乱而不一貫的，他們所謂的經驗并不局限于通常所說的感觉經驗，而包括人的一切主观意識状态和心理體驗，甚至連梦幻、胡思乱想、魔法、迷信等等最荒誕不經的东西都包括在內。有时他們对經驗作生物学的解释，把它看做有机体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結果，說什么經驗是由人的行动和对行动結果的感受这二者的密切关系所形成的。有时他們却又竭力強調經驗本身不是主观的，是不依賴于主体的。由于实用主义者所說的經驗的含义极其模糊不清又极其广泛，就使他們得以随机应变，根据主观需要对經驗作出各种随心所欲的解释。

实际上，实用主义者所以要利用經驗来大做文章，其真实目的在于用比較隱蔽的方

式来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鼓吹唯心主义。但是，在表面上实用主义者却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伪装“中立”，似乎采取“超然”的态度。他們詭称已經找到了“永远結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的第三条路綫，从实用主义的观点看来，仿佛这一有关哲学基本問題的爭論根本就是多余的。杜威是鼓吹走所謂“第三条路綫”最力的一个，他胡說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用所謂“非經驗的方法”把主体和客体、心和物、經驗和自然割裂开的結果，只要采用他的“經驗的方法”，把經驗当做原初的存在，确立起統一的經驗整体，使心和物都从属于經驗，把它們看作从經驗整体中派生出来的东西，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陈旧的对立”。

实用主义者的这种拙劣的伎俩完全是徒劳的。哲学的根本問題是任何一个哲学家所抹煞不了的，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第三条路綫”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列宁早就說过：用“經驗”这个字眼可以消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对立的那种濫調，完全是神話。只要剝去实用主义的“中立”的伪装，它的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来面目也就暴露无遺了。

实用主义者企图迴避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問題，把經驗抬高为凌駕于物质和精神之上的最基本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对經驗的基本看法，就是把經驗作为第一性的东

<sup>①</sup> 《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館1958年版，第66頁。





西，归根結蒂把整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歸結為經驗。詹姆斯認為，思想和事物是由同一素材所構成的，“世界上只有唯一的原始的素材或材料，一切東西都是由它所組成的，我們把它稱為‘純粹經驗’”<sup>①</sup>。在他看來，所謂“純粹經驗”是原始的渾沌的整體，整個的經驗是“自足的”，不依賴於現實世界，它本身就是唯一真正的實在，“經驗和實在歸結為同一個東西”。換句話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無非都是經驗。英國實用主義的代表費迪南·席勒就公然宣稱，“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世界就是經驗，世界無非是由經驗所構成的”<sup>②</sup>。

實用主義者的這種經驗觀充分說明他們自己所吹噓的所謂“中立”態度，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在對待經驗和客觀物質世界的關係問題上，實用主義者承襲了過去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的立場。

貝克萊曾經為自己提出過徹底“消滅”物質的任務。實用主義者也同樣致力於“消滅”客觀物質世界。詹姆斯就公開贊同貝克萊對物質概念的“駁斥”，並且承認自己所維護的概念只是貫徹地推行了貝克萊等人首先採用過的“實用主義”方法<sup>③</sup>。在他看來，世界是從主體的經驗中“製造”出來的。他說：“我們把什麼東西稱為事物呢？看來這是完全隨我們的便，因為我們根據我們人的目的去劃分一切事物，正如我們劃分出星座一樣……我們隨我們的心意把感性實在之流分為各種事物。”<sup>④</sup> 總之，最初存在的是“經驗流”或“意識流”，這個連續的“經驗流”被人根據需要人為地劃分，才從其中分化出被稱之為物

的個別凝結物。席勒的觀點和詹姆斯也很有類似之處，他把整個世界說成是我們用“無形式的原料”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作成什麼，它就是什麼”，因此他認為談論離開我們而獨立的世界是毫無意義的<sup>⑤</sup>。從這種實用主義的觀點看來，人的認識過程就成為“創造”實在的過程，實在世界不是被人認識，而是被人“創造”出來。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而且這種從經驗中随心所欲地“創造”出世界的實用主義學說，還是露骨的反動的唯一意志論。

實用主義者杜威為了掩飾這種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採用了更狡黠的手法。他千方百計地使他對經驗的解釋具有更多的“客觀性”的外貌，口頭上也提出要反對主觀主義地解釋經驗，甚至还對貝克萊作了一些不關痛癢的批評。他聲稱自己並不否認外部世界的存在，斷定說“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我們從來都不懷疑世界的存在，為了不自相矛盾，我們也不能這樣做”<sup>⑥</sup>。但是，問題的關鍵卻不在於是否承認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在於是否承認外部世界不依賴於經驗而獨立存在。正是在後面這一點上，杜威和其他實

① 《徹底的經驗主義論文集》，紐約1912年英文版，第4頁。

②⑤ 《個人的唯心主義》，倫敦1902年英文版，第51、60頁。

③ 參閱《實用主義》，倫敦1908年英文版，第89—90頁；《徹底的經驗主義論文集》，第10頁。

④ 《實用主義》，第253—254頁。

⑥ 《實驗邏輯論文集》，芝加哥1916年英文版，第302頁。



用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

杜威不像詹姆斯那样把經驗看作單純的意識状态、“經驗流”，他所強調的是“經驗和自然的連續性原理”。所謂“連續性原理”，就是把經驗解釋成不依賴于主体的客觀的東西，把經驗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意識和周圍現實聯繫起來，融而為一，使經驗成為一個兼收并蓄的整體。

杜威所謂的經驗，不僅包括我們一般所說的主体的經驗，而且包括一切經驗的主体和被經驗的對象。他在《經驗与自然》一書里這樣寫道：“‘經驗’是一個詹姆斯所謂具有兩套意義的字眼。好像它的同類語生活和歷史一樣，它不僅包括人們作些什麼和遭遇些什麼，他們追求些什麼，愛些什麼，相信和堅持些什麼，而且也包括人們是怎樣活動和怎樣受到反響的，他們怎樣操作和遭遇，他們怎樣渴望和享受，以及他們觀看、信仰和想像的方式——簡言之，能經驗的過程。‘經驗’指開墾過的土地，種下的種籽，收穫的果實以及日夜、春秋、干濕、冷熱等等變化，這些為人們所觀察、畏懼、渴望的東西；它也指這個種植和收割、工作和欣快、希望、畏懼、計劃、求助于魔法或化學、垂頭喪氣或歡欣鼓舞的人。”<sup>①</sup>

杜威這樣把經驗概念無限擴大，也就把整個客觀物質世界都消融于經驗之中了，因此他的“連續性原理”實質上並不是闡明經驗與自然的聯繫，而是用經驗去吞并自然。

杜威的這一套謬論其實也並不新鮮，它無非就是馬赫主義者的“原則同格論”的再

版。在杜威看來，經驗是原始的統一整體，主体和客体仿佛是从經驗中派生出來的，兩者不可在原則上分離，沒有主体就沒有客体，甚至主体和客體的區別也只是“為了經驗內部的一定目的而確立的某種區別”<sup>②</sup>。所有這些見解幾乎都可以在馬赫主義者阿芬那留斯那里找到。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從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馬赫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的差別，就像經驗批判主義和經驗一元論之間的差別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和極不重要的。”<sup>③</sup>

從上述可以看出，實用主義的經驗論基本上是遵循着貝克萊——馬赫的主觀唯心主義路線發展的。貝克萊把一切說成感覺，存在就是被感知；實用主義者則把一切說成經驗，存在就是被經驗。不管實用主義者使用多少漂亮的詞藻，他們的基本思想總沒有跳出貝克萊主義的圈子。

對經驗的實用主義的解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唯我論。如果按照實用主義者的說法，整個世界都可以被歸結為經驗，那就自然而然地會產生這里究竟說的是誰的經驗的問題。詹姆斯和杜威都力圖逃避唯我論的結論，把經驗硬說成某種不屬於任何人的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但是，這種狡辯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知道，當我們說經驗的時候，總是指人的經驗，不依賴于人的經驗是不能想像的。只要實用主義者

① 《經驗与自然》，商務印書館 1960 年版，第 10 頁。

② 《人的問題》，紐約 1946 年英文版，第 396 頁。

③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 14 卷，第 361 頁。



坚持把世界說成經驗，那在邏輯上就必然會得出世界的存在依賴于人、在人出現以前沒有世界的荒謬結論。實用主義者席勒就坦率地承認世界就是“我的經驗”，認為“唯我論對經驗的解釋既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在理論上錯誤的”<sup>①</sup>。

實用主義的經驗論還公然為僧侶主義服務，賣力地為宗教辯護。詹姆斯就專門寫過一部有關“宗教經驗”的書，企圖為宗教尋找“心理學的”根據，證明宗教經驗和人的任何其他生活經驗和科學經驗一樣是現實的。杜威也把宗教看做獨立於美學、科學、道德、政治以外的一種經驗，鼓吹使宗教在“人的經驗的每一方面都占有其自然的地位”<sup>②</sup>。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實用主義者從經驗中順利地推演出上帝，是為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實踐的目的。這就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實用主義作為壟斷資產階級的哲學體系利用宗教來欺騙和麻醉人民的本質。

這樣看來，實用主義者雖然也像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冒牌學者那樣，企圖用新名詞或“愚蠢的無党性”去掩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的實質，但實際上他們卻站在唯心主義的營壘中向唯物主義猖狂進攻，鼓吹著一種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論，最後則走向唯我論並公然投入了宗教的懷抱。這又一次確鑿不移地證明了列寧所指出的——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即“唯心主義不過是信仰主義的一種精巧圓滑的形態”<sup>③</sup>。

實用主義者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論，是他們的整個哲學學說的基础。他們把這種

理論應用於各个方面，從而得出了一系列反動的結論。

實用主義者的認識論是建立在他們的經驗觀之上的。由於他們否認有經驗以外的實在，所以在他們看來，認識不能涉及獨立於我們經驗以外的東西，而只能發生在“經驗的組織內部”，無論是認識者或認識的對象都只是經驗的部分。在這方面杜威的觀點很可以說明問題。杜威把經驗分為兩類，即非認知的經驗和認知的經驗，人的認識就是這兩種經驗之間的關係。非認知的經驗指的是原始的經驗整體，它是粗糙的、不確定的、充滿偶然性的。人的認識的作用就是通過反省思考把這種原始的經驗從混亂模糊的東西變為“明朗、確切和一致的東西”，使之符合我們的主觀需要。這就是他所謂的認知的經驗。在杜威看來，也只有這樣被經驗到的東西才是真正的認識的對象。因此，根據這種實用主義觀點，人的認識並不是人的意識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過程，而只是經驗內部的關係，認識的對象則完全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產物。這樣，實用主義者對認識所採取的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實際上也就根本取消了人如何認識周圍世界的問題。

在認識論上，實用主義者是爬行的經驗論者。他們變本加厲地加深了和發展了歷史

① 《人本主義研究》，倫敦1907年英文版，第473頁。

② 參閱《一個普通的信仰》，耶魯大學1934年英文版，第57頁。

③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第379頁。



上的經驗論學派的錯誤，片面夸大經驗的作用，而對理論、科學思維則表現了極端的蔑視。他們根本否認事物有現象和本質的區別，認為一切事件作為經驗的事實都具有同等的意義，因此他們也就不承認認識必須經歷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的發展過程，不承認經驗必須上升到理論，感性認識必須能動地飛躍到理性認識。照他們說來，事物怎樣在經驗中被感知，它們也就是怎樣，因此不需要對經驗材料進行概括，從個別提高到一般，而只需要把經驗事實記述下來。杜威就公開主張排除掉理性而代之以“智慧”，而所謂“智慧”則是指為了新目的去使用過去的經驗所產生的提示，也就是利用舊經驗去取得新經驗以改造經驗本身。在他看來，人生就像一場賭博，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不可思議的存在，因此想依靠理性去認識世界是徒勞無益的，唯一可行的只是用經驗主義的方法去尋找應付和改善每一個境遇的手段。

由於實用主義者否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存在，因而也就根本取消了反映客觀世界的內在本质聯系和認識客觀規律的可能性。實用主義者口頭上也大談科學和理論的必要性。但是，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的作用完全不在於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世界及其規律，而只在於充當人們應付環境、達到一定目的的工具。詹姆斯曾經提出過“理論是工具”的說法<sup>①</sup>，而杜威則進一步把它發展成爲“工具主義”。實用主義者完全否認科學和理論所反映的客觀內容，只承認它們充當工具而發生“功效”。杜威說：“我們稱爲科學的

東西，就只是發明和調整用以對個別經驗現象發生功效的工具。”<sup>②</sup> 總之，科學和理論都只是人們爲了達到一定目的而設定的方便假設，它們本身並沒有客觀的、普遍的意義。在實用主義者手里，科學和理論失去了任何認識的作用，而墮落成爲他們爲了追求特定的目的而隨心所欲地運用的工具。

實用主義者的真理觀也和他們的經驗觀有着緊密的聯系。實用主義者既然取消了不依賴於意識的客觀世界的存在，也就根本否認真理是客觀現實在人們意識中的正確反映。他們認為，所謂真理並不是指經驗與經驗以外的某種東西的符合，而永遠是經驗內部的事。真理意味着經驗的各個部分之間的令人滿意的“圓滿的關係”，任何觀念只要能確實有效地幫助我們和我們經驗的其他部分圓滿地聯結起來，它就是真的。因此，真理只不過是在經驗中確定的有效驗的東西。杜威在闡明“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時這樣說道：“所謂‘真理’是一個抽象名詞，它可以應用於各種情況：實際的、預見的或希望的，只要它們在效驗和結果方面得到證實。”<sup>③</sup> 簡言之，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真理”就是對人有用的東西，“效用”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如果宗教對人有用，它也就在這種適用的限度內合乎真理。因此，真理完全是主觀的，它只不過是人爲了達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權宜手段。這樣，實用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把自己的

徐

① 《實用主義》，第 53 頁。

② 《人的問題》，第 218 頁。

③ 參閱《哲學的改造》，第 84 頁。



主观經驗和效用奉为准则，完全不顾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根本否认客观真理和真理的客观标准，鼓吹露骨的相对主义和唯意志论，并且肆无忌惮地进行诡辩。

实用主义者还用他們的經驗論学說去论证和宣扬他們的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在他們看来，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而根据对社会规律的科学认识去改造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因此，他們詆毁革命，主张采用所謂“自由实验的方法”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他們美化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吹嘘资产阶级民主，仿佛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才能通过不断的实验而使經驗逐渐得到发展和改善。用杜威的話來說，“民主就是相信人类經驗能够产生目的和使經驗借以进一步增长和丰富起来的方法”，“民主的永恒的任务就是創造更为自由和更合人情的經驗”<sup>①</sup>，至于說的是什麼人的經驗、什麼样的經驗，那是杜威所置之不論的，反正只要保证各个人的經驗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就行了。因此，根据这种反动的謬論，工人可以“自由地”得到被剝削和被压迫的經驗、黑人可以“自由地”得到受歧視和受虐待的經驗。资本家可以“自由地”得到剝削人和压迫人的經驗。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符合杜威所推崇的美国式的“民主”的。不言而喻，杜威所謂在美国的現存社会制度下去創造“更为自由和更合人情的經驗”云云，只能意味着对劳动人民的莫大欺騙，并且为垄断集团的血腥統治塗脂抹粉。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哲学，长期以来

它一直充当美国的官方哲学，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寵儿。这并不是偶然的。实用主义这种典型的市儈哲学，完全迎合着沒落的、垂死掙扎的资产阶级对生活的反动观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必然性，反动的资产阶级不敢正视这无情的现实，他們力图否认客观规律，用自己主观的經驗去解释世界。他們也无力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根据这种认识去进行活动，而只能按照自己主观的要求去观察社会、应付环境或从事冒险，并以主观的效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經驗論，正好适合帝国主义时代反动资产阶级的需要，也适合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現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成为他們与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

今天在經驗这个問題上，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和形形色色的現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包括現代修正主义的哲学思想)进行尖锐的斗争。歪曲解释經驗这一概念，利用它来反对辯证唯物主义，这是現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們所慣用的伎倆。正如列宁所說，“目前，各色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談‘經驗’来掩飾他們的反动性。”<sup>②</sup>因此，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揭露和批判現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对經驗的种种曲解，是很有必要的。

① 《創造性的民主是我們当前的任务》。《杜威八十誕辰紀念文集》，紐約1940年英文版，第227、228頁。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0頁。





# 红旗

19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九期 ★

## 目 录

- 社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前进!** .....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 革命风雷 ..... 曹 禹 (7)
- 战斗的社会主义文学 ..... 刘白羽 (10)
- 科学技术工作的革命化 ..... 李四光 (14)
- 受革命化教育的十五年 ..... 周培源 (18)
- 学习毛泽东思想,做好气象工作 ..... 顾震潮 (21)
- 在建設事业中贯彻革命精神 ..... 李瑞环 (24)
- 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 董加耕 (28)
- 永远做彻底的革命派 ..... 黄祖示 (29)
- 在貧农下中农中扎根 ..... 张 勃 (33)
- 更好地为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塑像 ..... 牧 惠 (36)

☆ 十月一日出版 ☆



#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前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我們热烈地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

十五年，从整个人类历史來說，只不过是一个短暫的时间，但是，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我們的国家，經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受剝削受压迫的屈辱地位，紧接着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現在，我們的国家已經步入了一个光輝燦烂的时代，它以新的雄姿踏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它就像早晨初升的太阳，蒸騰向上，光芒四射。

建国十五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結一致，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取得了輝煌的胜利。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巩固的工业基础。我們已經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許多重要工程，已經能够自己設計許多大型的、現代化的工业企业，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品种有了很大的增加，大型和精密的机器设备的制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我国农村人民公社越来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人民公社的集体經濟已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将是我国历史上收成較高的一年。我国的国民經济已經全面好轉。在科学、文教事业和国防建設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已經在实现农业現代化、工业現代化、国防現代化和科学技术現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我們在国际事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深远。

建国以来的十五年，是建設的十五年，也是革命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的历史，



再一次证明了馬克思所說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这一真理。正是革命，带动我国历史的車輪飞快地向前滾动。沒有革命，就沒有新中国；沒有革命，就沒有社会主义。

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是經過近百年来历史实践，才逐渐被人们認識的。当这个真理还没有被人们認識以前，曾經有許多人寻求过各种各样的道路，提出过各种各样的主张。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战争以后，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进口一批兵艦和大炮以自卫的主张。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这种主张是不能救中国的。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废科举、兴学校，采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尽管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戊戌政变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也走不通，从而促使許多知識分子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同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争，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然而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許多代表人物还是希望繼續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他們提出什么“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职业救国”、“体育救国”等各色各样的口号。这些口号，也都在历史的严峻考驗下，一一破灭了。

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改良主义者不想从根本上推翻旧的反动統治，而是幻想在同反动势力妥协的条件下，甚至企图通过并依賴反动統治阶级，求得社会的某些进步和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它們的利益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推翻它們的統治，要想发展工业，振兴教育，取得社会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旧民主主义为什么也行不通，也不能救中国呢？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們想通过这种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但是，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条件來說，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要在中国发展民族經濟，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不容許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軟弱的，他們对于革命的敌人有妥协性，即使在革命时，他們也不願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同封建阶级保持着密切联



系，因此，他們不願意徹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資產階級虽然在革命的时候需要利用群众，但是，当群众真正起来以后，他們却害怕群众。而不把几亿工农群众动员和組織起来，就不可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資產階級都不能完成。

事情很明白，在中国，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都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統治。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实现。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領袖毛泽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結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綱領。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必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只有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然后进入共产主义，得到彻底解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彻底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是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最大公无私，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最富有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因而它能够动员、組織和团結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毫不动摇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这样，就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获得大解放，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独立的国家，使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束縛下解放出来，从而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革命道路，經過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发揚了高度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英勇奋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终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和压榨下解放出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使中国由貧穷落后变成繁荣富强，必須把革命推向前进，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消灭一切剝削制度，把社会生产力从私有制的束縛下解放出来。早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提





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们党及时地领导农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紧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反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顿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他们说什么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等等。我们党驳斥了这种资产阶级观点。我们党指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是错误的，危险的。如果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势必要投靠帝国主义，或者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帝国主义决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是不是可以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现状“巩固”起来、维持下去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提倡“四大自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就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让资本主义去占领我们的阵地。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即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那就不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些人认为革命成功了，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没有了。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sup>①</sup>这就是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7页。



必須在繼續完成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政治战綫和思想文化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消灭階級和階級差別，消灭一切剝削階級思想。

社会主义是从資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它不可避免地要在各方面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要在各个領域中存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斗争。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在相当长的时期內还是有力量的，有影响的，他們还要頑强地同无产階級較量。由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級阶段，还不是在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城市和农村中，都还存在着資本主义的活动，存在着私有經濟的殘余和小資产階級的自发势力。社会上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工人同农民、城市同乡村、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別，資产階級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在工人階級的队伍中，在党政机关和經濟事业单位中，还会产生新的資产階級分子和貪污盜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門和知識界中，还会产生新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这些新的資产階級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經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資产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殘余势力結合起来，从各个方面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国际上，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国内的反动势力常常同国际的反动势力互相呼应，互相配合。

彻底消灭資本主义和封建殘余势力，是一場长期的階級斗争，它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复杂和更为深刻。但是，我們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巩固的政权，有强大的軍隊，有革命的人民。只要我們对階級斗争形势有清醒的認識，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資本主义和封建殘余势力的复辟，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順利发展。为此，要求我們所有的同志，进一步发揚革命传统，更好地学习解放軍、大庆和大寨的革命精神，保持精神振奋、意志坚强、不懈不驕、斗志昂揚的革命气质和革命风格；要求我們不滿足于已經达到的目标和已經取得的成績，而是胸怀大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乐于承担更重的任务，勇于夺取更大的胜利；要求我們抛弃一切同革命利益相抵触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打算，破除一切同无产階級世界观不相容的思想和观念。我們的絕大多数同志，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是能够这样做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无产階級专政的經驗教訓，指出：“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設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項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階級能够



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sup>①</sup>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前最中心的问题，就是在全国人民中间开展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次伟大的深刻的系统的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一个大革命。

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要重新教育干部，使干部更好地同群众打成一片，更好地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进一步地普遍地革命化。

一切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理论和科学等等工作的同志，都应该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在运动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取得新的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五年，不是风平浪静地渡过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兴风作浪，对我们进行攻击、诬蔑和破坏，加给我们种种困难，企图孤立我们，扼杀我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经受了各种考验，战胜了各种困难。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是越战越强了，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兴旺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思想。

十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回顾过去，瞻望将来，我们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无限的信心。我国人民的任务，在国内是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国际上是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我们的路程还很长，困难还很多。但是，我们相信，革命是不可战胜的，而革命却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的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前进！

<sup>①</sup>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 革命风雷

· 曹 禺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十五年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掀起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建立起一个崭新面貌的国家。

中国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被解放出来了，它像地下的洪流，一经掘出，便喷吐倾泻，汹涌翻腾，势不可挡。中国的劳动人民以一种从未有过的主人翁态度，统治着这块广大美丽的国土。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说的：大寨人所以那样辛勤和忘我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为集体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贡献力量。

陈永贵同志是亿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他这几句话和大寨人所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鲜明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的心永远是热气腾腾的；中国人民不但有火红旺盛的革命意志，而且对未来的信心

是坚定不移的。

十五年来各方面巨大的成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党和毛泽东同志一直领导我们高举着无产阶级革命大旗，进行着胜利的斗争。革命的风雷，轰轰烈烈，一直没有停过。我们同国内阶级敌人斗争，同帝国主义斗争，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斗争。我们还同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习惯势力与影响进行斗争。

十五年来，我们经过了多少次革命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也是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谁战胜谁的斗争。

文艺战线上也是如此。今年夏天，在北京举行革命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是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几百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京剧舞台，传播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广大劳动人民早已厌弃了这些旧东西，根本不去看它。而这些僵尸，阴魂不散，还赖在京剧舞台上。党领导革命的京剧工作者攻下这旧势力盘踞的顽固堡垒，工农兵的光辉形象豪迈地登上了京剧



舞台。从此，京剧舞台上生气勃勃，崇高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和优美动人的艺术，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改革之后，京剧艺术更丰富了，更发展了。像其他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革命的京剧工作者要求与工农兵紧密结合，他们上山，下乡，下连队，进工厂，要改造自己，彻底革命化。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思想打了一个大胜仗。近年来，话剧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为工农兵服务的好剧目，这正是因为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的缘故。

这些年，中国人民写下多少光辉夺目的历史，应该说，没有一天不是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度过的。新的力量向旧的力量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力量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斗争。解决了旧的斗争，又来了新的斗争；解决了新的斗争，又来了更新的斗争。在这些革命斗争中，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才有今天这样一个飞跃奔腾的局面。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像拦不住的万匹骏马，向前猛进。我们人人都从这革命浪潮中受到了教育。人的思想意识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有些不革命的人要革命了；革命的人更是奋发有为，高瞻远瞩了。在农村和城市里，“爱家迷”变成“爱社迷”，“爱厂迷”。而受了革命教育的老一辈，更用社会主义思想和艰苦

的劳动，教育着年青的一代。党告诉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个人的力量不过是星星之火，投进集体里才能燃起燎原的火焰。我们还是在创业的时代，要艰苦奋斗，永远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正是这样的教育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和知识分子采取正确的对革命的态度。他们为集体，为社会主义的祖国，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热烈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用阶级分析认识问题，在工作中走阶级路线，吃大苦，耐大劳，与贫农下中农紧密地连在一起，参加劳动，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从家门口要看到天安门，从天安门要看到全世界”，这句话是从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嘴里说出的，但它却正确地、真实地道出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感情。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各地这样蓬蓬勃勃的发展，是十五年来党通过不断的革命运动，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结果。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伟大的中国人民深刻地感觉到这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英雄确有用武之地了。然而也有极少数目光如豆的人，觉得在这革命时代里，风雷震耳，云水翻腾，时时都使他头晕目眩，便想停止在革命中流的岸上。他以为处在所谓中间的地位，“平平安安”，不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苟苟且且，自觉得计。仿佛这样，他便可以既不





沾湿了鞋，也不算脱离革命，可以稳稳妥妥地长久如此活下去了。但是事实会告诉这种人，哪里有这样一种凝固不变的“中间”状态？因为，革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形势逼人，到了最后，你必须决定走哪一条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马列主义的道路还是修正主义的道路？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宝珠，还是烂石头？这就看得很清楚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浓厚，而又想在轰轰烈烈的革命风雷中混，是行不通的。

十五年来，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前进，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加繁荣富强了。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里，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这一切愈来愈好的变化，不正是说明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才有了今天耀若朝辉的气象吗？

一九四九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彻底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万里长征”是个遥远的路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五年，虽然取得了光辉伟大的成就，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又

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因此，我们要坚决革命，非革命不可。有了革命，才有一切。一个人的政治觉悟是逐渐提高的。从革命，到不断革命，到革命到底，这样的阶级觉悟是在深刻的革命实践当中，才能获得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坚决做一个革命派，艰苦奋斗，把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全世界的革命事业的重担担起来。

北京市的怀柔县一渡河大队，原是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山区里。解放后十五年，党支部领导大家鼓足干劲，治山沟，整滩地，垒坝塘，闹好了水利，引来了电力。如今，沙滩上是一片片平整肥沃的良田，山坡上是数不清的垂实累累的果林。电灯、动力，处处都是。水上了山，过了岭，它的粮食去年已经亩产五百四十八斤，产量指标已经“过了黄河”。公路开进了山，公社的山货源源不断地运出去。过去，这个穷山沟，遇上荒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如今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社员们无论在生活上、文化上、政治觉悟上都大大提高了。

像一渡河这样由穷变富的地区，在全国可以说遍地皆是，不知有多少了。是什么缘故使我们这辽阔广大的土地上，起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一九六一年，那正是在我们连续受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困难日子里，我到一渡河，党和群众正以冲天的干劲



向困难作斗争，我看到解放前扛了三十多年活的老贫农王振友同志，他和我谈了一夜，最后，他说：“不能忘记党！不能忘记阶级！不能忘记革命！”这句话刻在我的心里，永不能忘。

今年三月，王振友同志逝世了。一渡河所有的老一辈人和青年人都在这位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老党员的墓前，举行悼念会。当时，革命的新生力量已经在一渡河成长起来。他们继承前辈的革命事业，表示要记住王振友同志的话，他们说：“千句万

句，顶不上他这一句：不能忘记党、阶级和革命！”

革命的风雷，正以气吞山河之势，不断创造壮丽的史篇。几十年来，我们在革命的风雷里，锻炼、成长。今后，我们将使我们的下一代也在革命的风雷里，锻炼、成长。是革命的风雷，使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破坏了腐朽的旧世界，建设了人民的新世界！

现在，革命的风雷已经响彻五湖四海；今后，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必将响彻革命的风雷！

## 战斗的社会主义文学

· 刘白羽 ·

我们生活在一个英雄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时代里。我国人民正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其伟大的创造力量震撼着全世界。在这个斗争、前进的大时代里，共产主义的真理显得更加光辉灿烂了。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新的时代不能不向我国的革命文学家提出新的问题。

革命更深入了，时代更前进了。我们的革命文学家，应该更尖锐、更深刻、更明确

地考虑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什么样的文学，献给正在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彻底革命的人民群众。文学，是成为鼓舞人民战斗精神的武器，还是成为瓦解人民革命意志的工具？这是在每一历史关头，都必须严肃思考的根本问题，这是文学战线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文学走无产阶级路线还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负，关系到文学这种上层建筑能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



础服务的問題。因此，进行这场阶级斗争，是一个文学革命，也是一个社会革命。

新的世界、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只能是真正为工农兵的文学，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不可能是别的文学。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创造新世界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斗争决定着时代的面貌；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才能正确地深刻地认识时代的本质特点，从而决定生活中什么是值得注意的，什么是应当歌颂的，什么是必须反对的；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作家，才能同人民一道为创造新世界而斗争，并在艺术上概括人民的斗争生活，创造新的英雄形象，去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唯一充满革命精神的文学。它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种伟大胸襟所决定，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同时又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强大力量。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涌现出成千上万新的人物。雷锋、欧阳海、陈永贵、周明山、董加耕……这些崭新的人物，说明了现实的伟大变化，说明革命更前进、更深化了，说明共产主义真理牢牢地植根在我们生活当中了，说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过程当中培养教育了能够完成革命的新人。这样的新人，是走在时代前列，带动着生活前进的人。他们是同旧

社会彻底决裂、而又亲手创造新社会，具有高度共产主义风格的崭新的人。

我国的革命文学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满腔热情地为歌颂新时代的英雄而献出自己的全部艺术才能和力量。在戏剧、小说以及报告文学中塑造了无数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李有国、朱老忠、董存瑞、江姐和李双双、梁生宝、陈永贵、郭兴福、王刚，等等，正是这一些英雄，他们在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建设把困难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别人；他们战斗，劳动，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我们的文学，正是通过这些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洋溢着我们的高昂的革命时代精神。

但正是在创造时代英雄人物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他还告诉我们：“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sup>①</sup>

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反

<sup>①</su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4页。



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我们时代的革命人民的英雄形象。

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们歌颂新人物却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们把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英雄，侮辱为“消除个人因素”、“完全放弃个人利益的坚定的禁欲主义者”。

我们从来主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我们更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资产阶级主张个人利益至上，个人幸福就是一切。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种根本对立的道德观。充满个人私欲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谈论我们的大公无私的新人物呢！现代修正主义文学，已不折不扣地堕落为叛徒文学。这种叛徒文学力图从精神上瓦解革命人民的战斗意志，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他们不敢正视雷锋这样的人物，他们诽谤雷锋这样的人物，是因为雷锋等这样的英雄人物，正是他们所背叛了的、充满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不但要在文学当中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精神上的审判，而且一定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精神上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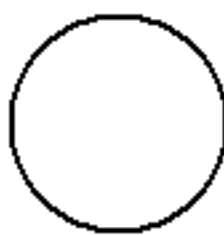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队伍中，也有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诋毁创造新英雄人物的伟大任务。他们假借各种口号，提出写“中间人物”等等主张。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描写中间人物形象，我们为时代文学画廊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而努力；但，他们提倡写“中间人物”，实质上是用来否定创造英

雄形象的任务，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文学领域中排除英雄形象。这些人要顽强地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他们不是要革命深化，而是要革命变质；他们不是要时代前进，而是要时代后退。真正的革命文学家，在这样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应当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我们应当更加热情、更加充分、更加有力地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更好地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担当起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任务。

存在决定意识。革命的现实，必然创造革命的文学。在中国是这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国家是这样，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辽阔的战线上浴血而战的人民那里，也定然是这样。我们坚信，在革命斗争中，一定会诞生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新的革命的文学。这种文学将在全世界兴起，像太阳一样升起，涤荡一切阴霾与沉雾，而扫除掉一切颓废、没落的反动文学，包括现代修正主义的叛徒文学。这种文学必将成为文学的主流，它会更加有力地为我们时代的前进服务，受到全世界一切革命派、一切劳动人民的欢迎。

建设和发展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键是什么呢？

《红旗》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



指出：“文学艺术要革命化，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革命化。”是的，一个没有革命精神的作家，是写不出有革命精神的作品来的。只有充满无产阶级革命气概的作家，成为一个现实斗争当中的战士，才能成为一个文学斗争当中的战士。

当我们考虑我们的文学新的战斗任务时，这就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这一真理，根本问题是个立场问题。他说：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是贯穿于整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条鲜明的阶级路线。只有坚定不移地遵循这条路线，真正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才能在投身于火热斗争当中敏锐地看到新生事物，热情地歌颂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胜利。现

在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面前，我们的文学作家，应该更加深刻认识和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到生活中去，才能看清生活的主导方向，才能创造真正的战斗的社会主义文学。

新的时代，新的革命，要求每个作家进行抉择，是站到时代前列去呢，还是为时代所抛弃呢？我们必须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否则，像鲁迅早先所说的：“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这个事实在新的形势下，还会以新的姿态出现的。坚定的革命文学家，必然在斗争锻炼中成长，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文艺队伍必然成为文学的主导力量。

我们国家走过了英勇的十五年，今天，让我们倾听一下我们人民前进的更加豪迈更加雄伟的声音吧！这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更大胜利的声音。全世界觉醒起来战斗的人愈来愈多，这是一个革命大风暴的声音，真正的革命作家，应当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创造更多更好的，既有鲜明的思想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的、战斗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让我们为新的时代前进而欢呼，为新的时代前进而高唱！





# 科学技术工作的革命化

李四光

科学技术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但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了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实现全面的革命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项不可分割的伟大革命运动。通过学习，我体会到这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概括。

从科学技术工作的角度来看全面革命化，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

第一、组织领导问题，这主要是肯定党对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必要性，保证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当然也涉及一些组织形式问题；

第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思想作风问题，这主要是人的革命化问题，也就是思想改造问题；

第三、科学技术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主要是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問題。

现在概略地回忆一下，经过十五年来几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三方面每一次

获得怎样的成就，并且为进一步的革命化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就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在一九五二年前后，科学技术工作者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在这段时间里，还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经过广大群众的揭露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受到空前剧烈的震动。经过这些运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首先从政治上划清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界限，同时，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本身和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危害性。具体地说，在当时有下述几点初步认识：首先是必须改变过去脱离实际、为科学而科学的作风，确立科学技术工作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其次是必须改变过去自由散漫、各立门户的宗派主义作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团结协作，使我国科学技术能获得充分的、迅速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三是必须改变自高自大、脱离人民群众的思



想作风，努力向工农学习并与工农相结合，以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第四是要彻底清算崇外思想，特别是崇美思想，以恢复民族自尊心，从而以坚强的信心和毅力来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建设我们的祖国。总起来说，这一时期的革命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思想上兴无灭资的开始。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它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继续革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五七年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引起了全民的反右派斗争。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斗争的一个新的高潮。在科学技术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科学技术工作者思想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也受到了严格的批判。

经过反右派斗争，完全肯定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党来领导，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也认识到党能够领导，从此，科学技术机构的组织领导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人们广泛地、自觉地争取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重大指导作用，并且出现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单位。他们掌握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

论》的思想武器，解决了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一阶段的大革命，把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纳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轨，在科学技术工作领域中发扬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国科学技术界的革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打破陈规、破除迷信，普遍地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在党的科学技术要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指导下，采用了各级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方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技术协作、搞“试验田”等群众运动。这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起了显著的作用。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掌握在少数专家手里，科学技术从广大群众中获得了新的有生力量。在短短期间，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无论在理论方面，或者在联系实际方面，都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

在党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号召下，科学技术工作者认识到，必须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便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少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群众一起参加了生产劳动，从而加强了他们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在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实践，对推进工作的方法和程序，逐步有所认识，首先明确了在不同专业的领



域內，各自具有的特长和各自工作崗位的特点；其次为了完成某一任务或者某些任务，必須把那些特长和特点适当地結合起来，在同一机构和不同机构有关专业部門之間，密切进行协商，建立具有具体形式的中心，作为試点来开展試驗性的工作，直到取得更多的經驗，获得良好的效果之后，再进行推广。

由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人們都感到，要解决任何一个具体問題，完成一項具体任务，都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不同学科的理论探索和多方面的科学实验工作，这样，科学技术工作的大协作就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了。同时人們也認識到，科学实验在許多方面不仅限于小型的实验室的工作，而且需要大量精密的器材和紧凑的成套的配备，这些配备的組成和管理，可能与大型企业相当。这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工作的特点。这个特点和大协作，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地具备了这些条件。在大协作的鼓舞下，科学技术工作者認識到，有必要大力克服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开始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在发展科学和完成任务的努力中，人們認識到，既不能忽視当前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問題，也不应輕視长远理論的探索；既不要做空头的政治家，也不能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这一次革命运动明确了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須走又紅又专的道路。

一九六〇年以后，在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在大跃进的基础上，由于大力地全面地坚持貫徹执行了党的調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針，全国各級科学技术机构得到了大規模的調整，具有良好基础和已經取得显著成績的机构，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充实。科学技术工作的质量，显著地有所提高。党还向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結合起来。这一系列的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具有历史性的革命意义。它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新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通过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通过科学技术工作的实践，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更明确地認識到自力更生的重大意义，因而在工作中，鼓起了冲天的干劲，激发了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

现在，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一步步地深入发展。尽管我們已經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资本主义势力并没有灭亡。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阶级斗争还在以各种形式繼續不断地进行着，而且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在知識分子成堆的科学技术界，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目前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在城市乡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比过去历次运动都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革命。在这种形势下，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須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划清敌我界限，同时根据团结——批評——团结的原则，认真地开展批



評和自我批評，自觉地繼續进行自我改造，不断提高階級覺悟。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發揮高度的革命精神，才能促進生产的高漲和科学技术的現代化。

目前，在广大知識分子中，又一次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十幾年来的工作实践告訴我們，毛主席的著作，例如《實踐論》、《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对解决科学技术問題的正確路綫，是不可缺少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学习科学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它為我們在工作中学会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明确的途徑。解决科学技术問題，和解决社会、政治問題一样，我們的思想方法是不能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

回顾十五年来，在历次革命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涌进的过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想到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之間的相互联系。如若单讲科学实验，人們可能考虑到，这一方面的革命运动，有它自己的特点。关于基础理論和实验器材的新发现，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和生产实践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这是对的。但是，我們要問，那些革新了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生产实践方式，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很清楚，它們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我們又要問，生产斗争能不能离开階級斗争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实验又必須密切結合階級斗争，为无

产階級的政治服务。

回顾十五年来，一次又一次的伟大革命运动在科学技术領域所产生的巨大变革，我們就会以万分激动的心情，感謝党在历次革命运动中，对我們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自我改造方面所給予的热誠的教育和帮助；感謝党在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和所制訂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我們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今天已經建立了坚定的信心，认清了为促进革命化而繼續努力的方向和方法。目前，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是：繼續認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两条道路的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們要繼續学习解放軍，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坚持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鏟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影响，在努力建設社会主义的同时，繼續認真进行自我改造，挖掉一切修正主义的根子。作为年长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我們必須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誠心誠意地传授給年輕的一代，为国家培育优秀的科学技术工作接班人。

我們还必須牢牢地記着毛主席的教导：“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我們必須戒驕戒躁，繼續努力，为了把我国建設成为具有現代农业、現代工业、現代国防、現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 受革命化教育的十五年

周培源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十五年了。十五年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国的知識界在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里，也不断受到教育、改造与锻炼。对我自己来说，新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十五年，也是我自己不断受到党与劳动人民的革命化教育的十五年。

回想十五年前，在平、津与南京相继解放后，我当时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蒋介石的反动王朝被推翻了，中国人民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专心发展工商业与文教科学事业，而我自己也可以安闲地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了。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认为，在当时国内反革命势力尚未肃清，封建土地制度尚未摧毁以及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从中国大陆被赶出去，仍希望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就可以不再进行复杂尖锐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就可以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伟大的毛主席及时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历史性文件中向我们指出：在国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在国外我国人民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即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十五年来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预见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美国政府就发动了疯狂的侵朝战争，同时非法侵占我国的台湾，并把战争矛头指向我国的东北。美军在侵朝战争中所采取的极端残暴手段，包括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远远超过了日本军国主义与希特勒法西斯，使我开始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胜利，使我初步批判了崇美、亲美与恐美的思想。当时在国内同时进行的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三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给我国农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上述三大政治运动，是我在解放初期所受的最深刻的革命化教育。

生长在旧中国具有民族立场的知識分子，绝大多数期望自己国家能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工农业与文教科学事业能够繁荣



昌盛。在旧中国这个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我們亲眼看到新中国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迅速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文教科学事业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面貌。生活与工作在新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积极努力地工作，并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教科学事业高潮的相继到来。但是一九五七年知识界中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污蔑党对文教科学及其他各项事业的领导。老实地说，在大鸣大放初期，我是分不清香花与毒草的。只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越来越猖狂，大量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把党的伟大成就说成一片漆黑，并且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之后，我才感到右派分子是在和党争夺国家的领导权，是要中国人民走回头路。因而，在党发出向右派反攻号令之后，我也鼓起勇气积极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一九五八年工农业与文教科学事业大跃进的政治与思想基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我们党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这是一场要不要革命、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论战，是一场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命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通过几年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通过对有关文件和材料的学习，使我认识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丑恶面目，从而增强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在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

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在继续地进行着。近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我们坚持革命精神，实现革命化。所有这些，都使我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对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我也是通过工作实践和学习，受到党的不断革命化教育，从毫无认识而逐渐接受的。一九五〇年中央教育部举行了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了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与院系调整的工作。当时我很想不通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与院系调整。我认为我所在的旧清华大学，从教学工作、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等各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所理想的学府，没有必要加以改革；对北京的几所大学要进行合并与调整更使我不可思议。一九五二年初，学校在党领导之下进行了群众性的三反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三反运动中我才发现自己在清华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清华大学，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理想”。学校的许多部门都有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有些人貌似“正人君子”，在背地里则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群众对学校这些阴暗面的揭发，打开了我的眼睛，从而鞭策我更积极地参加三反运动，端正我对教学改革与院系调整的态度，使我欢迎教学改革并积极参加院系调整工作。

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党所领导的新型的高等学校，在政治、行政、教学、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光荣任务，对学生的政治、学业和身体健康，都十分关怀。





专业教学计划的大力实施和教学方法的逐步改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由于坚决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方针，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学水平不断上升。在学生大量增加、教师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党发挥了师生的积极性和集体主义精神，通过青年老年结合、交流经验、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等具体措施，迅速培养出了大量的青年教师。同时，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为学校师生创造了优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所有这些，使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合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成批地成长起来。

一九五六年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制定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很快展开。原来薄弱的或空白的领域，迅速得到充实和建立。在全国人民“出成果，出人材”的迫切要求下，高等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都作出了贡献。

这是一片光辉灿烂的图景，在解放前旧大学工作的人简直是不敢想像的。那时的旧大学，课程安排只靠一张“课程表”，教与学基本上无人过问，学校内部宗派林立，学术空气甚为薄弱，经费拮据，设备简陋，教职员工的工资无法维持生活，学生在校如同无人照管的孤儿，毕业就是失业。两者比较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

一九五八年，党进一步规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从此，我国的教育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方向。在旧中国，进入大学学习的，多数是官僚、地主、洋行买办和有钱人的公子小姐。解放后由于贯彻了党的高等学校为工农开办的方针，今天高等学校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自一九五八年起，生产劳动成为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之后，师生的政治面貌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们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大为提高。由于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学效果也有了新的改善。现在，高等学校的工作者，正在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指示而积极奋斗。

总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其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一样，达到了新的阶段。

当然，在高等学校工作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例如，在各种不同学校与不同系科中，如何有效地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劳动者，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具体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如何做到“勤俭办学”等等。我相信，只要遵循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教育方针，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得到解决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从十五年来亲



身的经历中，我体会毛主席这个英明指示的正确性。我自己在解放初期认为旧中国的高等学校毋庸改革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而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一系列方针和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党代表真理，党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党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奋斗。由于我们长期在旧社会中生活、工作，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今天不可能没有错误思想。我们能够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并接受党的领导，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实践、学习与改造等奋斗过程。只有积极参加毛主席提出的上述三大革命运动，通过我们自身的实际斗争，密切和群众的联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真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并积极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

努力。

值此全国欢度国庆十五年之际，一方面我们为在党领导之下祖国人民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感到无比自豪，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摆在我们知识界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在国内我们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上要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及现代修正主义者。我们只有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对我自己来说，十五年来所受的革命化的教育，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前进，世界革命也在前进。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能跟上时代的前进洪流，永远做一个革命派。

## 学习毛泽东思想，做好气象工作

顾 震 潮

在这建国十五周年的时候，回想建国以来气象工作的发展，更觉得革命精神的可贵，革命化的重要。

记得还在建国初期一九五〇年的上半年，我们的气象工作的摊子正开始铺开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是一大堆问题。当时几乎一切要从头做起：台站建设问题，仪器器材问题，干部问题，天气分析预报方法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就拿我所从事的天

气分析预报工作来说，遇到的也都是些新问题：人手很少，工作需要迅速展开，而且由于祖国空前的统一，天气预报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天气预报工作的质与量都和过去的要求大大不同。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们这些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技术干部来说，真是不知从何下手。在干部问题上，有人要求正规化，主张慢慢地等气象方面的大学毕业生来参加工作（那时，每年全国才有



几个气象方面的大学生毕业);在工作崗位的分配上,有人不願結合需要做当时十分迫切的天气預报工作;在分析預报技术上,还有人丢开中国天气的实际情况,丢开中国天气分析和預报的实际問題而迷信外国的“鋒面气旋”过程、“气团分析”,硬搬一套外国現成办法,如此等等,总之,就是不注重解决实际問題。

这时,領导上指出,我們做的是革命工作,要有革命精神,用革命办法,并組織我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頓党的作风》等著作。經過学习,我們才認識到气象工作必須为革命服务,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尤其是学了《实践論》,明确地体会到只有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把气象学的一般原理和中国气象的实际情况結合起来,才能够既解决中国气象工作的实际問題,又能够提高气象学的普遍理論水平,使現在还没成熟的气象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領导上又組織我們进行参观,学习延安当初解决八路軍医疗干部不足的办法,学习解放軍許多战役战斗中从具体条件出发,克服困难的办法。我們看到了这些范例,才想起用短期訓練班的办法,来訓練急需的天气預报干部。經過天气預报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終于在短短的二、四年中,培养了不少天气預报干部。由于在实际預报工作中,有意識地摆脱一些外国教条的束縛,具体分析中国天气的特点(那时記錄非

常稀少,往往更容易套用外国的天气模式),我們从头摸索,初步認識了一些过去沒認識清楚的本国天气系統、本国天气变化的規律,开展了我国过去从未做过的一些天气分析預报,例如全国性的中期寒潮預报、雨量預报等。这样,我們的天气分析預报工作才在技术上略略有了一些基础。在进行这些工作中,也使我們对本国天气的一些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認識,从而揭发了本国天气的一些特征,对东亚大气环流問題也得到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工作,我們也更进一步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于发展我国气象工作有着深刻的意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找到气象工作的指針。

第一个五年計划以来,我們天气預报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我們在技术上赤手空拳的情况下,由少数人就搞起了当时国际上作为預报尖端工作的天气数值預报,我們的长期預报也不断地創造自己的方法。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国天气預报工作更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不但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气象工作要为生产建設服务,并且提出了天气預报方法的改革,天气預报大中小結合、以小为主的方針。由于认真地貫徹这一方針,打破了历来的常規,再小的台站也进行补充天气預报。就我自己亲身經歷的地方來說,南边如湖南山区,北边如内蒙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林区,补充天气預报都作得很出色。一些气象单位,对許多重要任务的天气預报做得更是漂亮。在过去这是不能設想的



事。这是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面向台站，深入预报实际的结果，是广大预报员、观测员发挥革命干劲、辛勤劳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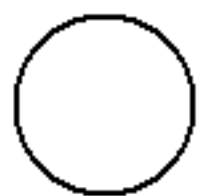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气象科学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九五八年以来，大气环流的研究工作更注意到与本国天气的联系，围绕着一一些对我国天气有影响的重要天气过程（例如与寒潮有关的阻塞形势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协作研究。天气过程的基本研究也大大开展起来，大气物理的工作也从无到有地迅速建立起来，气象局，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协作也更为密切了，比起大跃进以前来，真是大大不同。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台站上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预报的技术研究、总结。这在现在看来似乎也很平常。但是，在七八年以前这还是难于做到的。只是由于我们思想认识提高了，对于本来以为不屑为之的一些工作肯做了，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而造成的一

些唱对台戏、相互瞧不起的情况消除了，台站上的同志也不再有自卑感了，才有了这些工作上的进步。

由此，我体会到，建国十五年来气象工作是在不断革命化的过程中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而气象工作不断革命化的过程，也是我们气象工作者逐步革命化的过程。

十五年来，气象工作虽然作了不少成绩，但是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工作是不断深入的，天气动力学、大气物理等方面的工作如何进一步结合中国气象实践，既解决当前的各方面所提出的迫切的重要的气象问题，又看到气象事业的长远利益，长远需要，这还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任务，我们觉得需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扬革命精神，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革命化，这是气象工作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



## 在建設事业中貫徹革命精神

李瑞环

我出身于一个貧农的家庭。解放前，家中十一口人，只有八亩坏地。为了生活，父亲給地主扛短工，母亲白天黑夜地織布紡綫，可是，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当时，母亲多么希望改变家中的穷日子呵！她經常鼓励我們說：“你們弟兄七个人，总会有一个有福气的，我們不会永远受穷。”她还特地供了一个財神爷，每逢初一、十五，过年、过节，就叫我們給它磕头，求它显显“神通”。母亲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是生活仍旧是一年不如一年。到了解放前夕，全家甚至连糠皮、麦麸都吃不饱了。旧社会那会給穷人好日子过呢？希望一再破灭以后，母亲再也不說“七子发家”一类話了，却常常說：“你們都是穷命，生在穷家，只有受罪。井底下的碌碡，翻不了身啦！”

平地春雷响，东方升起了紅太阳。一九四八年，我的家乡来了解放軍，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粮食、土地和农具，有了吃的和穿的，叔叔、哥哥参加了解放軍，父亲也参加了农会。最重要的是，我們再不受地主阶级的

气了。事实教育了我們全家，烧香磕头不管事，只有共产党领导群众鬧革命，才救了我們。

解放后不久，我就到北京参加工作，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在参加首都的建設事业的过程中，我进一步認識到革命的伟大作用，認識到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的建設事业，一天一个样地飞跃发展，特别是貫徹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以后，变化更大，出現很多史无前例的奇迹。几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总路綫就是革命的路綫，执行总路綫的过程，就是革命的过程。革命，不但要同自然界斗争，而且还要同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迷信思想、保守思想、习惯势力等作斗争。可以說，沒有革命，沒有斗争，就沒有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

現在，就拿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來說吧。

第一，我們青年突击队参加了首都人民大会堂的建設。人民大会堂这样宏伟、艰巨的工程，能够在十个月内建成，并不是輕而



易舉的。恰恰相反，工程一開始，我們就遇到很多新問題、新困難，其中有很多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在解決這些問題、克服這些困難時，都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例如，我們開始就碰到了一個難題——立柱子的模型板。領導上要求我們隊在七天內把分配到的柱子模型板立起來。本來，我們木工有一套做這種活的傳統方法，就是一塊一塊地立，一截一截地接，接起來以後，在半空中釘板子。開始時，我們就按照這種老辦法來做。可是，人民大會堂的柱子又高又大，相當於一般三層樓的建築物那樣高。很顯然，如果按照老辦法做下去，不僅柱子的質量沒有保證，而且工期要比原計劃超過一倍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經過反復討論，學習了毛澤東著作，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立柱方法——先在地面上把柱子的模型板完全安裝好，然後再將它整個地豎立起來。這個新方法一開始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有人說“這是亂出主意，不懂規矩”，有人說“我干了幾十年，同外國人打過交道，都是用的老辦法。你們可是不自量力，自找丟人”，有人甚至說我們不是木工，而是“玩命專家”，等等。我們隊里也有少數人動搖，說什麼“我們不爭名，不爭利，最後爭了一肚子氣”。當時，在我們面前擺着兩條路：一條是向這些舊思想妥協投降，不改革了；另一條是向這些舊思想作鬥爭，堅持革命的方法。我們在黨的支

持下，堅持了革命的方法，終於在三天半時間內，完成了原定七天的生產任務。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開始時不服氣，還是用舊辦法操作，同我們比賽，比了兩天也服輸了。我們認為，新方法的勝利，就是革命精神的勝利。

第二，過去在我們建築業中，流傳着這樣兩句話：“放樣技術高不可攀，不放大樣除非‘魯班’。”這就是說，木工的一些複雜的技術活，都要由技術較高的老師傅先在地面上鋪上平板，划個實樣兒，根據實樣，量出各部的尺寸、角度，並且做出樣板，然後再按照樣板下料施工。這個辦法，既費工又費料。有時做個小屋架只要一、兩個工，可是放大樣、套樣板，就得用好幾個工。而且，這種活還非得老把式來干不可。遇到這個問題，我就琢磨，能不能找個科學的方法來代替老辦法呢？可是，翻了很多書，都沒有談不放大樣的事兒，後來我問老師傅，也說是“沒門”。有人還給我講，放大樣是“魯班”給咱們木工留下的老規矩，我們木工都是“魯班”的弟子，應該好好聽祖師的話，不可胡思亂想，干沒影兒的事。這些話，當時對我有很大刺激，我是墨守“祖師爺”的成規呢，還是堅持革命的方法？難道放大樣真的不能改了嗎？我反復考慮以後，決定還是堅持干下去，找新辦法。最後，終於從一位工程師那里得到啟發，可以用計算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提起計算，當時我只有小學文化水平，而要改革放大樣的方法，必須具有三角、几





何等知識，這對於我來說，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關。曾經有人諷刺我說：“高中學生才懂三角、幾何，木工里哪有高中生，高中生誰來當木工。”我沒有管這些風言風語，既然要學會三角、幾何才行，我就下定決心，先攻文化關。我寫下了“立下愚公志願，何懼智叟流言”的決心詩，堅持文化學習，邊學、邊摸索，經過幾年的時間，終於學會了三角、幾何，並且摸索出一套不放大樣的新方法。

當我掌握了這套新方法時，正是人民大會堂結構工程的收尾階段。當時任務非常緊迫，因為如果結構工程不能如期完工，就不能進行內部的裝修工程，從而會影響整個工程的進度。而結構工程的關鍵部位，是做外簷模板。這項工程的工作量大，技術複雜，需要看七、八張圖紙。為了迅速完成做外簷模板的任務，我們就正式向領導上提出，這項工程不放大樣，用計算方法來施工。這個意見一提出，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特別是主管技術員很不贊成。他說我們是“沒腦袋的蒼蠅，瞎撞”，又說什麼“想露大臉，必現大眼”，並且威脅我們說：“這是人民大會堂，干壞了要受處分。”多年的願望，眼看就要實現了，想不到又碰到釘子，心中非常難過。這時，同我相處很久的老師傅，也拉我到酒館去談心。他說：“我和你呆了好幾年，在這個緊要關頭，我不能不拉你一把。年輕人可要知道利害啊！我蓋的房比你看的房都多，可我都沒聽說過不放大樣的事，你這

不是自找苦吃嗎？不放大樣，蓋個小房子試試還可以，人民大會堂怎么能這樣干呢？你要干壞了，問題就大啦，你可要仔細琢磨一下呀！”怎麼辦呢？是干還是散？最後，我們向黨總支匯報了情況，黨組織非常支持我們。總支書記說：“干革命就會有人反對、有人贊成的，不要怕反對意見。干革命就要敢於勝利，不能在關鍵時刻後退。不過，不可瞎干，要慎重地考慮，仔細地試驗，不要給工程帶來損失。”我們按照黨的指示，在老師傅的幫助下，經過反復試驗核對，大膽地把七十多立方米的木料，按計算的尺寸，用機具加工出來，然後安裝上去。安裝的結果，尺寸完全合適，只用三天時間，就完成了原定七天的任務，實現了多年來不放大樣的理想。

過了一關又一關，一關更比一關難。我搞的計算方法，大家雖然都很需要，也很想學，可是因為比較複雜，大多數木工不懂三角、幾何，掌握不了。如何使這種計算方法為大家所掌握，並推廣使用，便成了一個新的問題。這時有人對我說：大伙掌握不了不是對你更有利嗎？這樣你就成了獨一份了。大家真的都掌握了，你不是白干很多年嗎？這個話乍聽起來好像是為我好，可是仔細一琢磨，這不是資產階級思想向我進攻嗎？我們的先輩為革命連生命都不顧，難道我們今天做工作還應當存有私心嗎？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共產黨員，必須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我怎么能



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呢？最后我还是反复找老师傅请教，找有关书籍参考，经过十个月的努力，又在原有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简易计算方法，使懂得加减乘除的一般木工都能掌握。

第三，由于建筑业装配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抹灰工作就成了我们单位的薄弱环节。公司领导要求我们突击队从木工改为抹灰工。改行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新问题。大部分队员都干了二十几年木工，最短的也干了十二年，对木工都有了感情，舍不得放下斧子、刨子、锯子。同时，我们在木工方面还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大家在钻研业务上，都有个长计划，也有个短安排，舍不得丢掉。也有少数人认为当抹灰工影响提高本行技术，影响升级，少拿奖金，当木工是个大将，当抹灰工变成了小卒。面对这样问题，党组织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有关文章，使大家逐渐认识到对木工有感情固然是好的，但是在工作上应该服从党的需要。做木工是干革命，当抹灰工也是干革命。现在党需要我们改行当抹灰工，我们就应该下定决心，首先革掉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去完成新的任务。有的队员还写了几句顺口溜：“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当好抹灰工，只要是党需要咱，有点困难

算个啥。”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愉快地放下木工工具，拿起了抹子，走向新的革命岗位。由于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干劲也就大了，在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有的同志把手烧破了都没有怨言。同时还由于大家在工作中边干边想，勤分析，多总结，不仅迅速掌握了抹灰的传统技术，而且解决了一些抹灰中的困难问题，掌握了机械抹灰的技术。

几年来，我们队不断进行了一些技术革新。在这当中，我体会到，技术革新是一项革命的工作，必须具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采取革命的方法，才能做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可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都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新旧思想的斗争，在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时，又必须贯彻阶级斗争的精神，坚持不断革命，才能取得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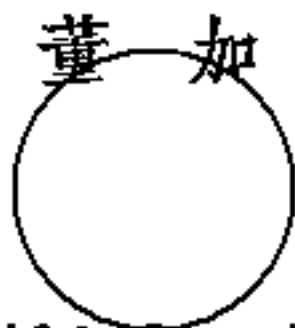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革命带来的成果。我们在工作上能够做出一些成绩，也是党不断教育我们实现思想革命化的结果。今后，我们要想取得更大胜利，也只有坚持实行革命化。没有革命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幸福，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要永远高举革命的大旗，奋勇前进。



身居茅屋，眼看全球，

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董如耕



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消息。我把这则消息看了又看，想了许多问题。

我想到，一个革命青年，不仅要在国内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进行到底，而且，要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想到，我们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对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我们手中的钉耙、锄头，就是刀、枪，我们生产的粮、棉，就是子弹，我们就要用这些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生产的粮、棉越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就越大。

这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当初，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为了解放全中国、全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理想，把生命置之度外，勇敢地走上烽火连天的革命战场。艰难困苦，饥寒、病痛和劳累的折磨，动摇不了他们必胜的革命信心。失败挫折，皮鞭、屠刀和子弹的威

胁，也夺不去他们革命者的气节。无数的革命先烈在烈火中倒了下去，唤醒了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为自身的解放，站起来英勇战斗。我国人民终于用鲜血和生命缔造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江山。

人是一辈接一辈的，革命事业也是一辈接一辈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革命风暴席卷全球的今天，每一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接过革命前辈的接力棒，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每一个革命青年都应该认真考虑，自己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都应该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绝不应该躺在前人栽的大树下乘荫凉。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深入开展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重要任务，知识青年应该勇于把这个革命任务承担起来。

以往，我总为自己出生迟了，没有赶得上参加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遗憾。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从国内来看，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时时在向我们作斗争，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新



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国际上，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扶植蒋介石残匪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同时，幻想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各阶级的思想观点，对人们发生着复杂的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个人当无产阶级思想占上风时，他就会一天天进步，当资产阶级思想占上风时，他就会一天天堕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阶级斗争中，随时随地受着阶级斗争的考验。

所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要关心生产斗争，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一犁一锄地耕耘，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又要关心阶级斗争，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只愿埋头生产，不管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

可能建设起来的。在今天，国际国内都有阶级敌人，有长期、复杂、曲折的阶级斗争，一个革命青年怎么能够只埋头生产、不管阶级斗争呢？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互相联结在一起进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不把阶级斗争放在首要地位，不仅不能搞好生产，而且，会因丧失阶级警惕性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

世界上天才亮了半边，革命的道路才走了一段。为了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我们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永远做彻底的革命派

黄祖示

在建国十五周年到来的时候，我心里高兴极了。十五年来，祖国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呀！劳动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工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当年烈士洒过鲜血的战场，今天都盖上了工厂、学校。从天安门广场，到遥远的边疆、海岛，处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切是怎样得来的呢？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字：“革命”。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祖祖辈辈受着地主阶级的欺压和剥削。我的祖父饿死在地主的大门口，父亲被地主逼瞎了一只眼睛，二哥、三哥饿伤、病死。爸爸妈妈一年到头拚死拚活，给地主当牛马，结果还欠了地主好多债，全家吃不上一顿饱饭。我七、八岁时，冬天没有穿过一件棉衣，而且经常挨地主的毒打。记得在解放前一年的腊月三十日晚上，有钱人家大酒大肉过新年了，爸爸却



領着我，深更半夜跑到地主家里，跟人家下跪磕头，乞求人家不要逼債。我和爸爸哭得嗓子都哑了，狠心的地主却罵了我們一頓，把我們一脚踢出大門口，还把我家的鍋和仅有的一床棉絮搶走了。我恨他們，永远不会忘記这个仇恨。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地主的子越越好，我們的日子却越越穷呢？我問爸爸，爸爸擦干我的眼泪說：“五伢子，这都是我們命穷啊！”在解放前，我很小，沒有受到党的教育，不懂得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的道理，不懂得革命，只认为爸爸說得对，不得不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当时，“命穷”这两个字，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里，透不过气来。

一九四九年底，我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解放了。好多干部来到我們家乡，領導群众斗争地主，实行土地改革。这是一场推翻千百年来封建制度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我当时才九岁，也跟着大人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土地改革以后，爸爸妈妈看着分得的房子、农具、粮食，乐得流出了眼泪。我們一家真正翻身了，我父亲的眼睛重見光明，我和弟弟們都进了学校。全家老小那个高兴劲儿，就不用說了。

想起旧社会的苦，不忘新社会的甜。可是，我們穷人的命为什么一下子会好起来呢？为什么好得这么快呢？我問爸爸妈妈，他們只是口口声声地說：“好日子是我們的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带来的啊！”除了这句话，就說不出更多的道理来。

一九五二年，我挂上了紅領巾，老师为了使同學們受一次階級教育，就領着我們到毛主席的故居去住了两天。毛月秋老爷爷跟

我們讲了很多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的故事。他讲了毛主席怎样在湖南省領導貧苦农民建立农会，同地主作斗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屠杀共产党人和貧苦农民，当地貧苦农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等等。毛月秋老爷爷讲得真好，一下子把关在我心里的两扇大門推开了。这时，我才初步懂得：我們不是生来命穷，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把我們压榨穷的。为什么我們的好日子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带来的呢？因为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領導我們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今天穷人翻了身，有好日子过，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群众鬧革命，打倒了反动派以后取得的。只有鬧革命，才能改变穷人的命运，只有坚持革命斗争，被压迫、被剝削的人們才有活路。

我常想，像我們这一家人，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群众鬧革命，推翻了反动統治階級，建立了新社会，不但我爸妈的骨髓早叫地主吸干了，而且我的尸骨也不知道在那个山头上叫狗吃光了。是呀，沒有革命，就沒有我黄祖示，也沒有我全家和我个人的一切。

自从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我经常暗暗地勉励自己：快快长大，快快长大，长大了我也去干革命。

一九五四年，我在高小毕业了，正赶上农村搞互助組。当时，人家有牛有車的都組織起来了，只剩下我們邻近八戶貧农沒有人要。区里来的干部就問我：“五伢子，你不是成天吵吵要干革命嗎？今天想叫你把八



戶貧农組織起来，鬧生产，挖穷根。这也是革命啊！这也是毛主席的号召啊！怎么样？”我一听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这也是革命，二话沒說，就同八戶貧农商量，組成一个互助組。他們又推选我当了互助組长。我領導这个互助組，越干越欢。我懂得，不能只想到个人的苦，还要想到整个階級的苦，不能只想到个人的甜，还要想到整个階級的甜。我家乡虽然解放了，貧雇农虽然翻身了，但是，他們过去受的剝削太重，生产工具很少，又缺衣少食，生活艰难，如果不組織起来，发展生产，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因此，組織互助組，挖穷根，这个革命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让所有的貧农、下中农摆脱貧困的生活，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九五七年，我們家乡成立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当了生产队长。这时，我对革命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层。記得当时有很多富裕中农不入社，在一旁說风凉話，說什么跟穷棍子搞在一起吃亏了。也有的农民还没有看到合作化的好处，入了社，过了些日子又要退社，想靠单干发家。更可恨的是，有些地主富农，趁机进行破坏活动，想搞垮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党給我敲了警钟，向我指出，这是一场階級斗争，一場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当时，摆在我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擦亮眼睛，坚持革命，斗争到底；一条是，背叛革命，走資本主义道路。我那时才十七岁，很多人替我担心，怕我被資本主义势力拖垮。但是，由于党的教导，毛主席的教导，我沒忘本，一心不二，坚持革命，放手发动貧农和下中农，跟資本主义势力展开了大辯論，稳定了人心，

发展了生产，在一九五八年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在頂住这场风浪的考驗中，我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認識到只有坚持革命斗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六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在入党志願书上写下了“請党相信，革命到底”的誓言。

一九六〇年，我应征入伍后，上級号召我們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什么要鬧革命？不革命行不行？怎样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几个問題，我从毛泽东著作里得到全面透彻的解答。我第一次翻开《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越看心里越亮堂，觉得毛主席講的話，句句說出了穷人要革命的道理。毛主席說，貧农“受地主的剝削”，“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丛集，如牛負重”，貧农“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毛主席这些話，写出了解放前我家里的苦，写出了所有的貧雇农的苦，写出了我的心思。我們的家这样苦，不革命能活下去嗎？所有的貧农都这样苦，不革命行嗎？我感到毛主席站在我們农民一边，为我們撑腰，心里很痛快。我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中国人民为什么鬧革命的道理。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揭露和批判了艾奇逊污蔑中国人民革命的謊言。艾奇逊說：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飯少了，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毛主席对艾奇逊的这些謊話，批判得非常深刻。他指出，失业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和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中国人民革命，“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我反复地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心里更亮堂了，眼光看得更远了。我找到了中国人民受穷受苦的老根子，不仅有农村的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它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我懂得了，我们要想彻底解放自己，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蒋介石还不行，更重要的，还要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同时，还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干到底，我国的革命胜利就不能完全巩固，天下的穷人就没有出路，没有好日子过。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耍两面手法，嘴里喊“和平”，实际上调兵遣将，到处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屠杀越南和老挝的爱国人民，并且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他们还支持蒋介石反动派企图卷土重来。我要警告美帝国主义，你们别做好梦吧！毛主席早就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你们这群野兽命定要走的死亡道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是我们革命人民坚决要走的胜利道路。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要依照这条定律，斗争到底，革命到底。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了。这种灾难也教育了中国人民，使我们懂得，在狡猾凶狠的

敌人面前，不采取革命行动，不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美国强盗在我国横行霸道，欺侮我国人民，抢夺我国财富，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糟踏得一塌糊涂，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吗？每当我想到这里，我的心里难过得像刀绞一样。再想起那些在战争年代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更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们把可爱的中国，当做自己的母亲，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对我们后来人，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呵！

今天，祖国解放十五个年头了。当我们庆祝这个光荣而伟大的节日时，我们能忘记过去、忘记革命吗？不，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忘记革命，就是忘本。特别是目前美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阴谋侵略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我们一定要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高举革命的旗帜，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做革命派，而且要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做革命派。我一定要做到身在连队，眼看全世界，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握紧枪杆，练好本领，随时准备迎接光荣而艰巨的斗争任务，为我国革命事业和世界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 在貧农下中农中扎根

张 朝

在紀念国庆十五周年的时候，我想向青年們汇报一下两年来我在农村中参加劳动鍛炼的一些收获和感想，同大家相互勉励，共同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快步前进。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艺术，曾經有过长大当一个作家、导演、演員的願望。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如願地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当时，党正在号召知識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繼續进学校呢，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我毅然选择了后一条路，决心放弃自己的爱好，服从祖国需要。于是，一九六二年秋，我們全家来到了安徽省肥西县袁店公社，安家落户。

初下乡，就开始了劳动鍛炼，练赤脚走路，练晒日头，练挑担，克服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我心里想：“过去在短期劳动中，和工人农民相处还不错，現在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問題不会太大了。”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个想法不正确。我第一次出去拾粪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拾法，动作很别扭，走到一个庄头，有七、八个农民立即围上来看我拾粪。有个妇女还喊：“嚟，你們来看嚟，上海人来拾粪罗！”有的人就在議論：“你这个文人还来

拾粪？”当时我真慌，脸紅心跳，心想：“我要是在沒人的地方先学会拾粪，現在就不会出洋相了。”是回去呢还是拾下去？这时候，毛主席的話提醒了我，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冷靜下来，走上前向社員們請教，大家热心地教了我。回来想想，我为什么脸紅？为什么心跳？为什么有“偷偷学”的念头？这說明自己还没有真正虚心向群众学习，还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在劳动上虽然比社員差得远，要好好向他們学习，但是，政治思想方面总要比社員高些吧。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我总是看不到貧农、下中农社員的优秀品质。一次，貧农唐照华把自家的槌枷借給我学打麦，我歪来扭去，几下子就把槌枷打断了。当时，我又急又慌，心想这下可坏了，农民誰不爱惜自己的农具呢？他一定要生气。誰知唐照华不声不响地拾起槌枷就走。过一会儿，又把槌枷送給我，还說：“修好了，打吧，初学嘛，就是这样。”一片真誠坦率的心，深深感动了我，我从心里感到慚愧，为什么小看了唐照华？这說明就是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我也不一定有社員高。

从此以后，我才認識到，参加了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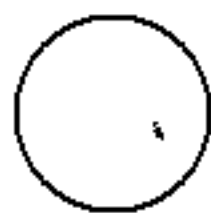
并不等于同工农群众结合了。刚到农村，我在农民眼中还是一个城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了解我，我也是不了解他们。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有一个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就是彻底改造世界观的过程。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认识不足，并且发现了自己的弱点。

生活告诉我，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来说，同工农群众结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老老实实地参加体力劳动。劳动，是结合的开始，也是结合的主要途径。不通过劳动，就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可学之处，就学不到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暴露自己不健康的思想，而不清除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就永远也成不了劳动群众的知心人。

党告诉我，一个知识青年要在思想改造中获得丰富成果，必须牢牢记住和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就是说，首先要在贫农、下中农中间扎根，只有扎正了根子，才能时时处处辨明是非，才能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锻炼要依靠他们，思想改造也要依靠他们。两年来，我亲眼看到贫农、下中农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给了自己很大的教育。春种秋收，秋种夏收，最难最苦的农活，都由贫农、下中农承担下来。一场涝，一场旱，通宵不眠，站在第一线的是贫农、下中农。今年春天，我们这里发了一场大水，水势很凶，半夜里，把庄前的最后一道堤埂冲开了一个大

洞，激流直涌进庄来。这时，有的人扛起大锹就溜走了。有的人说：“不行啦！快上庄子保家要紧。”贫农许先道的家，虽然不住在这个庄子里，可是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离开，看到情况紧急，他立即抱起两个大草把，连人带草，奋不顾身地塞进了洞口。水流马上变慢了。后来，大家齐心协力，干了一阵，堵住了水洞。我亲身参加了这场战斗，当我看到大水被我们拦在庄外时，我感到，不管碰到什么事，只要和贫农、下中农在一起，心里就踏实。

我在农村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接触中，亲身感到，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对人处事具有不同的态度。贫农、下中农对我是最诚恳、最真挚的。去年春天做田埂，我学着做了一截，有人在一旁赞美叫好：“张韧学会做田埂啦！”贫农许先道却说：“你这埂帮上是抹得光亮亮的，可是里头的土还没有踩平。”他说着就教我怎么干。还有一些贫农、下中农诚恳地对我说：“你干活比以前好多了，可是讲到学深学透还早呢，还要好好学呵！”我听了，从心底里感谢这些师傅。我想，如果我离开这些严格的、诚恳的贫农、下中农，而去投向那些表面上对我热火、故意抬举我的人，那我就会在农村扎不下根，甚至有扎错根的危险呵！贫农、下中农对我提出严格的要求，是出自阶级兄弟的友爱，是真正关心我，他们才是最可靠的人。我只有诚心诚意地依靠他们，接受他们的帮助，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同他们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我和貧农、下中农靠攏以后，立場和思想感情也逐漸在发生变化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参加了忆苦思甜会，会上有許多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长工和佃戶的人，一个个走出来訴苦。有的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坐在大伙中間，也流下了眼泪。我想到，过去在学校看“白毛女”这类影片时也流过泪，可是那时候流的是同情的泪，过了一些时候，印象就淡薄了。现在，这些訴苦的人，都是我平时熟悉的、在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我再不只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而开始有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他們的生活经历教育了我，他們的感情感染了我，使我对劳动人民了解得更多了，对地主阶级的罪恶認識得更加清楚了。这样，也就提高了我参加农村阶级斗争的自觉性。

不仅如此，就是在平时，貧农、下中农也经常在对进行阶级教育。本地有个大地主叫唐四胡子，过去收高租放高利貸，可是他装模做样，在后花园盖起庙来吃素念經。去年，我向他的佃戶問起这事，他們說：“你知道他念的是什么經？他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要好租（租米），南无阿弥陀佛要好利（利錢）’”。看，这真是讲得一針見血，又生动又深刻。我想：我这个高中毕业生为什么讲不出来呢？是文化水平比他們低嗎？不是。是因为自己的阶级观点沒有那么鮮明，阶级感情沒有那么强烈，对敌人的認識不深刻，不具体。

平时，我虽把阶级观点挂在嘴上，但是，

在沒有和貧农、下中农生活在一起以前，我实际上并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我的阶级立場是动摇的，阶级观点是模糊的。同貧农、下中农在一起生活以后，我才第一次体会到，阶级兄弟的苦就是自己的苦，阶级兄弟的仇就是自己的仇，我和劳动人民的命运是紧相連的。劳动人民都說不能忘本，我的本又是什么呢？我和劳动人民是一个本。我从小到大，吃的用的都是劳动人民創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学习的是劳动人民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这是絕不能忘記的。党和人民哺育了我，我應該归队，做一个能文能武的新型农民。

毛主席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两年的农村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毛主席这段話的深刻意义。我觉得，一个青年不管做什么工作，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者，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岗位是可变的，但干革命是終身的。而要革命化，首先要劳动化。两年来，通过和社員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开始从过去仅仅同情劳动人民，轉向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从过去仅仅在理智上尊敬劳动人民，变为从阶级感情上热爱劳动人民。现在，我刚刚在漫长的鍛炼和改造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未来的行程还是很艰巨的。但是，我的自我改造信念永远不会动摇，决心在劳动鍛炼中繼續恭恭敬敬地向劳动人民学习，以劳动为根，以群众为母，做一个黑皮、铁骨、紅心的劳动者。



## 更好地为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塑像

牧 惠

近两年来，反映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的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出現得比較多了。这说明，随着知識青年下乡上山形成一股革命潮流，知識青年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設，在实际斗争中实现知識分子劳动化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已經可喜地为更多的作家和业余作者所注意了。

革命作家总是密切地关注着新世界新人物的誕生，以自己的創作热情地促进着新世界的发展和新人物的成长。从所接触到的为数有限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思想上的深度各有不同，艺术上的成就也有高有低；但是，它們絕大部分都把先进的知識青年作为自己的主人公。

在短篇小说中，形象地刻划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崇高的精神面貌，热情地贊美他們的优秀品质，充分估計和表現他們在斗争中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指出知識青年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的广阔天地，对于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知識青年坚定地走上这条知識分子同劳动农民相結合的革命道路，对于在人民群众中兴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灭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輕視体力劳动的陈旧意識，都是很有现实

意义和教育作用的。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一个首要問題，是如何理解和概括他們身上的时代特点。作家愈是能够正确地把握和艺术地体现新人身上的这些特点，人物形象也就愈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作为塑造新一代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作品，同样要求作家充分研究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知識青年在政治品质、思想意識、道德观点等方面的时代特点。

早在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就已經明确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則將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sup>①</sup>从五四运动起，我国就有少数先进的革命知識分子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結合，再由此出发，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資格与农民运动相結合。在“一二·九”运动以后，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知識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結合的重大意义以后，知識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結合的过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党和毛泽东

<sup>①</sup>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6頁。



同志仍然一再強調知識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結合的重大意义，反复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結合，并且根据我国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指出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号召知識青年到农村中去，参加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斗争的风浪中把自己鍛炼成为真正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参加农业生产的先进的知識青年，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教育和鼓舞下逐步成长，走上知識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結合的革命化道路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是要老老实实地在农村当一辈子的农民。要走上这条道路，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考驗。我們作家笔下的知識青年，同实际生活向我們所展示的那样，大都是自觉地或比較自觉地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他們大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他們并不认为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是“沒出息”、“沒前途”的事情，他們明确地肩負着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来建設新农村、同时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革命任务而来到农村。因此，他們的思想一般都站得比較高。王汶石《夏夜》<sup>①</sup>中的树紅，从学校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工厂要人，好些小伙子都走了，叫他他不去”，因为他“有这么股拗脾气”，“他认定了什么事要干哪，十头大牛也拉不轉来”。这股“拗脾气”不是别的，就是热爱劳动农民，热爱农村的深厚感情，就是“撇不下这片河滩”，要同农民一起来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定决

心。王杏元《“铁笔御史”》<sup>②</sup>中的李鎮平，也是这样的知識青年。生产队里缺了一个記工員，經過支部書記的开导，他就下定决心，回村来讀“劳动大学”。許多作品中的知識青年形象，也都表现出这种听党的話，决心在农村中干一辈子，通过这条道路来实现伟大理想的精神特点。这种精神特点，也就是激荡在我們这个时代先进知識青年心中的革命暖流。

立志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应当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他們要在农村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继承和发揚革命前輩的革命坚定性，继承和发揚革命前輩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向貧农、下中农学习，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計名利，不图享受，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伟大革命气魄和共产主义风格，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夏夜》的树紅是刻划得比較成功的有着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形象。在这个“改革分子”身上，有着一股鏗而不舍的钻研劲头。他不仅学习和钻研农业生产的各种知識，而且在几乎沒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利用工余時間自学开拖拉机的技术。作品形象地刻划了这个“爱机器爱得神魂顛倒”的可爱的青年人的形象。这个“冒失”而又聪明的知識青年，仅仅“跟着机子看了几天，就敢一个人上去开”，而且“犁得还不坏”。可是，作品并没有滿足于这些，它更

① 《沙滩上》，东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② 《作品》，1963年新2卷4期。





进一步地表现了在树红的钻研劲头后面的、同这种刻苦好学精神相辉映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崇高风格。当学习拖拉机技术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树红宁愿留在队里“跟长尾巴的动力打交道”，先让别的青年去学。而且，他又发起大家共同组织一个机械化业余学习小组，在青年人学习科学技术中起着优秀组织者的作用。尽管这篇作品在表现树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方面，还可以展示得更加充分一些，但是，树红的形象仍然是高大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先进的知识青年的思想风貌。其他许多作品，也都在刻画了一些先进的知识青年农民的形象的同时，展示了青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作用。《“铁笔御史”》通过李镇平同“算盘精”李万本的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农村知识青年在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争中的革命的坚定性；张有德的《王静月》<sup>①</sup>，反映了知识青年王静月在移封建迷信之风，易买卖婚姻之俗中善于处理矛盾解决矛盾的智慧；……。这些作品，都不仅表现了农村的先进知识青年的优秀品质，而且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sup>②</sup>这句话的真理。

活跃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都面临着一个不断改造、不断提高、不断成长的任务。今天的知识青年，一般来说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是在学校里接触到一些理性知识，他们的阶级觉悟、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的生产知识、劳动本领都需要在斗争中不断积累，不断提高。从学习岗位转到生产战线，

从城市生活转到农村生活，又有着许多新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因此，在刻画先进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和表现他们在农村所发挥的作用的同时，必然需要表现他们在农村的实际斗争中不断进步的思想历程，从而更全面地展示知识青年的思想风貌，给人们提供一个知识青年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如何奋勇前进的图景。

要表现知识青年不断前进的思想历程，就必然需要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如何表现知识青年的弱点和缺点的问题。可以看到，由于有些作者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并没有嘲笑知识青年的这些弱点，而是对他们采取满腔热情的恰如其分的批评的态度，并且在描绘他们克服缺点的自觉性中进一步揭示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树红“犯纪律”擅自开动拖拉机，是同他钻研新技术的劲头分不开的；经过别人指出后，他又进一步地认识到“我那样干法，对驾驶员同志麻烦太大，又不合规程，从前我不懂，现在我懂得了”，因而不单止自己不那样干，也劝别人不那样干。恰如其分地表现先进人物的某些弱点或缺点，绝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虚假的艺术效果的需要，也不是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们如何自觉地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为克服这些弱点和缺点而自觉地进行斗争，以及他们在这些斗争中的逐步成长，使读者从这些人物的进步中取得正确的榜样。

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生根开花、发挥自己

<sup>①</sup> 《奔流》，1964年5月号。

<sup>②</sup>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95页。



的作用的过程，是同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作斗争的过程，也是同实际斗争中客观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作斗争的过程。人物的思想性格只有在矛盾和冲突中才得到体现和发展，革命的知識青年的思想光輝也同样需要在这些斗争中展开和发揚。因此，在階級观点的指导下，更深刻更廣闊地发掘和展示这些人物和特定环境的复杂矛盾，更是充分表现他們的精神面貌所必需的。事实表明，由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存在，由于旧思想旧习惯影响的存在，知識青年到了农村之后，不仅要克服同自然界作斗争中产生的困难，要克服农村生活比較艰苦的困难，还要克服社会和家庭方面客观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接受复杂的階級斗争的考驗。而且，这些困难和矛盾，又往往是复杂地交錯在一起的。李鎮平負責的會計工作，不仅在掌握技术、做好工作中会同他叔叔李万本的資本主义思想发生尖銳的冲突，而且还因为他媽媽的落后思想而使矛盾更加复杂。王靜月所进行的在思想意識方面移风易俗的斗争，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晚婚；但是，硬要插手王靜月的婚姻的王二斗，其实却是由于他（會計兼記工員）的賬目不清，眼看着王靜月的移风易俗活动就要“移”到自己的头上來，因而千方百計地“要把她踢出去”。这就表明，思想意識方面移风易俗的斗争，也同經濟战綫政治路綫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分割。在別的作品里，我們更可以看到，即使像在农村中安下心来，搞好集体生产这样一件簡單的事情，也同农村中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階級斗争息息相关。

充分地表现知識青年在农村中所遇到的

复杂的矛盾和尖銳的冲突，不要把青年人前进的道路写得过于平坦，过于容易，而且把具体問題的斗争放在比較廣闊的时代背景上去表现，把人物性格同社会生活之間的密切关系表现出来。这样，写出他們在克服困难和解决矛盾中的种种甜酸苦辣的感受，才有可能把人物的性格刻划得比較鮮明，比較突出，就有可能比那些一般地表现好人好事的作品具有更加深广的社会意义；人物的思想风貌也比較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階級斗争是仍然存在，并没有熄灭的。在这里，不仅有李万本、王二斗这些人的資本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而且还有着階級敌人对我們的事业的处心积虑的破坏。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由于社会主义的深入人心，階級敌人往往会采用各种各样隱蔽的、伪装的形式，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因此，如何学会同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隱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个仍需繼續解决的課題，更是摆在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面前的一个新課題。就所接触到的一些短篇小說来看，认真接触到这一方面的問題，深刻地表现这一方面的斗争的作品还是沒有的。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表现我們的知識青年的面貌，描繪知識青年在复杂尖銳的斗争中的成长，展示知識青年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相信是会更有现实意义，更有教育作用的。

安心在农村中参加生产，勤恳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固然是一个先进的知識青年所必不可缺的条件；但是，当他自觉地意識到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平凡劳动同



建设社会主义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休戚相关的关系的时候，他的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和持久，他的精神面貌就能显得更加高大。

先进的知识青年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这是党的长期教育的结果。正如一切先进人物都需要正确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一样，知识青年在立志扎根农村之后，仍然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表现人物的先进而不合理地贬低群众的思想面貌，把知识青年写成是村里唯一的进步人物，是不符合我们生活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在刻画知识青年克服主观上的缺点和客观上的困难的过程中，如何表现党和群众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也是我们在文艺创作中需要解决的。许多短篇小说表明，反映党和群众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可以有多样形式。有的作品着重表现党支部书记的关怀，有的着重写出某一个党员对他们的培养，有的着重展示某一个革命前辈对他们的教导所起的作用，等等。事实表明，在作品中着重刻画某一个具体人物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和帮助是有必要的。每一个人的进步，当然都是党的思想教育和影响的结果，而这些教育和影响，在具体生活中，在艺术作品中，又总是具体地体现在某一个人物的行动中而发挥出来的；但是，如果能在描写某一个具体人物对知识青年的教育作用的同时，表现出广泛得多的整个革命斗争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就更能深广地体现出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关怀。

用什么思想来教育知识青年，这是表现党和群众对青年的教育的一个具有原则性的

问题。许多作品都着重表现党和群众对知识青年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和革命的前途教育，结合实际斗争，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教育他们懂得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具体地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学会斗争，培养他们为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针对着当前知识青年的思想动向，有的作品比较注意教育知识青年正确认识他们在农村中的前途和作用，注意教育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同实际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不仅在那些表现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题材的作品中，而且在那些表现知识青年在技术革新、文化活动方面的作品中，都注意到这一点，强调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首先要学会干重活，干脏活，扎扎实实地打好庄稼人的底子，摸透土地的脾性，是非常必要的。

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是要使自己劳动化。这就是说，让他们同群众一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在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培养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磨炼出坚韧不拔的毅力，熏陶出劳动人民的品质，学会全国最普遍最大量的一种农业生产知识——种地知识，学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本领。在这个前提下，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推广新的农业技术，进行科学实验，为劳动农民的知识化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里的主次关系，先后次序是重要的。强调知识青年参加种地，学会种地，着眼点并不



是增加一点劳动力，更不是否定新的文化科学技术在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而是让知識青年的文化科学知识更好地結合实际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就目前的創作情况来看，我們需要深刻地表現知識青年作为农村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骨干力量作用的作品，我們更需要深刻地表現知識青年劳动化的深刻思想历程及它的巨大意义的作品。在表現知識青年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作用时，注意避免提倡知識青年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傾向，更不以此作为解决少数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知識青年的苦恼的途徑，看来是提高这类作品的思想深度所需要的。

由于旧思想旧习惯今天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在农村的知識青年中仍然有着一些落后人物。本着从团結的願望出发，对于他們的錯誤思想和行为給予恰如其分的批判，展示这些錯誤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引起人們的警惕和注意，是有必要的。我們也有一些作品較好地写到了这一方面。但是，正如周揚同志說过的：“我們应当看到旧社会所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在人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同时更应当看到人民經過长期革命斗争的鍛炼正在迅速地摆脱这些影响，特别是青年的一代就更少受到这些影响的拘束。”<sup>①</sup>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长期教育，以农业为基础的政策的深入人心，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浪潮的影响，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作用，使絕大多数知識青年都有着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不断提高的。因此，在描写到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中

的某些落后人物的时候，有必要掌握适当的分寸，更有必要充分地表現出促使他們前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更应当注意的是，在今天，无论就正确地表現我国的现实生活，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的要求來說，还是就进一步發揮文艺的教育作用來說，都要求作家把表現新人、歌頌新人当作首要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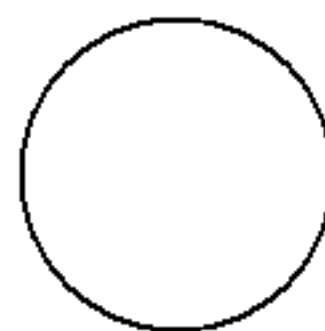
我們現有的好些作品，写出了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革命的精神面貌和他們成长的历程，是可喜的；但是，对于知識青年革命化來說，对于知識青年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設所可能起的作用來說，我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又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起点。随着知識青年下乡上山的人越来越多，随着他們参加农业生产的日子越来越长，知識青年灿烂的未来无疑会更加丰富多采，更加光芒万丈。现实生活已經給我們推荐出許多像董加耕、赵耘、张韧、侯雋……这样一大批先进的知識青年，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认真地深入生活，以革命家的敏感，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发掘出革命知識青年的先进思想，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艺术地表現出他們在斗争中所受的教育和他們所發揮的作用，写出他們更加成熟的未来，塑造出更加高大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形象来。

<sup>①</sup> 《为創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 红旗

HONGQI



# 20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二十期 目录 ★

##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新闻公报 .....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 (2)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 ..... (5)

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 ..... (6)

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 ..... 宋任穷 (8)

### 文艺理论阵地上的革命精神和反动精神的斗争

——驳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 文文宣 (13)

怎样看待妇女问题 ..... 万木春 (23)

短

一絲不苟 ..... 苏星 (28)

論

論小事和大事 ..... 徐道河 (30)

革命责任心和责任制相结合 ..... 李智盛 (32)

站住脚跟，永不褪色 ..... 原冰 (34)

☆ 十月二十八日出版 ☆





# 我国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 新聞公報

【新华社十六日訊】 新聞公報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北京時間），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試驗。

中国核試驗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貢獻。

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員、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設的一切工作人員，以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門，在党的领导下，发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辛勤劳动，大力协同，使这次試驗获得了成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們致以热烈的祝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新华社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



試驗，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駐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謂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試驗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詐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紙老虎。过去我們这样看，現在我們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們相信人民。决定战争勝負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們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問題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錯誤，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錯誤。中国



人民是可以信賴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試驗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險就越大。他們有，你們沒有，他們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們的人也有了，他們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訛詐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們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們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議：召开世界各国首脑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問題。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會議应当达成協議，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經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連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們的和平誠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爭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沒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們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

【新华社十七日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六日发电报给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工作的全体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以及一切从事国防建设的同志，热烈祝贺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贺电全文如下：

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工作的全体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以及一切从事国防建设的同志们：

我们热烈祝贺你们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

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美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次试验的成功，是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坚持四个第一，发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革命精神的结果；是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部队辛勤努力，大力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果。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戒骄戒躁，为攀登新的科学技术高峰，加强国防，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 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

## 轉达我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會議

### 討論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的建議

【新华社二十日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月十七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轉达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問題的建議，并表示希望这个建議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电报全文如下：

閣下：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試驗。同日，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詳細地闡明了中国对于核武器問題的立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試驗、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





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为此，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即：

“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顺致最崇高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



# 发揚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

宋任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发揚革命坚持性，是做好一切工作，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坚持精神，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事业的一种宝贵的品质。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这样说过：“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质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十年、十五年以至二十年的磨炼中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又在两年空前未有的穷困、饥饿、破坏和苦难当中使这些品质受到了磨炼。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①

在我国革命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革命坚持性对于争取革命事业胜利的巨大意义。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的时候，曾经指出：“只有充分发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②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还教导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把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下去，这样就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一齐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政策上、组织和具体工作上，深入地阐明了我们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6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53页。



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我们更要不断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在城市和乡村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根子。同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不仅我们这一代革命者要为此奋斗到底，还要经常注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把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坚持下去，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

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从总的方面说，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最根本的。同时，在每项具体工作上，也要始终保持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这两者在我们的实践中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我们从事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离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实践就会成为盲目的，就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实践中没有坚持精神，就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贯彻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一切也就不免流于空谈。毛泽东同志说过：“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sup>①</sup>

现在，全国各个战线上兴起了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人民解放军就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在实际行动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光辉范例。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长期不懈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即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政治工作中，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思想工作中，把抓活思想放在第一位），坚持“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因而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战斗化的队伍。学习解放军，就要学习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在具体工作上的坚持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各个战线上不断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固然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是，一般地说来，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方

<sup>①</sup>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9页。



向对头，长期坚持。一九五八年以来，东北地区的不少工业企业，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实现企业的革命化，革新生产技术和创制新产品等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凡是长期坚持下来的，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例如，有的企业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建设。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学习解放军的榜样，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坚持“三老四严”（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不断地促进了干部和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摸索出一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有的地方，好几年来一直坚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活动，在企业内部和厂际之间，交流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先进技术，克服生产上的困难，解决技术关键问题。这种活动，在开始时是由少数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发起的，在党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他们串连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形成骨干队伍，已经逐步发展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持久不懈的群众运动，产生了巨大效果。

这里还可以举出东北地区农业战线上几个典型事例：黑龙江省甘南县中兴人民公社有个太平大队，坚持八年治山改土，改造了被冲刷的土地一万五千亩，使生产不断发展，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农副产品加工电气化。这个大队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原来贫困的面貌，八年中间向国家提供了二千一百多万斤粮食。辽宁省复县老虎屯人民公社磊子山大队，处在一个非常贫瘠的山区。他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九年中间，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改造自然，在一九六〇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情况下也没有中止，现在已经改造了全村大大小小三十六座山头，修成了数千亩梯田。这个大队过去每年靠国家供应三、五万斤粮食，从一九五七年起变为余粮队，近七年来向国家提供了近三百万斤商品粮。吉林省榆树县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农业生产上一直坚持了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狠抓积肥，创造了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的经验，一九六三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十亿斤，交给国家四亿五千万斤。这个县的增产经验，对东北的北部地区有很重大的意义。

类似上面列举的典型，在各个战线上都不乏其事、不乏其人。他们认准了一件事情，就有始有终地坚持下去，遇到困难不低头，受了挫折不灰心，奋斗不懈，真正具有“愚公”精神。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应当很好地提倡他们的革命坚持性。我们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需要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愚公”。在千千万万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愚公”的面前，不论是自然界的大山小山，还是人类社会的大山、小山、乱石堆、垃圾堆，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真理贵在坚持。能不能坚持到底，对于一件工作的成败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时可以看到，人们去做同样的事情，各自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也大致相同，有的能够坚持到底，



就取得了应有的成效；有的虎头蛇尾，遇难而退，善始而不能克终，就收效甚微，或者一无所获。有的单位、有的部门和有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好的经验、好的典型和新生事物的萌芽，但由于坚持不够或者没有坚持，以致这些好的事物“曇花一现”，自生自灭。他们学习别的单位和别的地区的先进经验，也往往是一轰而起，先紧后松，不能坚持下去。这类情形是很不好的。还有的单位，创造了好的经验，热闹一阵就搁置下来，别的单位学习他们的经验，加以坚持、发展，于是出现了所谓“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现象。应当说，“墙外红”是好事，“墙外”人是做对了的；可是，“墙内”人难道不应该有所憬悟吗？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些事情一抓就能见效，例如农业生产上的保全苗、三镰三趟等项措施，认真抓一年就可以见效。有些事情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效，例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的、艰苦深入的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起一种优良的思想作风，绝非短期所能见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如果不下很大的决心，年年抓、季季抓，就难以坚持下去，达到应有的要求。此外，如治山治水，植树造林等，也都不是短期内所能奏效的。凡是长期才能见效的事情，往往需要坚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抓住不放，坚持到底，绝不能轻易放手，半途而废。即使是短期内一抓就可以见效的事情，也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坚持进行工作，以便巩固既得的成果，并使之继续发展。

凡事看准了才能坚持。有些正确的东西没有坚持下去，往往由于没有看准，或者似乎看准了而又没有认真地去抓。事情大体上就是这样，看准了才能抓住，抓紧了才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怎样才能看得准、抓得住呢？关键在于吃透两头。首先，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要把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情况摸透。这样，才能对事物作出清醒的分析判断，确定什么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什么是不正确的，不能去做，从而下定决心，抓住一件事情，毫不放松地坚持到底。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一方面要了解别人经验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要摸清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同自己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追求形式，不搞一阵风，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学下去，才能真正学到手。

在客观困难较多、阻力较大的情况下，坚持一种正确的领导意见、一项工作任务或正确的措施，是不容易的。在客观条件较好、一切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坚持一件事情，也不那么简单。我们有时可以看到，有的领导者在一件新的工作的开头，往往还比较虚心谨慎，工作也抓得紧。当取得一些初步的成绩和经验，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就骄傲自满，放松领导，不再作应有的努力。这样，不仅已得的成绩和经验不能巩固、发展，整个工作也逐渐陷于停滞的局面。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何项工作，我们都必须自始至终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两分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还有哪些缺点、错误,随时检查、研究,加以改进。既要总结正面经验,也要总结反面经验,还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把这些经验不断地加以充实、提高,使之集中化、系统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作的自觉性,防止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善始善终地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党所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在各个时期提出的重大工作任务,反映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必然得到他们的热烈赞同和支持。但是,由于国内外都存在着阶级斗争,由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总会存在着各种差别,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推行一件重大工作的时候,不能不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反对和阻碍。我们的工作越有力量,越有成绩,越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就越会疯狂地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有时候,我们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在工作中难免产生某些局部性的暂时性的缺点、错误,或者遇到某些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更其会如获至宝,幸灾乐祸,极端卑鄙地咒骂和讥笑我们。我们队伍中极少数的不坚定分子,也会产生动摇,吹起冷风。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分清敌我,判明是非,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坚决回击敌人。同时,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认识问题,更充分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把我们要做的事情毫不犹豫、毫不间断地坚持进行到底,做得好上加好。

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我们这一代要把毛泽东思想坚持下去,还要传给后代,世代地坚持下去。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崩溃、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针。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对于这些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放,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千百次的实践,使之不断落实,反复落实,不断产生出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我们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文艺理論陣地上的

## 革命精神和反动精神的斗争

——駁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論”

文 文 宣

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認識事物。什么是时代精神，这并不是可以凭誰的主观願望所能决定的，也不是简单地根据一种精神是否实际存在，或是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就可以断定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来确定。确定什么是时代精神，就是确定什么是代表时代发展趋向、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为革命群众找出精神的武器。

我們知道，与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階級相适应，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識也一分为二，划分为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階級意識。时代精神問題的提出，正是为了回答在这对立的階級意識中，哪一个階級的意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时代前进的方向；因而也就是回答，哪一个階級的意識可以成为推动社会革命变革的精神力量，成为时代的号角。如果不是故意制造混乱，那就不应玩弄概念的

把戏，把时代精神的概念同社会意識的概念混淆起来。要把社会的各种意識都称作时代精神，那么，时代精神問題的提出，就会是毫无意义和完全多余的事了。

不管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多么討厭階級分析，并想方設法，耍弄花招，在时代精神这个問題上制造混乱，馬克思主义者还是不能不明确地这样提出問題：究竟社会上哪一个階級的意識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精神上的火車头？以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欧洲來說，是“百科全书派”的启蒙精神，还是路易十五統治下的君主专制精神？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国來說，是“新青年”派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还是复古派的封建、买办精神？敌对的双方，虽然都是社会意識，但是决不能說，它們都是时代精神。

只有革命精神，革命的社会意識，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

在斗争中，革命的階級不仅需要物质的武器，还需要精神的武器。革命階級的精神



武器，适合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反映着成熟的历史要求，表现着时代的历史任务，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的腐朽性，歌颂和宣传新制度、新思想的优越性，它必然能够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未来的胜利开辟道路。

在革命斗争中，思想常常是先行的。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sup>①</sup>在巴黎的群众攻克封建统治的象征——巴士底狱之前，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早已用他们的著作攻克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没有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革命学说，就不会有今天的磅礴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作为时代精神的革命的社会意识的作用所在。

反动的社会意识，同历史发展的趋向背道而驰，反映着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反动阶级的要求，歪曲现实，散布种种迷信说教，从精神上毒害人民、奴役人民。对于历史，它只能起阻碍、妨害和拉向后退的作用，并最终将被觉醒的人民群众所识破、唾弃，而归于彻底破产。它是时代的渣滓，时代逆流，时代精神的对立面，决不能称之为时代精神。

我们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指的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至于反动派对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进攻和镇压，被推翻的剥削者对于胜利了的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和破坏、复辟，那只能阻碍或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乃至使历史暂时倒退，

而决不能对历史起促进的作用。政治、经济上的斗争是这样，思想领域的斗争也是这样。把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时代所起的阻碍作用，同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时代所起的促进作用，有意混为一谈，都冠之以时代精神的称号，这是周谷城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一条狡猾而又笨拙的诡计。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精神所以能起到和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必须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给以科学的解释。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把社会主义当作是“纯粹的虔诚的愿望，‘正义’的要求”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曾经说过：“实际上，大工业不是把这种要求作为正义的要求提出的，而是把它作为生产的必然性提出的。而且这样一来，便把一切都改变了。”<sup>②</sup>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革命精神，正是作为“生产的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而产生出来，并被历史必然地规定为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的。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sup>③</sup>反动阶级由于本身的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9页。



利益，力图保持旧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则努力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为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革命阶级要通过斗争克服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现象，粉碎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使新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因此，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它的精神武器，对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反动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及其思想武器，只能阻挠历史的前进。

由此可见，确定什么是时代精神，也只能这样根据历史的必然性，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前进的方向，把那代表新的生产力、站在历史浪潮前头的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规定为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地揭示时代精神的质的规定性。

单纯地从量的方面，从是否“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去看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新生的东西在开始时总是弱小的，尚未崩溃的旧世界则看起来仍是庞然大物；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是它的质，而且要区分向上的质和向下的质。革命精神，就其代表新的生产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这个向上的质来说，即使它在开始时还不够普及，犹如星星之火，但是它必将为自己开辟道路，到处点燃革命人民的心，而成为燎原的烈焰。在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和全套宣传机器，资产阶级反动、没落的思想可以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就这个意义

上说，它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但是从它的腐朽没落的质上来看，它又不能不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它的前途只能同它所反映的制度一样，终将归于灭亡。它此刻的“广泛流行”，丝毫也不能改变其反动的、反时代前进趋势的性质，更不能改变它必然被时代的铁帚当作垃圾扫除干净命运。所以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时代精神；在那里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的，仍然只能是必将日益壮大并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革命人民的革命精神。

时代并不是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同一的概念。正如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于封建社会内部一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也开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一切革命时代也不是开始于革命变为现实的时候，却是开始于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因此，新的社会意识的出现，即使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即使它还不够成熟，甚至可能还蒙着古旧的色彩或采用了与它的本质不相应的形式，它作为旧的上层建筑的对立面，就已经是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幼苗了。在两个时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无差别境界”。当资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时，它便按照事物本身的辩证规律，由进步转向反动。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与此相适应，在思想领域也发生着同样的转化过程。

恩格斯曾经说过：“十五和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



式，在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轉化为天主教的耶稣会教义。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十分成熟的第二种形式，也同样地轉化为現代的耶稣会教义，轉化为沙皇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轉化，这种跟出发点完全相反的一点的終于到达，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必不可免的命运”。<sup>①</sup>

恩格斯在这里告訴我們，随着资产阶级由进步轉化为反动，在思想领域中，也由进步的启蒙主义，轉化为反动的蒙昧主义。这种轉化，是适应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結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而发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也随着资产阶级思想轉化为反动，而开始成为时代精神。当然，它给自己找到唯一科学的形式，那是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情。

这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說明，在历史进程中，哪个阶级的意識成为时代精神，是由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前进的規律規定的。周谷城的所謂“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公式，絕不是确定时代精神的标准。

这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說明，在一个社会内的任何时期，都不能有两种时代精神并存的局面，更不可能有周谷城所說的由“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識”“汇合”而成的所謂时代精神。

周谷城提出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論，要把“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包括在时代精神之中，是反科学的，反馬克思主义的。

就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所要表現的时代

精神來說，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也是确定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中，論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批評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問題时，对于如何認識时代精神和表現时代精神，对于什么是我們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实质上已經做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闡明。毛泽东同志告訴我們，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对待各种文艺作品，要分析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在各个时代的前进中是“促成进步”的，还是“拉着人們倒退”的，以便从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来确定它的性质和我們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他还指出：我們的时代，是“新的群众的时代”，文艺只有为工农兵服务、表現工农兵，做工农兵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能起“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很清楚地說明了，我們的文艺，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充分表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革命精神，才符合我們这个时代的要求，才能表現时代精神。以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去表現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的工农兵，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所要表現的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文艺創作离开了这个内容，就談不到什么时代精神的体现。文艺評論离开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鉴别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什么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文艺。

<sup>①</sup>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二)，第141頁。



## 二

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时代精神的革命精神，革命阶级的精神，与其他阶级的意识，即周谷城所谓“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呢？确定只有革命精神才是时代精神，是否就如周谷城所胡说的那样，是“与对立斗争的整体不相干”，是“单纯一致”、抹杀了矛盾和斗争、维护了“无冲突论”呢？

恰恰相反，认定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这是真正的辩证法。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是指“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这种哲学，“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声中进入世界的”。<sup>①</sup> 马克思还曾经在一封信中，在指出席勒作品艺术上存在缺点的同时，肯定他的创作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它是在同反动精神相斗争中产生的。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新兴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革命精神，是与反动精神势不两立地斗争着的革命精神。但是，周谷城所谓的时代精神的“统一整体”却是鱼目混珠的冒牌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谈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为了认识构成对立面斗争的客观依据，说明对立面之间斗争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了找出并充分利用促使对立双方新陈代谢地

转化的条件，而不是像周谷城所说的使它们永远不可分离地“汇合”、“杂凑”在一起。所谓“杂凑的一锅”，就是无条件的并存，无条件的“汇合”，也就是永远不能转化。这当然也是一种宇宙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sup>②</sup>

辩证法研究对立面的统一，其目的就是要从中找出规律，促使旧的统一体的分解、破坏和死亡，促使新的统一体从中诞生。事物的发展就是旧统一体不断破坏，转化为新统一体的过程。而周谷城提出他的“统一整体”的理论，其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事物的存在，反对对立面的转化。

就以周谷城所举的例子来说，“截至今日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是“不仅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不同语言存在，不同信仰存在”的。但是这个“事实”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0—1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8页。



明什么呢？是说明现在以至将来还需要进行消灭阶级的斗争，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还是说明为了保护什么“统一整体”而必须保留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如果这样做，究竟是要保护“祖国”的“完整”不受“破坏”呢？还是要保护资产阶级的完整不受破坏？

很明显，周谷城不过是有意搬出一些辩证法的词句来进行投机。他运用的不过是以辩证法的词句掩盖起来的反辩证法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

前面我们说过，时代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以社会意识一分为二、存在着对立面的斗争为前提的。这里的问题是，在肯定了对立面的斗争后，需要进一步解决这对立的双方，哪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观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时代，当然是由对立斗争着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但要确定时代性质，就必须确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这里不但根本谈不到什么抹杀矛盾和斗争，而且恰是从对立面的斗争的前提出发，为了进一步认识这种对立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斗争，以促进矛盾的转化。对于时代精神，也必须这样考察。周谷城把前提中已经肯定的问题，硬扯到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里来，这是有意搅乱和模糊对矛盾的进一步分析。

应当指出，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之成为时代精神，这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它既是肯

定，又是否定。肯定的东西，就意味着对它的对立面的否定。革命，就是否定反革命；革命精神，也就是否定反革命精神。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由于意识到它所观察的社会中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而产生的”。<sup>①</sup>这就是说，一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是反映着矛盾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像形而上学所了解的那样只反映它自身；其实离开了对方，它自身就无法规定。作为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就是从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关系上来规定的。

毛泽东同志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sup>②</sup>革命精神也是在同不革命和反革命精神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说到革命精神，就意味着反革命精神的存在，意味着与反革命精神作斗争；革命精神的概念，就包含着对它的对立面的否定和斗争。这对于稍具辩证法常识的人来说，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拿文艺作品来说，它们描写“斗争的现实”，描写“社会矛盾”，包括对立的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矛盾；但是，如果说某一部作品表现了时代精神，那决不是指它所描写的各个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起来表现了时代精神，而是指蕴含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指作品的形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倾向表现了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精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第171页。（引文中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sup>②</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神的作品必然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因此，它也必然要反映敌对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这种反映，是把它当作批判对象来反映，是批判地反映，是从革命精神出发，给以暴露和鞭撻，而不是让它们“杂凑”在一部作品中，并认定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以《创业史》这个创作为例，这部作品既热情地歌颂了梁生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也暴露和批判了姚世杰等人在合作化运动中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思想。难道说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创业史》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吗？难道他们不是在激烈斗争着，而是“杂凑”在一起的吗？难道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不是统一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而是两种对立思想的“汇合”吗？

如果说，艺术作品中的根本倾向，艺术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倘是单一的革命精神，就意味着抹杀矛盾与斗争，就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那么，我们的革命文艺，又怎么能有它的鲜明的倾向性呢？

至于在社会上还会有表现资产阶级精神的种种作品出现和存在，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个事实说明，有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存在，也就必然会有表现反时代精神的文艺存在。正是因为有此种文艺千方百计改头换面地出现，起着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作用，因而就更需要划清时代精神与反时代精神的界限，提倡大写表现革命精神的作品，以便与之作斗争。而绝不能允许公然提倡表现这些反革命精神的文艺，给它们以合法的地位，让它们到处泛滥，毒害人民。周谷城好像唯恐这样一来，“非革命的、

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文艺就不能存在了，因而便挺身而出，“在所必争”，大呼我们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不“全面”，我们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不“全面”。其实，这是多余和徒劳的。一方面，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革命还在进行，那不革命、反革命的种种精神总是要自己放出来的，总是要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代精神的对立面绝不会自动消失，只不过它今天的抛头露面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敢于大摇大摆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政策，永远也不会符合周谷城的“全面”要求，因为那样做，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就是向资本主义让步和倒退，就是走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周谷城先生再把他的文章警句照抄五遍，我们也不会接受他那种包含着险恶目的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要说反对文艺上的无冲突论，应当说，周谷城心目中的无冲突论同我们所要反对的无冲突论是根本不同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无冲突论，归根到底，就是抹杀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抹杀新旧势力的斗争，并从而否定了在艺术作品中表现革命精神。所以只有反对时代精神“汇合”论，也只有表现作为时代精神的革命精神，才能彻底实现我们所要反对的文艺上的无冲突论。试想一下，不同阶级的意识已经“汇合”起来了，还有什么冲突？离开了表现革命精神而存在的冲突那又是什么样的冲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那些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表现了封建主义精神的文艺，那些表现反社会主义思想情感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艺，的确



也反映某种冲突,某种斗争,它们也不是无冲突论。但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是为的提倡那种冲突和斗争么?是为了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斗争、战胜社会主义么?

不论周谷城如何巧言令色,他的“汇合”论,他的“统一整体”,都是同辩证法的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完全相反和根本敌对的。

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为了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我们必须确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当代的时代精神。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时代精神。“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只能是时代精神的反动。我们的文艺要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要在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阶级斗争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只能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反对敌人,只能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的文艺,只能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方向,而不能在什么“统一整体”的幌子下,允许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政治方向。想制造再精巧的“理论”为它辩护,也是枉费心机的。

### 三

在我们看来,“单纯一致”而不能“汇合”其他阶级思想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但是,这跟周谷城的所谓“分别反映”却根本不是一回事。

确切些说,所谓时代精神,不过是对那表现于政治、道德、文艺(在文艺中又表现

为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等意识形态中的革命精神的概括。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在这些具体表现形式之外,独立自在的时代精神;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认为先有一个时代精神的实体,然后它实现于或体现于各种具体形式之中。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表现于或者说也只能存在于革命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文艺中的时代精神,是对革命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不是什么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周谷城在这里显然是露出了他的唯心主义的马脚。

周谷城在反对别人的批评时,曾说别人喜欢用脱离事实的“抽象概括”法。其实,周谷城自己所用的绝不是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概括,倒是一种最坏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概括”法。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时所揭破的一套玩艺儿:他把抽象的“水果”这个概念当作出发点,而把苹果、梨子、桃子等等这些通常的千差万别的具体的水果,都说成是抽象的“一般水果”的概念的不同表现,是抽象的“一般水果”的概念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唯心主义者经过如此一番炮制,就不难引出这样的结论,说苹果、梨子、桃子等都分别表现了“水果”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把它们加在一起,便是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方法,不但唯心主义地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真实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最恶劣的诡辩手法,运用它可以随意地把任何不能统一的东西“统一”到一起。例



如，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动物、植物和人抽象为“物体”的概念，然后说动物、植物和人都分别反映了“物体”的一部分，它们的总和是个“统一整体”；也可以把战争、生育、剥削、降雨等抽象为“客观存在”的概念，然后说战争、生育、剥削、降雨等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的总和是“统一整体”；等等。总之，可以把任何现象和事物拉扯在一起，说成是“统一整体”。这样一来，就把事物的质的区别，就把矛盾的特殊性，就把真实具体的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完全抹杀了、歪曲了和掩盖了。

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惯用手法。他们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道德，抽象为“道德”，从而抹杀了道德的阶级性；他们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不同感情抽象为“爱”、“憎”、“喜”、“怒”的概念，从而掩盖了情感的阶级本质。现在周谷城也是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抽象为所谓“时代精神”，即“汇合”各种阶级意识为“统一整体”，然后便轻易地把各阶级的意识都说成是这个“统一整体”的表现，是“分别反映”了它的一部分；从而就抹杀了各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本质的区别和对立。

所以，毫不奇怪的，在周谷城那里，各阶级的意识便根本没有真理与谬误、革命与反动之分，而只是“独创性”与“独创性”、“天才”与“天才”、“部分”与“部分”、“片面”与“片面”之别。他说：“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

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的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这样一来，周谷城所大吹大擂的“统一整体”各部分的对立斗争，就只是“独创性”对“独创性”的斗争，或“天才”对“天才”的斗争；这不是“斗”得令人莫名其妙吗？这不是荒唐到极点了吗？

周谷城的这一段话，恰好是不打自招地向别人揭穿了他的所谓“分别反映”的“阶级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是对各阶级的意识“不分轩轾”、“一视同仁”的“阶级性”。当然，“一视同仁”不过是表面的；因为它实际上是把革命的思想贬低，让它与反革命意识为伍，同时又抬高反革命思想，让它压倒、溶化、吞并掉革命精神。这里的阶级性也很清楚，那正是符合反动阶级需要的阶级性。

周谷城的“分别反映”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完全不同、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思想，能够勇敢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具有指出真理，促进历史前进的革命性。没落的剥削阶级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旧社会制度，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不敢正视客观现实，而要蒙蔽真理，因而，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反科学的、反动的。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出发，必然要区



別在不同的社会意識中，哪些是眞理，哪些是謬誤，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反动的；必須坚决反对一切抹杀眞理与謬誤的界限，混淆革命与反动的区别的企图和做法。这样的企图和做法是有利于反动阶级，为反动阶级服务的。

然而，抹杀革命与反动的区别却正是周谷城提出“統一整体”与“分別反映”这个論点的眞正目的。“分別反映”論，就是表面上主张各阶级意識“不分軒輊”、“平分秋色”，实质上使反革命精神渗透进来，最后溶合掉革命精神。

虽然周谷城曾貌似公正地要給予革命精神以“主导”的地位，說什么倘若一定要讲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必須加上“为主导”或“的主导”之类的字眼。其实这不过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手法罢了。革命精神和反革命精神的关系，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而是根本敌对的、革命与反动誰战胜誰的問題。但是，就这一点來說，也恰好暴露了在周谷城的眼中，革命精神同非革命、反革命等精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別，只有主、副的不同。而且，他之承认这主、副的不同也是不得已的。其眞实的眼光，还是表面上“不分軒輊”、“平分秋色”，骨子里渗透、溶合。

所以，当周谷城談到文艺的社会作用时，他把毛泽东同志所說的革命文艺可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荒謬地推广到“一切”艺术身上。竟然說：“革命文艺如此，一切艺术，亦无不如此。”

而当他反对別人认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思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时，他的这种观点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他煞费心机地說什么“离开了斗争过程，即农民思想也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說什么“任何艺术作品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显然，說“离开了斗争过程”什么思想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这是无聊的廢話，而且也是十足的无的放矢。有誰說过革命思想要离开斗争过程去推动历史前进这样难以想像的話嗎？周谷城显然是感到理屈辞穷了，便硬造出一些荒唐的論点加到別人的头上。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周谷城的主要意思，无非是說，革命的艺术作品“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艺术作品也“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去掉一边，留下一边”，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只有两方面合而为一，“杂凑”、“汇合”起来，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实际上，在周谷城那里，什么“斗争过程”，什么“对立斗争”，都不过是他的“統一整体”的別名而已。而“分別反映”又不过是“統一整体”的化身。因此，“統一整体”也罢，“分別反映”也罢，一以貫之的，就是“汇合”論。“統一整体”与“分別反映”的理論，就是要糾正无产阶级的“片面性”，要使无产阶级承认不革命、反革命的种种精神，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要承认它們的存在权利，給以传播的自由。

由此可见，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論，是“毫不含糊”的为反革命精神爭地盘、打江山的理論，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論。



# 怎样看待妇女问题

· 万木春 ·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同时也研究了国际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系统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伟大发展，使我们懂得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

妇女问题，从来都是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由被压迫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妇女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阶级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使广大劳动妇女得到彻底解放，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妇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必须服从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这仍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观察妇女问题丝毫也不能离开的基本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仅仅从性别上看妇女问题，抹杀妇女的阶级区别，割裂妇女解放同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联系，这是资产阶级的所谓“妇女观点”。

在妇女问题上，很容易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因而也很容易离开阶级观点，便于于





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因此，在这个领域里，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阶级分析的方法，使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指出，目前在我們有的刊物上，对于妇女问题，还存在着一些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阶级分析的錯誤观念。有的刊物提出了“女人活着为什么”和“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这类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来讨论，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类讨论中，可以看得出，有些文章的作者，还是想通过对这类问题的阐明，来启发读者的思想觉悟的；有些文章的内容也还可以。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积极意义是不大的，反而传播了一些錯誤思想和糊涂观念。

拿“女人活着为什么”和“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来说。人们可以看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是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选择爱人的标准问题是直接由人生观、世界观所决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只能按照阶级，区分为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的的人生观、世界观，或者沒落的、反动的阶级的的人生观、世界观；而决不能按照性别，区分为什么“女人”的或“男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提出“女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无异是承认妇女可以因性别、却不因阶级而具有自己特殊的人生观、世界观。这种对问题的提法，是不恰当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

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一切人，不论是男人、女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都是作为每一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女人，和男人一样，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剥削阶级的妇女，虽然在剥削阶级的家庭中也处于“家庭奴隶”的地位，但是她们同本阶级的男子一起，共同压迫劳动人民，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而被剥削阶级的广大妇女，却身受双重压迫。

在不同的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的女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不一样，她们的生活目的、生活理想和婚姻、恋爱观点也是截然不同的。

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在这三个不同奴役形式的时代里，都培育了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家庭形式和各阶级妇女特有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活着为什么？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本不是由人们的性别差异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阶级意识决定的。不同阶级的女人，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奴隶主的女人和女奴隶不同。农奴主的女人和女农奴不同。资产阶级的女人和无产阶级的女人也不同。

就拿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产阶级女人，同资产阶级男人一样，是资产阶级分子，她们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别人被剥削的痛苦的基础上。她们还同商品一样，也是丈





夫的私有财产。她们选择爱人的标准，是金钱，资本，地位，身分，一句话，是计较利害的买卖，是“现金交易”。

与此相反，广大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妇女，在极端贫困的家庭中，勉强地维持生活。其中一部分人为了给自己和家庭挣得一点点收入，不得不给有产阶级干一些报酬极为低微的工作。她们的生活目的和愿望，是彻底摆脱这种被剥削、被压迫、穷苦、受侮辱的状况，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要求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物质和精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以前三个时代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的历史。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个体家庭已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奴隶地位改变了。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女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女人中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区分。不同阶级的妇女，仍然有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广大的劳动妇女开始实现了她们的愿望，和男子一起，成为国家、集体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千百万劳动妇女和男人并肩地在各个战线上担负一定的工作，充分地发挥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这是一切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妇女最根本的生活目的。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随着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劳动妇女的婚姻、恋爱观点也逐步摆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开始以共同的革命意志、共同斗争和在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爱情作为选择爱人的标准。而一部分地主、富农的妇女和资产阶级的妇女，正处在改造的过程中。她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在短期内就能改变的。当她们的根本观点还没有改变以前，她们在回答“女人活着为什么”和“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这类问题时，必然受她们的根本观点所支配。

以上说明，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妇女的生活目的是不同的，选择爱人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女人，同抽象的、超阶级的男人一样，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女人特有的人生观和选择爱人的标准，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具体的、有一定阶级性的女人和男人，具体的、有一定阶级性的人生观和选择爱人的标准。这个最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要求我们什么呢？它要求我们，在讨论与妇女有关的问题时，必须具有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处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地位的妇女的思想观点，作出清晰的阶级分析，而不能把人生观和恋爱观点这样带有严格的阶级性的问题，当成抽象的、一般的“女性”或“男性”的问题来提出。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为我们提供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不同阶级的妇女在恋爱观点上存在深刻分歧的光辉范例。他在信中尖锐地批评了印涅



薩·阿尔曼德写的小册子提綱中关于妇女对于“自由恋爱”的要求，是“完全忘掉了客观的阶级的观点”，忘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分。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們对于“自由恋爱”的观点，同无产阶级妇女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必須把无产阶级的观点同她們的观点截然分开，并与之相对立”。<sup>①</sup>他坚决反对那种抹杀阶级界限，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加区分地混淆在一起，并企图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来代替的作法。他谆谆地告誡說：“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反对这种混淆不清，要求处处（包括在农民中）划清阶级界限。”<sup>②</sup>

列宁的这种告誡，对于我們如何从阶级观点上来提出和看待妇女問題，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有的同志把一部分革命女干部的工作和家务安排問題，作为“女人活着为什么”的問題来提出，也是不恰当的。

真正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女同志，她們不論在工作中，在必要的家务劳动中，都会充分表现出革命精神，都能根据革命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安排。相反地，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問題还没有解决，那么，她既可以为着个人的放蕩不羈，或者其他种种自私的追求，而輕視必要的家务劳动，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也可以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狭小的所謂“家庭幸福”中而陶然自得。所以，这里的問題，首先是有沒有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和决心的問題。

一个革命女干部，要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須首先解决一个根本認識問題，就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树立巩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是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整个人生的总的看法。它决定着一个人对于工作中和生活中各种具体問題所采取的态度。一个革命女干部，如果有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她就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就会正确地处理革命工作和个人問題的关系，朝着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努力。

毛泽东同志說：“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魯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sup>③</sup>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女同志，她的崇高的生活目的，她的最大的幸福，她的一生，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这样的生，这样的死。怎么能設想，一个革命女干部，还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成天糾纏不清的是把丈夫、孩子、家庭放在第一位，还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呢？又怎么能設想，一个革命女干部，在选择爱人的时候，为考虑政治条件第一，还是經濟条件第一而煩惱呢？

对于我們的女干部、女同志說来，最重要的还是如何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头脑，提高

① 《給印里薩·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頁。

② 《农民和雇佣劳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2—103頁。

③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8頁。



革命觉悟，而不是在“女人活着为什么”这样抽象的问题上钻牛角尖。

为了提高女同志的革命觉悟，当然需要结合具体的思想状况来进行教育。女同志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特殊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并不是说，要忽略这一点。但是，如果不从阶级观点上抓住问题的本质，而纠缠在一些人所谓的“女人”的“福气”，“女人”的“幸福”，“女人”的“天职”，“女人”的“三道关口——恋爱、结婚、生孩子”，女干部是干部“又是妇女”等等的問題上，那就会堕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不能达到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广大劳动妇女的目的。

很明显，妇女问题的提出，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不能同妇女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划清界限，势必造成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把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女同志的注意力引导到什么家庭幸福呀，爱人的工资级别呀，女人活着为什么呀等等的問題上去，因而忽略了当前的政治任务和阶级斗争，是对革命事业不利的。

列宁指出过：“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sup>②</sup>

对于我们的妇女，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宣传、教育，使她们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提高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决性，而不是要把她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家庭幸福”中去。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和国际妇女运动的卓越的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指出，把婚姻、恋爱问题作为女同志和青年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错误的。应该尽可能地集中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力量来击败反革命。要使女同志和劳动妇女关心无产阶级革命。要鼓励妇女们参加一切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这样她们才能抛弃自己那种狭窄的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和心理的限制。也只有这样，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才会创造出真正革命的基础。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固然同当时的俄国和德国已经有所不同，然而，列宁所提出的原则，对我们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今天面临着尖锐的、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千方百计地散播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他们最惯于祭起人性论的法宝，有意制造混乱，向妇女散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经常用“家庭幸福”等等问题转移她们的注意力，败坏劳动妇女的社会主义意识，戕害她们的革命意志，使她们朝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方向堕落下去。我们的妇女同志应该警惕这类思想毒剂，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会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在这个领域内，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① 《论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 一 絲 不 苟

苏 星

从大庆油田参观回来的工人說：到了大庆，走一处，看一处，看人家，比自己，心里突突直跳。

心跳，是因为他們为大庆人的革命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干劲和革命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为大庆人的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严肃认真、一絲不苟的作风所感动。

就拿一絲不苟的作风來說吧，在大庆真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例如，有一个钻井队的高永华班，操作时稍不小心，有一米多岩心掉到井里去了。他們为了取全、取准二十項資料、七十二个数据，連續奋战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把一筒完整的岩心取了上来。

例如，机厂工地六中队，混凝土大梁比规定标准寬了五毫米。工地领导立即召开几百人的职工大会，由干部作检查，并說明重視质量的政治意义，当场干部亲自动手，带动工人，把这五毫米磨掉。工人大受感动，說“磨掉的不只是混凝土，也是我們脑子里的凑合思想。”

例如，油建二大队三班，发现一顆螺絲少了一扣，检查原因，是螺絲帽太紧，于是，大家一齐动手，另挑螺絲帽，一連挑了十几个，终于找到合适的，换上去，一扣不差。

例如，地质研究室資料汇编組，有一个技术員

在整理橫向电测图时，把零点五写成“零五”，別人发现了，严格指出这个錯誤。后来，这个組三天拿出五万个数据，一字不錯。生产工人在填写生产纪录的时候，对于每一个数据都要求写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誤，每个字都要求写得端端正正、整整齐齐。在交接班的时候，如果发现生产记录上字写得不清楚或者有錯別字，接班的同志当即要交班的同志改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一絲不苟，是一个总的原則。在大庆，这个原則，已經为广大职工群众所掌握，具体化为一寸不苟、一毫米不苟、一扣不苟、一字不苟，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一絲、一寸、一毫米、一扣、一字，都是指細；不苟則是指严。一絲不苟的作风，也就是严細作风。

严和細是什么关系呢？两者相比，严是占第一位的，严字当头，才能出細。

不严，就反不掉馬馬虎虎、松松垮垮的坏作风，就反不掉旧习惯和老毛病，就細不



起来。

不严，就不能培养起工人阶级革命的、自觉的纪律性。

在一个企业里，一个人严，一件事严，一个时候严，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严，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要做到人人严，事事严，时时严，一严到底，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庆油田的经验宝贵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们一严到底，真的是严出了一个好作风。

大庆油田为什么能培养出这样的好作风？最主要的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总路线的精神深入人心，阶级教育深入人心，全体职工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

同时，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庆油田自始至终，由上到下，认真地抓了作风问题。

大庆油田，培养严细作风，是首先从干部做起的。油田的同志常说：有什么样的干部，就带出什么样的队伍。干部带头，是“无声的命令”，身教重于言教。干部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这个单位的事情就会做得又严又细。就拿磨掉混凝土大梁的五毫米这件事来说吧。如果干部不把责任担起来，首先检查不严不细的作风，而是把错误一古脑儿地推给工人，会有助于严细作风的形成吗？显然是不会的。干部严，群众才能严；群众一严，干部也就非严下去不可了。

大庆油田的严细作风，是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在贯彻执行规章制度中，一点一滴地形成的。只有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严格要求，才能养成习惯，形成风气。

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sup>①</sup>

一个字错了，看来是小事，但是，它的确反映一个单位的作风，反映一个工作人员的革命责任感。因此，必须认真对待。

大庆油田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的。他们明察秋毫，点滴不放，不论事情大小，只要是涉及到作风问题，就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例如，有一个井的地质员，在打井过程中，漏取了岩样，没有发现标准层，硬是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上千的技术人员参加，严肃地进行了教育。没有这种广泛的深入的教育，也就不会形成一寸岩心不苟的作风。

严细作风也要树样板，立旗帜。我们的广大职工是有政治觉悟的，是有集体主义的荣誉感的，是有不甘落后、力争上游的志气的。有了样板，有了旗帜，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学，去赶。大庆油田的三矿四队，是个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严细成风的队。他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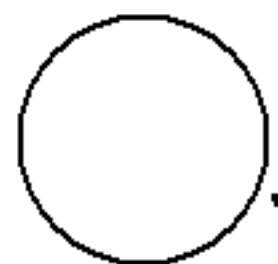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8页。



怕做笨事，下得苦功夫，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一个压力表有怀疑，硬是拿来八个压力表一个一个地校正；一旦发现挡板孔眼划出了小小的毛刺，坚决换掉；对每天几千个数据，坚持一个一个地检查、核对，日日如此，月月如此。于是，油田就大表扬，大提

倡。一表扬，一提倡，大家就学起来了，使许多单位的作风有了明显的改变。

大庆油田职工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是感人的，也是发人深省的。这样的作风推广开来，遍及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该会产生多么伟大的力量呵！



## 論小事和大事

· 徐道河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大庆油田姬德先采油队，在岗位责任制大检查之前，一口唯一的非“五好”井，被评为“五好”。这个队的职工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采油工人陈昌玉兴奋得连工作服都没有换，就往井上跑，到井上一摸口袋，还有三支卷烟，就拿出来同值班工人吸起来，表示庆贺这口井实现了“五好”。这件事被检查小组发现了，立即取消了这口井的“五好”称号。事情发生后，队长姬德先向职工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工作不深入，同时，讲解了井上吸烟的严重危险性，使职工认识了错误。自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发生在井上吸烟的事情，这口井终于重新成为“五好”井。

吸烟，看来是件小事，但是大庆油田的同志，对待一件小事，这样严肃认真，正是

反映了大庆油田的革命作风。

大事是由小事积成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做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

建设好油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办成这件大事，是油田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千千万万件小事的结果。

大庆油田的职工，在几年的时间里，把一块荒无人烟的地带，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油田。他们餐风露宿，披星戴月，不知道做了多少万件小事。

大庆油田的工作之所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始终注意小事情。

就拿交班和接班来说吧。他们总是把每台机器、每件工具、每个资料以及其他生产





需用的东西，逐点逐点地交接得清清楚楚；机器上有油腻和灰尘要擦干净，螺丝松了要拧紧；资料上的字不能写错或涂改；工具少了一件或没有放在规定的位置是不能交班的。

大庆油田有一个“五好”转油站，这个站的职工一见好事不分大小都要学。自一九六三年三月以来，他们访问过四十一个单位，学习了一百六十七次。有一次，他们去一家变电所学习，由于忘带介绍信，变电所的民警不准他们进去，他们没有达到原来计划学习的目的，但是他们说：“没有白走，学到了一个‘严’字，人家的警惕性就是高，我们站里人来人往，经常无人过问”。于是，他们就学习变电所，建立了站的通行制度。大庆油田职工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一点一滴地学习先进经验，改进缺点，把工作做得更好。

认真对待小事，并不是“小题大作”。如果以为小事就可以马虎、满不在乎，那将贻误大事。一九六一年四月，大庆油田打了一口斜度超过规定的油井。这口井，如果同老油矿区的相比较，已经不错了，照样可以出油。但是，因为斜度超出了规定的标准，可能影响原油采取率和油井的寿命。一口井的质量有问题，对于整个大油田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如果马虎下去，不认真处理，就可以出现两口、三口、十口……这样的井。因此，油田领导上十分认真对待这件事。他们举行了工人大会，总

结这口井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对大家教育很大。自此以后，大庆油田的油井都打得笔直，最直的井，井斜只有零点六度，井底位移只有零点四米。

没有小事的大事业，从来是不存在的。如果只喊要做大事业，而厌弃小事，就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大庆油田。

提倡重视小事，决不是要求离开大事而孤立地看待小事。如果离开大事而孤立地看待小事，结果，只能是迷失方向，走进事务主义的圈子而不能自拔。我们提倡重视小事，就是要求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小事）看作是革命事业（大事）的一部分，出色地做好工作，对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庆油田有个“无名英雄”黄友书，他是个修鞋工人。修鞋，对整个大庆油田建设和革命事业来说，算是小事，但是黄友书，却把自己的工作同油田建设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因而浑身都是劲。他说，“战士没鞋穿打不了仗，工人没鞋穿也搞不好生产，谁离得了鞋啊？给工人们修好鞋，这也是革命工作！”他看见职工们穿着他修好的鞋建设油田，心里就乐开了花。他跑遍附近的城镇去找修鞋工具，他每天挑着修鞋担子下现场，他经常收集废旧碎皮，给职工们掌鞋。

大庆人就是这样懂得自己做的工作是革命工作，因而干劲十足，工作出色。

不做小事，无以成大事。不做好日常工作，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大事业。



# 革命责任心和责任制相结合

· 李智盛 ·

到过大庆油田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责任制搞得很好。在那里，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生产井井有条。

责任制，其他企业也有。为什么大庆搞得最好呢？关键在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

制度是重要的，但是，有了制度，不是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制度能不能贯彻，归根到底决定于人的思想状况和政治状况。如果没有革命责任心，即使有了制度，也不过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等于没有。这是因为，人的行动是受其思想支配的，是受政治支配的，正确的行动，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和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才能产生。

任何完整的责任制度，都不可能把一切生产活动包括进去；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许多事情也是人们预想不到的。因此，责任制度只能规定人们在生产中的主要活动，适应一定时期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革命责任心如果很强，就能够主动采取措施，以弥补制度之不足，适应新情况的需要。

革命责任心，是工人群众的一种国家主

人翁思想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觉悟和工作态度的表现。责任制的执行，必须建立在革命责任心的基础上。

大庆油田有一个采油小组，革命责任心很强，执行责任制严格认真，能够做到“四个一样”，即：黑夜和白天、坏天气和好天气、领导干部在场和不在场、有人检查和没有人检查，干工作都一样。有一天，这个组的一个工人，在井口清蜡，突然来了暴风雨，全身都淋湿了，但他仍然在岗位上坚持操作，直到把蜡清完。这个井组工人的豪言壮语是：“做不到‘四个一样’，还算什么工人阶级，还做什么主人翁！”

大庆油田职工的革命责任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反复做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结果。工人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阶级觉悟提高了，主人翁的思想增强了，认识到严格认真地执行责任制是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具体表现。大庆油田有许多工人，在旧社会受过地主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经过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说，只有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打好油井，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才能保证再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欺侮。

大庆工人中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党是我的妈，井是我的家，我听妈的话，管好我的家。”这首歌谣鲜明地反映了工人群众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光靠制度是激发不起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来的。

反掉坏习惯，树立好作风，是培养和提高工人革命责任心的一个好方法。大庆油田狠狠反掉了“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坏习气，坚决树立了“三老”（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即：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的好作风。这些作风都是革命的作风，是革命责任心的具体表现。

对于责任心来说，严格的精神极为重要。“严”字当头，才能反掉马马虎虎，松松垮垮的坏习气，树立起一丝不苟的好作风。有了好作风，才能出好制度，出好产品。有了革命责任心，才会有革命的好作风；有了革命的好作风，革命的责任心也才能进一步提高。

责任制的建立和坚持执行，决定于工人群众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同时，责任制建立起来后，又可以更加巩固和充分发扬工人群众的革命责任心。

责任制是一种工作规程，没有责任心，责任制固然会落空；但是，没有责任制，责任心也无从充分发挥。有了健全的责任制，就能使工人群众的革命责任心用制度巩固下来，把千千万万工人群众的革命责任心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大庆油田既注意增强工人群众的革命责任心，也认真地研究、制定并逐步健全了责任制度。他们调查研究，总结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经验，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严格而又科学的岗位责任制度，包括岗位专责制、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设备维护保养制、质量检验负责制、班组经济核算制。为了更好地贯彻岗位专责制，他们规定了工人在生产中的必要职权，为了切实贯彻交接班制度，他们规定了“七不交接”。这七不交接就是：任务不清，不交接；质量要求和措施不明，不交接；设备保养不好，不交接；工具、设备、配件缺少和损失，不交接；设备运转不正常，工作场所不整洁，有漏油、漏气、漏水、漏电、漏火等现象，不交接；原始资料不全、不准，不交接；上班没有为下班做好准备工作，不交接。实践证明，这是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责任制度。这些制度，有利于革命责任心的充分发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又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制，革命责任心和责任制相结合，这就是大庆油田生产搞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 站住脚跟，永不褪色

原 冰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连长张继宝同志说过一段话：“艰苦奋斗的作风，过去在战争年代里需要，今天在和平环境里仍然需要；搞革命，需要，搞建设，也需要；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需要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子弟，要保持无阶级的本色，保住这种革命精神，站住脚跟，永不褪色。”应该说，这不是张继宝同志一个人的思想，好八连同志们十多年如一日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这个连队的集体思想。

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已经传播全国，不需要我来重复介绍。我这篇短文，只想说明一点，就是：他们把艰苦奋斗提到“站住脚跟，永不褪色”的高度，是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新的发扬。

为什么要艰苦奋斗？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和抱着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是把艰苦奋斗当作个人向上爬和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也有的人是为了达到其他的个人目的。这些人所以要艰苦奋斗，都离不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环境变了，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实现了，他们就必然要把艰苦奋斗的作风丢掉了。我们能把这些人的艰苦奋斗叫作共产主

义的道德品质吗？当然不能！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用这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来看问题，当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建立了革命政权之后，在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比过去大大改善的情况下，还要艰苦奋斗；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永远地艰苦奋斗下去。在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浓厚的人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认为这简直是“傻瓜”！

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

把取得政权当作革命的结束，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就是这样来对待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斗争的。同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相反，无产阶级世界观认为，取得政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的开始。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压迫、一切剥削、一切阶级，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获得解放，都能够一天比一天有更好的生产条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没有整个阶级的解放，任



何一个工人或一部分工人就不可能单独获得最后的解放。

共产主义道德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指导思想的，是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利益，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引伸出来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他想的不是个人，也不只是一家一户，而是处处为了整个工人阶级、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不是只为了眼前的、暂时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将来的、长远的利益。当他们觉悟到了这一点，用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就能够懂得：“艰苦奋斗的作风，过去在战争年代里需要，今天在和平环境里仍然需要；搞革命，需要，搞建设，也需要；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需要的”。

我们赞扬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并不是主张人们不要改善工作条件，不要过富裕生活，而是因为这种作风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今天我国人民的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内，都不仅比解放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比起解放初期来也好得多了；随着生产的发展，今后还要更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将要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在更好的劳动条件下工作，过更加富裕的生活。可是，一个真正忠诚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革命成就而停滞不前，不应该把志趣放在贪图安逸和追求个人物质享受上，而应该时时刻刻想到：现在世界上还有

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获得解放；在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革命还不彻底，还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到了全世界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社会不断发展，也还必须讲究节约、反对浪费。很难设想，一个贪图安逸处处追求个人享受的人能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始终地保持住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可是，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是容易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容易。有些同志，可以在困难的时候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到了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就往往保持不住了。好入连的同志们不但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用十几年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十分可贵的。

当然，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某些成员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有发生褪色以至变色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事业的某个局部、某个片断时间也有发生暂时后退现象的可能性，才能鲜明地看出把艰苦奋斗提到“站住脚跟，永不褪色”的高度，的确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新生的革命的力量总是向上发展的，腐朽的反动的力量总是向下发展的。无产阶级是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性。可是，如果因此就以为无产阶级的每个成员都不会发生褪色以至变色的危险，如果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每个局部和在任何短暂时间内，都不会发生后退现象，那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就要陷入宿命论的消极状态。事实上这种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无产阶级成员不能同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接触。这就使他们可能程度不等地沾染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灰尘，如果其中的有些人不经常去清除这些灰尘，就不免要中途褪色以至变色。

第二，无产阶级的革命，总是逐步走向胜利的，而敌人又总是经常变换策略的。这样，一些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和经验的人，就往往会在取得了一定胜利时看不到前面还有更伟大也更艰苦的斗争，骄傲起来、麻痹起来、丧失了警惕；又往往会在敌人变换策略时，迷失了方向。这样，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病菌，就会乘虚而入，损害无产阶级的某些肌体。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sup>①</sup>。剥削阶级当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被剥夺以后，就特别要利用他们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毒菌来腐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帝国主义不会放弃用暴力来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妄想，也不会放弃通过“和平演变”，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些褪色以至变色了的人，来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救他们必然死亡的命运，阻止工人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们还要看到，在和平建设时期，一方面，工人阶级迅速扩大了，这本是好事，可是，许多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大量涌进工人阶级的行列，新生一代又大都缺乏艰苦斗争的锻炼，需要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改造教育的工作，而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骨干力量在比重上反而相对地显得薄弱了。这样，那些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人，就容易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道德观念带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并且发育滋长；另一方面，生活安定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也总会一天天好起来，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本来也是好事，可是，这又往往会使一些人忘记过去、忘记将来，逐渐丢弃了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在那些曾经经过一定锻炼的人当中，也会有一小部分意志薄弱的人容易产生贪图安逸、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思想，不愿继续艰苦奋斗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人自然就容易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逐步褪色以至变色。如果这些褪色以至变色了的人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会暂时把党和国家引向褪色以至变色。

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革命者仍然有褪色以至变色的可能性，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就更需要把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提到“站住脚跟，永不褪色”的高度。好八连同志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是自觉地把艰苦奋斗同人民的利

<sup>①</sup>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2页。





益、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不仅证明了他们的是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新的发扬；而且，这正是今天和今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特别需要的伟大品质。

在全世界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着的两种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始终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那就说明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得势、在发展了。

“站住脚跟，永不褪色”，本来就是同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的精神分不开的。只有不断革命，不断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展开斗争，才能保证我们自己永远前进，永远向上发展；只有我们在不断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改造工作的同时，又不断在全社会开展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断做移风易俗的工作，才能最后根除资产阶级在新社会里复辟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

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sup>①</sup>经常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才能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越来越显露出自己的光泽。好入连的同志们，不仅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作战斗的武器，工作的指针，思想的“钥匙”，而且经常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行动，不让非无产阶级的灰尘在自己身上有存留的余地，这就是他们能够做到“站住脚跟，永不褪色”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我们所要得到的不是少数人的物质享受，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都能够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幸福生活。我们的这种幸福观的高尚和伟大，同资产阶级那种腐烂的享乐观是根本不能相比的。我们始终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而艰苦奋斗，这才正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7页。



# 红旗

HONG QI

21-22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

## 目 录

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 (1)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 ..... 许建国 (9)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评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 ..... 陆 锋 (13)

通  
訊

过渡时期没有阶级斗争吗? ..... 沈光位 (25)

敌我矛盾不容调和 ..... 俞建平 (29)

英雄事迹从哪里来? ..... 李小林 (33)

驳“和平转变”论 ..... 陈瑞苗 (35)

西方基督教神学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 杨 真 (38)

☆ 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



## — 社 论 —

# 赫魯曉夫是怎样下台的

赫魯曉夫下台了。

这个窃据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

赫魯曉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魯曉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为什么他混不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

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中间，无论是同情赫魯曉夫的，或者是同赫魯曉夫有利害冲突的，都对于这个似乎“强有力的人物”的突然垮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问题，也发表了文章和文件，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来谈谈赫鲁晓夫怎样下台的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鲁晓夫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



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利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违背苏联人民的真正愿望，做尽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总起来说，有以下这些：

一、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句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一笔勾销苏联人民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整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以此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伟大的苏联，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提供了最肮脏的武器。

二、他公然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荒谬地主张苏美两国首脑“决定人类命运”，一直吹捧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真诚地希望和平”。他一忽儿实行冒险主义，把导弹运到古巴，一忽儿实行投降主义，俯首贴耳地按照美国强盗的命令，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接受美国舰队的检查，甚至背着古巴政府，企图出卖古巴的国家主权，答应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派人到古巴国内去“视察”。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使伟大的苏联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三、他为了迎合美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政策的需要，阻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不惜损害苏联本国的国防力量，串通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事实证明，这个条约是一个大骗局。赫鲁晓夫签订这个条约，是丧心病狂地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卖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





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谓“和平过渡”的名义下，百般阻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这条错误路线，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条错误路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变成毫无生气的新式社会民主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竭力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伙同美帝国主义一起镇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指使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投票赞成派遣侵略军帮助美帝国主义镇压刚果人民，并且用苏联的运输工具把所谓“联合国军”运进刚果；他实际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法国的“内政”；他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竟采取“超然”的态度，煞费苦心地为美国挑衅者解围，替侵略强盗开脱罪责。

六、他公然违背一九六〇年声明，不遗余力地替叛徒铁托集团翻案，把已经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铁托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已经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复宣称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表示要向这个出卖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虚心学习。

七、他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想尽方法打击它，破坏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悍然断绝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并且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八、他极端仇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



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大障碍。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谣诬蔑，同时采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他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纠纷，甚至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九、他公然破坏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任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他在所谓“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强使兄弟国家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要使兄弟国家的工业部门变成附属工业。他夸耀这一套是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十、他彻底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任意对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党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放肆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而且在许多兄弟党内，公然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支持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制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坏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准则，以老子党自居，一意孤行地决定召开非法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开所谓二十六党起草委员会，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他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需



要，实行了一系列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政策。他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把党分割成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要把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轨道上去。他对苏联农业和工业的瞎指挥，使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处处都说明了他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以上这些，就是赫鲁晓夫的所谓“功绩”。

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总以为苏联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自己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妄图强使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挥棒下。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拿起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經出現过不少妄想扭轉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沒有一个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是多么驕橫跋扈，其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人物。以損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場結束，这就是他們的共同規律。

第一国际时期的“人物”如巴枯宁之流，曾經是囂张一时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英雄”，但是，为时不久就被人們拋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第二国际时期反馬克思主义的“好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曾經是霸占了国际領導地位的“龐然大物”，可是，到头来只落得一个遺臭万年的叛徒称号載入史册。列宁逝世以后，反对派的头目托洛茨基曾經把自己装扮成好像是一个什么“英雄”，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說得很对：“与其說他像个英雄，不如說像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談，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人間正道是滄桑”。历史教訓告訴我們，誰妄图阻擋历史車輪的前进，誰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紙老虎。那些代表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英雄好汉”們，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不过是貌似强大的紙老虎，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要多长时间，他們就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沒。赫魯曉夫并不例外。想当年，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襲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囂张。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义前輩的后尘。不管人們曾經怎样劝說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終究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赫魯曉夫垮台了，他处心积虑地推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綫也破产了，而馬克思列宁主义仍将不断战胜修正主义思潮，繼續向前发展；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也仍将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繼續向前发展。

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魯曉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詞地为赫魯曉夫“招魂”，到处宣揚赫魯曉夫的所謂“貢獻”和“功績”，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魯曉夫所規定的路綫繼續做下去，实行所謂“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們自己去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我們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規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具有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定能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保卫列宁所締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崇高威望，为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新的貢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

许建国

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英雄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纪念  
日。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我们谨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  
真挚的敬意。

二十年前的这一天，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  
尔巴尼亚共产党（一九四八年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意、  
德法西斯侵略者和国内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赢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建立了  
人民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此，阿尔巴尼亚人民意气昂扬地跨进了  
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的历史时代。

二十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不仅  
很快医治了惨重的战争创伤，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  
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两年计划和两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胜利。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到一九六〇年，在全部  
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经济所提供的部分已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社会主义工业的产  
量，已占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九；批发商业已全部成为社会主义商业。到一九  
六三年，农业合作社的播种面积已占全国农户播种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把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具有现代技术  
水平的农业——工业国。过去，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一切都有赖于从国外进





口，而現在，全国已經建立了許多新的工业部門、新的工厂和矿山。一九六三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二十九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現在，阿尔巴尼亚工业十三天的产量，就相当于一九三八年全年的产量。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的农业生产，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到一九六三年，全国耕地面积比一九三八年扩大了百分之六十八，大片的沼泽地带已經变成良田沃壤，許多的荒山秃岭已經变成果园丛林。一九六三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一点四倍，灌溉面积增长了五倍，机械牵引力在全部农业牵引力中所占的比重，也从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零点八增长到百分之八十四。今年小麦又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已經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确立了七年制义务教育，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高等学校。現在，全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校学习，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生活。

二十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一九六三年的国民收入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四倍。現在，全国已完全消灭了饥饿和失业，广泛地实行了免费治疗。解放以来，前后十次降低物价，使劳动人民受益达八十七亿四千多万列克。

二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却用辛勤忘我的劳动，使自己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在以自己的創造性劳动，为胜利实现第三个五年計劃而繼續奋斗。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領導的結果。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和本国的革命实践，制訂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政策，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阿尔巴尼亚的这些成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解放前，阿尔巴尼亚的經濟情况是比較落后的，加上几年的战争，使国民經济遭到巨大的破坏。解放后，



美帝国主义和叛徒铁托集团又千方百计地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封锁、破坏和颠覆，妄图把它拉回到被侵略被奴役的老路上去。近几年，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粗暴地撕毁了过去同阿尔巴尼亚所签订的全部协定，断绝了全部贷款，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这一切，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建设遭到更加严重的困难。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宏伟的建设计划，并且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技术专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双腿——工业和农业——前进的。所以，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状况和发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代替农民狭小的个体所有制，作为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的途径。解放以后，党就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到一九五九年，全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从而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今年七月中央全会上指出：“我们已经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消灭了城市和农村的剥削阶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改变了的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在我们这里，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内，还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都有阶级斗争的表现。”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树立了一个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它始终不渝地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列，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积极支持西欧、北



美各国劳动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重要的、坚强的力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二十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愧为英雄的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不愧为英雄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因为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而感到自豪。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虽然在地理上相隔万水千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同理想却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在一起，结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正如霍查同志说的，“伟大的阿中友谊是纯洁的、深厚的和不朽的友谊，因为它是建筑在具有生命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在争取自由、社会主义、和平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锤炼出来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中国人民永远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从来都是互相学习、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这一战斗的革命友谊，已经经受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它正发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

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情况，中国人民将永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并肩携手，为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为促进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事业而斗争。



#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評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

陆 鋒

《平凡的真理》先后刊印过六种版本，这六版的变化趋向是一版不如一版，越变越坏。这种趋向很耐人寻味，希望大家一起来討論研究。我們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志們，最近集中力量研究了这本书，这里所評的是最新的版本，即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二版、一九六〇年一月北京第十次印刷的。

这本书是馮定同志的代表作。它以广大青年为对象，但全书充滿了严重的錯誤，是一本毒害青年的坏书。作者故意标新立异，对他自己根本不懂的一些自然科学、心理学材料，胡乱抄引，妄加解释，弄出了許多笑话；在語言上，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也有意說得模稜两可，似是而非，而且像魯迅所痛斥过的那樣，生造了許多“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类”。但是，不管作者怎样伪装，也掩盖不了这本书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它挂着馬

克思主义的招牌，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并且，跟在現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屁股后面，积极地推銷修正主义的謬論。因此，清除这本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成了一项必要的工作。

任何哲学都表現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归根到底，都是不同阶级政治方向的表现。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最科学最正确的宇宙观。但是，它与其他任何哲学不同，不把自己虛伪地說成是对各个阶级“一視同仁”的，而是公开声称它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如果有一种哲学，不肯公然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那么，不管它为自己貼上了多少馬克思主义的标签，也决不会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在我們看来，就属于这种哲学。它名义上是为所謂一般的人类服务的哲学，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



《平凡的真理》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摆的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但是，它也有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以抽象的人为核心，千方百计地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

人有着两重性：一方面人是生物性的；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却不是自然性，而是社会性。人是由猿进化来的，人区别于一切动物以及猿的根本的标志，在于人能制造劳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从来都是社会性的，所以人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由社会性决定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这就是说，只有着眼于人的社会性，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具体本质。

自有阶级以来，只要阶级还未消灭，任何人都不能不是阶级的人。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sup>②</sup>

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妄图阻止和延缓革命，故意宣传超阶级的人性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把人动物化、自然化。自然性当然无所谓阶级性，因此他们就以人的自然性，来偷换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阶级性。玩了这种抽象把戏之后，似乎抽象的人和人性就确乎存在了。冯定同志的“抽象的人”，也是这样“创

造”出来的。

冯定同志把早已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硬给重新“还原”回去，硬说普通生物的特性也就是人的特性。什么是冯定同志所说的人与普通生物无异的特性呢？那就是“避开对生命不利的东西”，“迎合对生命有利的东西”（第54页）\*，概括地说，就是“趋利避害”。他公开地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为了保持和延续生命，必须争取和迎合有利的事物，拒绝和避开不利的事物”（第66页）。难怪冯定同志把我们革命先烈的“视死如归”的壮举诬蔑成是一时的“冲动”，因为他站在普通生物的立场上，当然无法理解这种高尚革命气概的！

冯定同志之所以把他的代表作命名为《平凡的真理》，并不是出于谦虚，像他所说的因为他“个人是极平凡的；平凡的人写平凡的真理，因而就将这些一条一条的东西叫做‘平凡的真理’”（第4页），而是因为在在他看来，世界上就没有伟大的东西。在他的书里，共所以很难找到“伟大”这个字眼决非偶然。在我们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平凡的真理”，而是庸人哲学，伪善者的哲学，法利赛人的哲学。它只讲饮食男女，不讲革命。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1页。

\* 以下凡单注页数的都是《平凡的真理》一书的页数。



为了用这套东西去腐蚀青年，作者搜罗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凑成一本“错误大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衣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一系列的根本歪曲。下面我们想就一些主要问题，指出冯定同志是怎样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怎样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一

由于冯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看成不过是一种高等动物或“活的机器”，所以他在解释思想、意识的来源时，就很自然地把思想意识归结成为一种单纯的生理过程，从而否定了思想意识的社会根源，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思想。他在《平凡的真理》一书的第一篇中集中论证了他的这种观点，全书的以后各篇也都贯彻了这种观点。他说：“脑子的思维机能，或者是意识活动，归根到底不过是对外来事物‘机械的答应’罢了”（第52页）。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思想、意识除了是外来刺激对人脑所引起的一种生理过程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当然也就谈不上思想、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我们并不否认思想意识与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因此，

人的思想意识从本质上看，只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sup>①</sup>。冯定同志所持的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他把人的思想意识仅仅看成生理过程，认为对人的思想意识的研究可以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故意抹杀思想、意识的本质的质的特殊性，否认思想、意识的真正根源是人类社会实践。

冯定同志为什么在今天要大力宣扬这种错误的思想呢？这的确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冯定同志既然把思想、意识还原为生理过程，抹杀了思想、意识的社会性与阶级性，他这种观点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在思想领域内取消阶级斗争的一种方便的武器。下面且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冯定同志是怎样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达到这种反动目的的。

在谈到爱好劳动与好逸恶劳两种思想意识的根源问题时，冯定同志说：“原来人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精力是既要补充也要消耗的；这种精力的必须消耗，首先就是人类爱好劳动这个本能的根本，而当劳动还没有完全消耗其应该消耗的精力因而成为余暇时，自必需要娱乐；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始终不劳动的人，自必走向荒淫逸乐这样腐化堕落的道路了”（第69—70页）。社会存在决定

<sup>①</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2页。





社会意識，爱好劳动和好逸恶劳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意識本来是不同的社会階級地位所决定的，爱好劳动只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識，好逸恶劳是剝削階級的階級本性。馮定同志把社会意識的产生归之于生理的原因，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按照馮定同志的观点，既然爱好劳动是由于一切人都具有的在新陳代謝过程中精力必須消耗而产生的一种本能，那么必然得出了全人类不分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反动統治階級与广大劳动群众，都有爱好劳动的思想意識的荒謬結論。这也就是说，我們今天广大劳动人民和干部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給自己的任务，而竭尽全力，忘我地工作，并不是出于他們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而是由于“精力有余”、“必須消耗”；就剝削階級來說，他們的穷奢极欲，荒淫无耻，也只是由于“精力有余”，“必須消耗”，因而是沒有罪过的。显然，馮定同志的这种观点，一則是为剝削階級的腐化墮落的思想意識作辯护，同时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誣蔑。

在思想改造的問題上，馮定同志也有一套錯誤的观点。他說：“条件刺激和条件反射业已成立了和熟练了的时候，如果在仓卒間要由新的刺激来代替旧的刺激，或者相同的刺激而必須予以和旧反射相反的新反射，那么这里的别扭是可想而知的。这也难怪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对于新的道理，往往在思想上虽已暂时接受而在情緒上还是长期抗拒

了”（第98頁）。在这里，馮定同志又把社会現象扯到生理現象上去了。事实上，新旧思想是互相对立的不同階級的思想。一个人如果在情緒上长期抗拒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非无产階級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出于階級的本能而与无产階級的思想为敌。

馮定同志的目的地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要替一些表面上接受思想改造，实际上頑固地站在非无产階級的立場上长期抗拒思想改造的人作辯护。因为按照馮定同志的观点，长期抗拒思想改造既然是新刺激在代替旧刺激时所必然要产生的生理过程，那么，长期抗拒思想改造就是一种“难怪”的現象，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現象。这也就是说，馮定同志根本否认了我們現在进行的思想改造是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馮定同志的这套論調，实际上是要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制造理論根据。

从所謂思想意識不过是生理过程的錯誤观点出发，否认思想意識的社会性与階級性，这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决不是个别的現象，而是它的主导思想。例如，他把“长远广大利益和短近狭小利益間的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解决”归结为“感受刺激和进行反射的协调”（第73頁）；把“胜利冲昏头脑”和“利令智昏”两种意义不同的政治情况，统统归结为需要“我們注意調剂兴奋和抑制”（第68頁）；把所謂“好胜逞强”的个人主义思想



归结为“欠缺抑制机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切社会思想意识，都被他解释成了生理过程，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也就这样完全被取消了。尽管馮定同志也曾为自己的这种观点打过掩护，说什么“说社会的发展，是因为人要生活；这种用一般的生理因素来说明社会现象，同样是不值一驳的”（第285页）。但事实上馮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却通篇都贯穿了“用一般的生理因素来说明社会现象”的观点。馮定同志的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本对立的，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根本对立的。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今天，馮定同志散布这套论调，企图取消阶级斗争，无疑是十分反动的。

## 二

在真理和规律的问题上，馮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

首先馮定同志篡改了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代之以所谓谋生存的“行动”。他说：“人为了生活，不论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都必须行动；而且也只有行动中，在改造世界因而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过程中，才能真

正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第80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就是说，只有在“趋利避害”的“行动”中，才能获得真理。尽管馮定同志在这段话里使用了像“改造世界”、“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之类的马列主义哲学的术语，但只要稍稍联系一下他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所贯穿的整个观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段话正是实用主义所谓“有用就是真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翻版。馮定的观点同实用主义所谓“有用就是真理”，“真理不过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馮定同志所说的“行动”，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实践。他从人只是高等动物的基本思想出发，认为人的行动只是和其他生物所共有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其基础只是兴奋和抑制的生理过程（第68页）。馮定同志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动物身上，就“成为行动”（第55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而人的行动也是这样（同上）。馮定同志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把人的行动和动物的行动混为一谈，抹杀人类社会实践的特殊性。

诚然，馮定同志也曾说过实践不同于行动之类的言辞。他说：“违反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行动决非实践”（第312页），“我是将实践这个词儿专门当做改造世界的行动如像生产、科学实验、革命行动等来用的”（第



10頁)。但是，馮定同志這些聲明和申辯，從《平凡的真理》一書的基本觀點來看，不過是些掩飾之詞。因為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馮定同志以什麼東西作為認識的來源：是以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為認識的唯一來源呢？還是以人和動物所共有的“趨利避害”的本能活動為認識的來源？在上引那段話中，馮定同志既已明白主張“只有在行動中”，在“爭取對己有利而避免對己不利的過程中”“才能真正認識外界客觀的事物”，這就清楚地表明：在馮定同志看來，認識不是來源於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而是來源於和一切動物同樣具有的“趨利避害”的本能活動。

從馮定同志的這種錯誤觀點出發，必然否定反動統治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在認識真理方面的階級局限性。這可以從他關於反動統治階級也有唯物觀點和辯證思想的謬論中得到印證。馮定同志說：“人如果不是有意塞耳閉目，光是實行內觀或者空想，那麼因為生活在平凡的事物中，唯物觀點總是或多或少不能不有的”（第186頁）。“我們人在生活中，是隨時隨地都不能脫離客觀實際的，因而唯物的觀點本來是自然而然會在我們的腦幕上出現的；這對無產階級來說是這樣，對資產階級來說也是這樣；……甚至辯證觀點也是這樣；因為這也是在客觀實際中存在的，……”（同上）。從這些話可以看到，在

馮定同志的心目中，任何階級（不論他是被剝削階級或剝削階級）、任何人的平凡生活或本能活動，都可以提供真理性的認識，甚至可以提供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辯證法的認識，都可以是辯證唯物主義者。

馮定同志既然已經走上了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軌道，那就不能不順着軌道滑下去。果然馮定同志更進一步否定了規律的客觀性。他寫道：“規律也好，原則原理也好，概念也好，其實都是對具體事物認識的結果”（第214頁）；“規律，只有在人類的實踐參加進去的过程中才是有意義的”（第318頁）；火的規律，水的規律，電和原子的規律，都只有人的實踐參加進去，才有意義，“否則這些規律仍不免是空洞虛幻而沒有有意義的東西”（同上）。這就是說，沒有人的認識和實踐，客觀規律也就是“空洞虛幻”的，簡言之，沒有人，就沒有規律。馮定同志已經完全陷入主觀唯心主義了。

### 三

馮定同志把人還原為具有共同本性的抽象的、一般的人，抹殺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階級關係，這種觀點必然導致否認階級矛盾、取消階級鬥爭的結論，在哲學上，則必然以矛盾調和論代替革命辯證法。

《平凡的真理》中有這樣一段話：

“整個的全部的物質世界是在運動的物



质或者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永远表现为矛盾的諧和”（第324頁，重点是引者加的）。

所謂“矛盾的諧和”，就是說，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处于和諧的、協調的，平衡的状态中，簡言之，就是矛盾的調和。現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大肆宣揚“融和”矛盾、調和矛盾的反动謬論，馮定同志在这里唱的也是同一个調子。

馮定同志說，整个世界是在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这句话并不錯。但是馮定同志却由此断定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諧和”，这就大錯而特錯了。这二者之間并没有任何邏輯的联系。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世界统一于永恒运动着的物质。这里所說的“統一”根本不是什么“諧和”，其基本含意是說，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之外，沒有其他任何非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一馬克思主义的命題不但不意味着世界永远是“諧和的”，而且与此相反，正是表明世界永远是处于矛盾之中的，因为运动就是矛盾，“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sup>①</sup>。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維，到处都充滿了矛盾。矛盾的規律，即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又統一，又斗爭，对立面的統一都是有条件的、暫时的，而对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无条件的，因此，任何矛盾都是不

可調和的，任何矛盾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斗爭向自己的反面轉化，而不可能出现什么永恒和諧的状态。

主张所謂矛盾的諧和，就必然要否认对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否认对立面通过斗爭而轉化，一句话，必然要把对立面的統一或同一看成絕對的。馮定同志正是这样把对立統一歪曲为对立面的絕對同一，从而販賣他的矛盾諧和論或矛盾調和論的。

表面上，馮定同志也說同一中包含差別或对立，沒有“絕對同一”。但是，他在具体說明矛盾規律时，却把对立的統一，偷換成从矛盾双方中找出来的某种共同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抹杀了差別、排除了对立的絕對同一。例如，他在談到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对立統一時，虽然也說这种統一性表現在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上的相互依存（即沒有資產階級的剝削就沒有无產階級，而沒有无產階級的被剝削也沒有資產階級），但是接着又說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这一組矛盾的双方的統一性还表現在“当資產階級还在进步的时候（按：指反封建时期——引者）并非完全沒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思想的”（第274頁，重点是引者加的）。这样，馮定同志就在大談对立統一的幌子下偷偷地塞进了他的私貨：把同一性变成了矛盾双方的某种共同性（共同利益、共同思想，等等）。

<sup>①</sup>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3頁。



这种观点是对矛盾同一性的根本歪曲。矛盾之所以为矛盾，就是因为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而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二者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也正因为它们根本对立、截然相反。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相反相成”。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同一性，只是因为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剥削，一个被剥削，在利益上根本对立，而决不是由于两者有什么“共同利益”、“共同思想”。资产阶级在其进步时期，在反封建上固然与无产阶级有类似的要求，可以组成联合战线，但是，这是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一方而同作为另一方的封建势力相对立而言的，即是就另一组矛盾的关系而言的，至于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来说，二者之间则没有任何共同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之具有同一性，决不是由于这种反封建的共同性。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同一性说成是什么“共同利益”，更是完全错误的。馮定同志在上面就是玩弄了这样一个诡辩手法，即抛开矛盾双方的特定的对立关系，而从矛盾双方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寻找二者的“共同性”，并且用这种“共同性”顶替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从而抹杀二者的差别和对立。这种所谓同一性，不是绝对同一，又是什么呢？

馮定同志说：“……斗争，实际上就是既有差别，就不能不相互较量而求得一致的意

思”（第 291 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不是一方克服一方，最后解决矛盾，而是寻找“一致”或共同的东西，以便把对立面联系起来，使之“合二而一”。例如，人们之间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争论，在馮定同志看来，结果不是正确的意见在斗争中最后克服错误的意见，解决意见分歧，而是双方的意见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即在折衷与调和中达到所谓“一致”。阶级斗争也是如此，也是要找出一致的东西，求得团结，和平共处。用馮定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有正视人和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总是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因而各将各的意见提供出来，经过交换，经过磋商，这才能够达到团结”（第 305 页）。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应该“总是竭力主张通过彼此的协商和大国一致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共处”（第 364 页）。

馮定同志把矛盾斗争归结为“求得一致”，实即使斗争消泯在这种“一致”或绝对同一之中而永远不要突破旧的统一体，这就是公开否认了转化，也就是否认了质变。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新旧事物的更替，不是由于内在矛盾的推动，不是通过革命性的质的飞跃，而是在保持事物的稳定性的过程中自然地平滑地到来的。他说：“事物在发展中首先倚靠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粗浅说来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稳定性”。（第 261 页）所谓发展，就是稳定性的“继续”，就是



事物在同周围环境的联系中其稳定性不断“破坏”而又愈趋“完善化”的过程（第247—248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点滴进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都利用庸俗进化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等。馮定同志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为他的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效劳的。他在《平凡的真理》中说：“今天……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来说，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是越来越可能了”（第369页）。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谁害怕革命、反对革命，谁就不能不害怕辩证法，反对辩证法，歪曲辩证法。馮定同志为了兜售“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一系列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就在《平凡的真理》中用矛盾调和论或矛盾调和论篡改辩证法。

#### 四

馮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在论述社会历史问题时，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对历史的总的看法是什么？怎样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前途？《平凡的真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表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观点。这是同历史唯物主

义相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

馮定同志认为社会历史是一切人追求幸福的历史，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就是：“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而进行的迟速又和人的觉悟及其怎样在有意識的行动有关”（第209页）。这就是馮定同志对历史总的看法。

人道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推论的起点的。如前所述，馮定同志把求生存、要活命、趋利避害、得乐免苦说成一切人共有的本性。据他看来，从这一点出发，人与人就结成社会，进行历史活动。

人性论总是首先把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人，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想法和欲念。馮定同志的所谓“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实际上完全抹杀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要求生存的愿望，追求幸福的意向，都是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都是由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奴隶主的求生愿望是骑在奴隶的背脊上作威作福，奴隶的求生愿望就是反抗奴隶主的皮鞭。资本家追求幸福的时候给无产者带来了痛苦，“被压迫阶级的追求幸福的意向岂不是冷酷无情地并且‘根据正当理由’为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向而作了牺牲品吗？”<sup>①</sup>

<sup>①</sup>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版，第29页。





不同阶级的人，要求生存、追求幸福是互相冲突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根据抽象的人性，向一切人推荐“活命哲学”，只能是掩饰压迫者的特权和劝导被压迫者安于现状。

人性论又总是把社会的人当成孤立的个人，然后以个人为中心来说明社会。有的读者批评馮定所谓“人为了生活，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这种说法是利己主义的，馮定同志在《重印附言》中答辩说：这是“很大的误会”，因为“有利不利，不仅是对个体而说的，而也是对族类而说的。”（第11页）这非但没有消除“误会”，反而更证明读者的意见正确。把人类社会仅仅看成是由“个体”组成的“族类”，这就是抽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变成了好像羊和羊群的关系。所谓“族类”、“整个社会”，依然不过是许许多多“争取对己有利”的个人的聚集而已。

《平凡的真理》把历史归结为个人的活动，因此就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也就看不到代表群众的领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馮定同志说社会越古，领袖的作用越大；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领袖的观念也将无形消失了”（第390页）。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他又进一步附和了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谬论。从前的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归结为几个“大人物”的作用。馮定同志同样也是以个人的活动来解释

历史，但他把历史归结为“小人物”的作用。作为“平凡的人物”的个人，趋利避害的活动就是历史。所以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说：“生活就是历史”。

总之，“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这种对历史的总的看法，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历史，用个人追求功利的活动来解释历史，因而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平凡的真理》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述也是错误的。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类的劳动和精神……浪费在人和人的斗争或者战争中”（第129页）。竟至于向“有理性的人”发出一个仁慈的号召：“动植物一般也不是同种相残的；……那么有理性的人，当生产力已是这样发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提倡同种相残呢！”（第267页）

馮定同志到底怎样看待阶级斗争呢？他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为的大灾害”，总是用消极的、伤感的眼光来描绘它的“激烈和残酷”，从来不提革命的阶级斗争对于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在馮定同志所提供的社会发展史的图景中，是看不到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的。他只是说：“奴隶对生产日益不感兴趣，……于是奴隶制社会就非由兴旺到衰落不可了。”“农奴或者农民对生产日益不感兴趣，于是封建制社会就非由兴旺到衰落不可了”（第115页）。历史上轰



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在馮定同志的笔下都被勾销了。既然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那么又是什么呢？馮定同志给历史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最后发条”，叫做“劳动生产”（第106页），而又把“劳动生产”归结为“人的本能”。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把历史看作是生产的发展史。但问题在于馮定同志对生产的理解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馮定同志从人类劳动生产中抽去了社会的本质，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歪曲为生产力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决定于生产力的自行发展。

馮定同志的生产力论，是从人性、从人要求生存的愿望直接导引出来的。他写道：“正是因为人要求生存就不得不有不断生产的行动，而在不断的生产中生产工具就必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就必然不断提高，于是也就出现了生产力不断向上的规律，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等等的规律”（第215—216页）。从“人要求生存”引出了“生产力不断向上的规律”，那么，只要人并不放弃“要求生存”，生产力就一定能合乎“不断向上的规律”自行发展了。这就是说，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发展；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按自身的规律就能“不断向上”、“直线向上”，或者说，生产力合乎“不断向上的规律”发展了，生产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而社会发展阶段的高

低，也仅仅是由生产力的高低来决定的：“任何生产力较高因而也就发展较高的社会，都是经过发展较低的社会而来的。”（第125页）生产力的水平成了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志。这原来是第二国际人物和布哈林的陈腐不堪的调子。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sup>①</sup>《平凡的真理》所表达的人性论的历史观，正是站到了阶级斗争观点的反面，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宣扬生产力论，因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前途。馮定同志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的基本线索，因而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前途问题。馮定同志不说共产主义是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愿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伟大理想，而是一心要把它说成一切人的“乐园”，不论谁，只要“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认识了”他所发现的那些历史规律，就会“觉得社会主义是合乎理性、正义和普遍道德的好东西了”（第225页）。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

<sup>①</sup>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爭。但《平凡的真理》的作者用十分明确的語言否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階級。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在对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的同时，必須对剝削階級实行专政，而馮定同志却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正全民的民主”。否認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专政，这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在政治上，則是站在資产階級方面向无产階級进行階級斗争，助长資本主义复辟的活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的矛盾。《平凡的真理》中沒有說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是否还有矛盾，但肯定地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已經沒有矛盾了：“誰都知道生产力的繼續提高，也就是人类幸福的繼續提高，所以誰也不会对生产力有意加以阻撓的。”（第373頁）《平凡的真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人类历史从苦难到幸福的完成，一切社会矛盾当然也就都消失了。

总括以上所說，《平凡的真理》的作者是用人性論来解释历史，抹杀階級斗争、宣揚生产力論，用福利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历史观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革命、反对无产階級的世界革命的。

\* \* \*

由此可見：

一、《平凡的真理》是一本庸人哲学，也就是資产階級哲学，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針鋒相对的。它只讲个人“趋利避害”，不讲階級斗争和革命，它要人們放弃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在个人生活上寻求滿足。这本书是帮助資产階級毒害青年的一本坏书。

二、这本书是由各种資产階級腐朽思想拼凑而成的，折衷主义色彩十分濃厚，而主要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燴。它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下，利用各种資产階級哲学，系統地歪曲了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和批判这本书的資产階級思想实质，是无产階級与資产階級在意識形态領域的階級斗争的一部分，必須大力进行。

三、这本书也是現代修正主义的哲学。現代修正主义者宣传耍脑袋不要革命，而馮定的这本书也就是为現代修正主义这种活命哲学作宣传的。

四、这本书再次告訴我們一个真理：在今天如果有誰否認階級和階級斗争，不管他为自己說了多少好話，他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和馬克思主义者。我們必須用这个标准去鉴别一切思想和言論。





編者按：本刊发表张启勳同志的《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来信以后，陸續收到許多讀者來稿來信，參加討論。現將一部分來稿來信摘要发表如下。



## 过渡时期沒有階級斗争嗎？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階級和階級斗争問題，馮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中写道：“中国資本主义工商业自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定股定息以后，已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矛盾也已經基本上解决了”。“从国际來說，因为帝国主义繼續存在，所以階級斗争还是尖銳和劇烈的；但是从国内來說，除了和帝国主义呼应的潜伏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仍須清除外，階級斗争一般說來是已成了残余了”。馮定同志还嫌这种說法不够明确，在一九五七年初写的《重印附言》的結尾，干脆說得更明确一点：“今天，……至于国内，除了仍須警惕从帝国主义方面而来和潜伏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

活动以外，当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的时候，自不能再強調階級斗争的紧张的。”

首先，我认为馮定同志所說的两个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的提法，是錯誤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說过：“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sup>①</sup>一九五七年，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4頁。



他又指出：“在我国，……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sup>①</sup>一九五八年五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sup>②</sup>由此可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并没有解决。这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像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这些讲话发表以后，冯定同志仍然在该书的一九五九年第二版和一九六〇年的第十次印刷本中，保留着同中央背道而驰的提法，这不能说是疏忽的缘故，而是显然有意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

冯定同志这个论点也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就在冯定同志写《重印附言》的一九五七年，我国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叫嚣要和党“轮流执政”，甚至于要共产党下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烧掉。这一

年，应该以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一年而载入我国史册。是否只有一九五七年阶级斗争才是激烈的呢？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论断。

我们还看到，冯定同志的这种提法，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版本中还没见过，却单独出现在一九五七年的《重印附言》和一九五九年的第二版中。不能不指出，冯定同志恰恰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这种观点，在客观上起了一种极坏的作用。

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还发表了許多抹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否在过渡时期中一劳永逸地建立问题。

冯定同志在论述生产关系问题时写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和成熟，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那么也就能一面建设一面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7页。

<sup>②</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产关系来了；这样也就‘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对生产资料私有财产制度，因而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并使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永远迅速向上；从此，新的生产关系的适合新的生产力，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反动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来阻挠和抗拒了，而可以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了。”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联系而又有差别的，这点谁都知道。如果说全世界都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作者所说的一劳永逸地消灭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那是真的。但是，作者在这里明白写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问题。试问：“在一面建设一面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时期中，而这个过渡时期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怎么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呢？怎么能够“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反动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来阻挠和抗拒了”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的剥削者必然存在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也不是再也没有统治阶级的抗拒了，列宁说：“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已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sup>①</sup>。历史告诉我

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但是，这个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你死我活斗争的过程，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会遭到被推翻的剥削者和统治者疯狂抗拒的过程，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只不过是骗人的空话而已。

(二) 关于人类的完全平等、全民的民主问题。

在叙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时，馮定同志写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首先认为人类是完全平等的”。“比如民主这样的概念，从资产阶级当做反封建专制的口号开始，经过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虚伪的民主，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给予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直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真正全民的民主”。

平等、民主，在阶级社会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那是有阶级性的，然而馮定同志在这里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认为，而且还是首先认为，人类是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什么全民的民主。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人民享受的民主，的确也正是在集中指导下的真正的民主。但是，能不

<sup>①</sup>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236页。





能因此认为在今天的阶级社会里，人类是完全平等的，可以实行全民的民主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当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在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如果提倡什么“全民民主”和“人类的完全平等”，那就意味着叫已经获得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被推翻了的国内反动统治阶级一起享受民主，意味着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和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阶级讲阶级合作。试问：这种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和“人类的完全平等”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所吹嘘的“全民民主”、“全民国家”、“人类平等”又有什么区别呢？

### （三）关于建设时期的工作问题。

作者写道：“然而在建设时期，就没有武装斗争时期那样轰轰烈烈的东西了，而主要的是按部就班和细琐繁杂的工作了。”我不知作者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也不明白作者所指的轰轰烈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人民干的都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在这样伟大的、崭新的、艰巨的事业中，能够说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工作和斗争，而只有按部就班和细琐繁杂的工作吗？目前，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在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

命运动中，正在广大的城乡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难道不是轰轰烈烈的事业？只有不看现实，闭门造车，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毫无热情的人，才会得出馮定同志这种结论：

### （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人类历史要前进，社会主义社会要前进，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呢？作者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新社会发展的动力”一节中说：“在旧的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的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不再是阶级斗争了。”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进行残余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永远也将是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馮定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了。他甚至把“批评”神化起来，说它还可以去“批评”反动的敌对阶级分子，可以是进行“残余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可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唯一无二的动力。在这里，馮定同志不知道把阶级斗争放在哪里去了？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吗？试问：在阶级和阶级



斗争依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用阶级斗争去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你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击退他们吗？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叛乱，西藏地方的上层反动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勾结发动武装叛乱，不是用阶级斗争，不是用枪杆子镇压叛乱分子，你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批评倒他们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仍然是生活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我们没有也不

可能有其他的出路，而只有一条路，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sup>①</sup>

（共青团广西僮族自治区

柳州市委员会 冼光位）

## 敌 我 矛 盾 不 容 调 和

馮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第九节《成事在人》中有这样一段话：“试拿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来说，因为反革命分子走的是死路和绝路，因为有不少人被政府的宽大政策所感动，向政府认过悔罪，以至立功赎罪，使潜伏暗藏的反革命组织粉碎瓦解，所以这种矛盾的范围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解放以来不少反革命组织的“瓦解”，不少反革命分子的认罪悔过，敌我矛盾的“缩小”，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反

革命分子认识到自己所“走的是死路和绝路”，因此回心转意，洗手不干了。二是“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反革命分子深受“感动”，于是“认过悔罪，以至立功赎罪”。在这里，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无产阶级专政不见了，我们只看见人性理智在发挥作用，我们只看见一幅阶级调和的图画。

馮定同志的这种说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篡改，是对我国人民民

<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2页。



主专政的歪曲。

馬克思列宁主义一再告訴我們：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并不是階級斗争的結束，而是階級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繼續。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階級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将存在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階級为了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为了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建立、巩固并加强自己的革命专政，严酷无情地镇压階級敌人的各种破坏和顛覆活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无产階級要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階級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sup>①</sup>“誰不了解这一点，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資格当无产階級的領袖或顧問。”<sup>②</sup>

十五年来，我国已經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各种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分子。“就全国來說，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sup>③</sup>这是勿容怀疑的。但是，这些成就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不是如馮定同志所說是“因为反革命分子走的是死路和絕路，因为有不少人被政府的寬大政策所感动”呢？不！絕不是！众所周知，解放以来，我国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之所以获得重大胜利，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是

由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和发挥了强大的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器的作用。我国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軍和广大民兵，警惕地監視着敌人的动向，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美蔣反动派的侵犯和窜扰，保卫了祖国的安宁；我国的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分工負責，統一对敌，只許敌人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如果乱說乱动，立即予以取締，从而又稳又准又狠地打击了公开的和隱蔽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维护了社会秩序，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亿万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政法机关的对敌斗争，造成了陷反革命分子于灭頂之灾的汪洋大海。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强大威力，正是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才使我們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才“使潜伏暗藏的反革命組織粉碎瓦解”，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嗎？

固然，“反革命分子走的是死路和絕路”，但是，这怎么可能“縮小”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呢？灰尘尽管骯髒，可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切反动階級必然要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8頁。

②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1頁。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16頁。



违背社会的进程，抗拒历史的潮流；即便在他們被推翻以后，也总是过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計人民的力量，总是企图“螳臂擋車”，“蚍蜉撼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①

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中国的时期，豢养了大批的爪牙——土匪特务、伪軍警宪、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他們对于自己在中国国土上的失敗，当然是决不甘心的。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美蔣匪帮和一切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一刻也沒有停止过他們的反革命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处心积虑地妄想顛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重新騎到人民头上来作威作福。因此，他們和革命人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对抗性的矛盾，要他們不反对人民，不反对革命，无异与虎謀皮。

誠然，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向政府投案自首的。但是，一方面，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毕竟是一部分，怎么能“以偏概全”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只是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威力，处于人民群众的“四面楚歌”之中，同时由于党实行“首

恶必办，胁从不問，坦白从寬，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肃反政策，有力地打击和分化了反革命势力，这才使他們投案自首的。沒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不經過持久的、頑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經過坚持不懈、紀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战斗”②，这些在旧軌道上生活慣了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向人民认罪呢？馮定同志絕口不提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侈談革命同反革命的矛盾的“縮小”，这决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

当然，我們所說的肃清反革命，并不是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让他們活下去，让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們劳动。也对他們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对俘虏軍官們已經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頁。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頁。



这是我們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們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sup>①</sup>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們党制定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事实证明，党的这一政策是英明正确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許多反革命分子通过劳动改造和教育启发，逐步地改变了原来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場，开始认罪伏法，痛改前非，并且学会了一定的生产技能，从四肢不勤的寄生虫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我們就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了。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訴我們：对于反革命分子，首先是镇压，只有镇压才能使他們服罪（不是全部服罪，必然有些执迷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会頑抗到底），否則，宽大脱离了镇压，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

我們知道，大部分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前是欺压人民、好逸恶劳的，长期的反动統治，使得他們的头脑中不但充滿根深蒂固的反动观点，而且浸透了剝削寄生的生活恶习，要彻底改变他們的反革命反人民的立場，要彻底改造他們的剝削阶级思想，不經過长期的严重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是决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

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sup>②</sup>。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些頑固分子会抗拒改造，这就需要专政机器去强迫他們劳动，强迫他們改造；而且在刑滿释放以后，在一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或者遇到风吹草动，有些反革命分子还可能旧病复发，重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人民的政权就还要對他們实行专政。很难設想，不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不經過长期艰巨反复的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会自动地改邪归正，“认过悔罪，以至立功贖罪”。

总而言之，我国十五年来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离不开革命的群众运动。馮定同志对这些視而不見，对解放以后我国人民同反革命进行尖锐斗争的事实置若罔聞，而空談什么矛盾的“縮小”，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我們决不能同意馮定同志的这种說法。

（北京大学学生 俞建平）

<sup>①</sup>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頁。

<sup>②</sup> 《实践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頁。



## 英雄事迹从哪里来？

馮定同志說：“董存瑞和黃繼光，在一瞬間是不可能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詳細的比較、考慮和選擇的，而可能只是一種正義的衝動”。

馮定同志對英雄人物的這種估價，我們決不能同意。

我們偉大的人民英雄董存瑞、黃繼光等同志，眼觀全球，胸懷世界，有着為祖國、為黨、為人民奮鬥終生的偉大理想，有着為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奮鬥的偉大理想。因此，在無論什麼場合，無論什麼時間，他們總是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一旦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他們毫不猶豫地使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這種思想修養，是在日常鬥爭中鍛煉造就出來的。英雄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不能兼顧的時候，能否堅決棄去個人利益，維護集體利益，是考驗自己是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的關鍵時刻。他們無論在平時或者在危急的關頭，都會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比較的，而他們

在危急的關頭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正因為他們在平時做過比較，有了正確的認識，決不是像馮定同志所說的那樣：“在一瞬間是不可能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詳細的比較、考慮和選擇的，而可能只是一種正義的衝動”。

事實不正是這樣嗎？如果說，董存瑞、黃繼光在臨犧牲時沒有人在場，沒有人聽到他們說些什麼（然而，從他們的出身、經歷、日常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我們是完全可以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有那些英雄表現的），那麼請來看看向秀麗、劉文學吧！當烈火衝向向秀麗的時候，她在這一瞬間是不可能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詳細的比較、考慮和選擇的嗎？不是的。她完全考慮到，如果烈火引起金屬鈉的爆炸，工廠的財產、同志們的生命，都會遭到嚴重地損失。這時，擺在她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是逃跑；一是勇敢救火，舍身為公。向秀麗果斷地選擇了後者，而棄去了前者。當同志們看到向秀麗的鞋、褲都着了火，便撲過去為她滅火，可是向秀麗同志卻大聲喊道：“別管我，快去搶救





金属钠!”向秀丽是这样，刘文学也是这样。刘文学捉住坏蛋王荣学不放，王荣学就利诱我们的小英雄，从腰里掏出一元钱来收买刘文学，可是，刘文学断然将那元钱摔在地上，并厉声说：“谁要你的臭钱，我要保卫公社的利益！”他抓住王荣学的衣服，要拖他到公社治安委员那儿去。坏蛋王荣学看到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把捏住刘文学的手，威胁着说：“你敢拖，我捏死你！”事情不又是很明显吗？摆在刘文学的面前同样有两条道路：一是对坏人的破坏活动不管，放掉坏人，保住自己一条生命；一是和敌人斗争到底，誓死不屈。我们的小英雄怎样呢？他同样是选择了后者而弃去了前者。他听到王荣学要下毒手，便大声喝道：“你捏死我，我也不放走你这个坏蛋。”这声音撕碎了当时的夜幕，使得敌人胆战心惊。这怎能说是“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呢？既然有比较，就是一种受到理智支配的行动，而决不是什么“正义的冲动”。

再说，馮定同志所说的“正义的冲动”的来源，也是十分令人费解的。馮定同志说：“然而这种冲动，对先代的义士们、烈士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大义或者说是认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才能有的，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革命的意义和

不断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才能有的。”既然烈士们平时深明大义，深明革命意义，他们的行为就是受到理性支配的，怎么会是一种“冲动”呢？馮定同志说，英雄行为“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那么，“平时深明革命意义”，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呢？显然，馮定同志论述问题的逻辑，是十分混乱的。

由此可见，馮定同志在发挥了他的“正义的冲动”的观点以后，虽然加上了一个他们“平时深明大义”的尾巴，但是，这个尾巴既然同“正义的冲动”的观点相矛盾，自然也就不能补救这个观点的错误。

还应当指出，馮定同志的这种说法，是有意或无意地在否定英雄人物的阶级立场。

人们的言语行动，都是受一定的阶级意识所支配的，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英雄人物，则更是本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保护者。黄继光、董存瑞、向秀丽、刘文学、雷锋等同志，被我们歌颂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最大限度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馮定同志所宣传的观点，恰恰是否认了这一点。因为，既然馮定同志断定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比较、考虑和选择的，那么，黄继光究竟是为了那个阶级干出可歌可泣的业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因为反正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罢了。这等于是说，像



黃繼光那樣的英雄，已經完全失去了他們原有的階級立場，而變成超階級的人了。這種說法，對英雄人物當然是一種誣蔑。

事情既然是如此明白，馮定同志為什麼要宣傳他那種錯誤的論點呢？我認為，問題的實質在於，馮定同志有意或無意地在否定英雄事件能夠誕生的先進的思想基礎，有意或無意地在否認人們的思想革命。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正在加強政治理論學習，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斷提高認識水平，不斷向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道路邁進，堅定地樹立起為人民、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人生觀。黃繼光、向秀麗等同志之所以成為英雄人物，就是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重視改造思想，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不斷走革命化道

路的結果。平凡而偉大的戰士雷鋒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形成，更是一個光輝的典範。雷鋒非常注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語行動。他的生活歷史向我們表明：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注意鍛煉自己，才能够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們应当向雷鋒、向一切英雄人物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

如果英雄事件的誕生不是這樣，而是像馮定同志所宣傳的那樣，只是一種“正義的衝動”，那麼，我們黨所提出的不斷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斷進行自我教育，不斷改造思想，走革命化的道路等等號召，都是沒必要的了。

（陝西省華縣赤水公社

青年農民 李小林）

## 駁“和平轉變”論

張啟勛同志批判了馮定同志在《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所提出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就可以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和平發展的錯誤觀點，是十分正確的。我發現，馮定同志在他所寫的另一篇文章《關於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見“青年共產主義者叢刊”第

十三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四月出版）中，這個錯誤觀點表達得更加明確，更加露骨。由此可見，馮定同志的這個錯誤觀點不是偶然產生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貫這樣認識的。

馮定同志在這篇文章的第三節中說：“中



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一致的思想，而且实现了和平转变。”又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像党的争取和取得革命领导权，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以至最后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说明社会主义的因素是早已出现了，而且也说明和平转变的条件是在逐渐具备的”。

这就是说，冯定同志不仅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而且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逐渐具备了“和平转变”的条件。如果说，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其主要错误在于抹杀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所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那末，冯定同志在《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一文中的这个观点，就明白地否认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制度，是因为我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武装斗争，实现了由工人阶级掌握国家领导权这个极其重要的前提。

为什么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能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

道路，即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呢？这是因为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大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家采取和平的方法来加以改造，这是因为“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sup>①</sup>冯定同志根本不提这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而在那里宣传什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变”的条件，正如张启勋同志所说：“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

难道说，中国革命，不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就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和平改造？冯定同志始终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冯定同志说什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刘少奇同志指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

<sup>①</sup>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



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sup>①</sup>刘少奇同志这个论断，才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冯定同志不仅用他的“和平转变”论来歪曲中国的革命历史，而且用它来歪曲当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他在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中说：“革命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就不必定要再经过内战，再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可上下配合，使政权在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一步一步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在革命过程中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必定要再经过内战，再经过流血的革命”。但是，“革命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决不是“上下配合”可以实现的。

冯定同志所说的“上下配合”，究竟指的什么内容？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还是指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不是什么“上下配合”的关系，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果指的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那末，群众是由各个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

革命，是不是要取得所有的阶级的“配合”呢？究竟指的什么？我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进行阶级斗争，而决不是冯定同志所说的什么“上下配合”。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如果违反阶级斗争始终继续的客观规律，否认阶级斗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和完成”，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

冯定同志在论述如何“一步一步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时<sup>①</sup>候，根本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提什么“上下配合”这种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除了把人们引入迷途以外，还能产生什么作用呢？

（中共浙江省诸暨县委员会 陈瑞苗）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页。



# 西方基督教神学 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楊 真

历来一切剥削阶级总是标榜宗教和神学是“超阶级”、“超政治”的绝对真理，用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的。资产阶级神学家为了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搜罗了当代各种各样的反动理论，以那些腐朽反动的思想作为素材，进行加工，使之披上宗教术语的外衣。

这些资产阶级神学家，宣称从“神的启示”出发，从“圣经的永恒真理”出发，把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组成体系的大山，压在反抗资本统治的广大人民头上。尽管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牌号，但是，各种派别的说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这一点上，并无差异，只是他们贩卖反动思想的重点和玩弄宗教术语的手法有所不同而已。资产阶级哲学家华尔特·考夫曼曾经拆穿这些神学家的西洋镜说：在今日西方教会中，所谓神学研究，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拼图游戏。要拼凑出什么图样是早已规定了的，各种圣经经句无非是可供任意剪裁、任意取舍的纸板，神学家们

只是以独断的方式，各玩各的一套把戏。<sup>①</sup>

许多西方神学家口口声声说，他们的神学是出发于上帝，归结到上帝。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雪亮，他们的神学是出发于政治，又归结到为政治服务的。美国的反动神学家莱因霍·尼勃就曾经宣称：任何抽象的神学命题，总离不开现实的利益<sup>②</sup>，“衡量任何思想体系的一个标准必须是政治的智慧”<sup>③</sup>。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也承认，政治效用是估价神学作用的标准。

在今天的美国，神学更是赤裸裸地被用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一九六一年三月，美国《报道者》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思想：一种新的

① 《宗教与哲学的批判》，第219页。转引自1962年9月19日《基督教世纪》周刊，第1123页。

② 《人的本性与伦理》第2卷，1943年伦敦版，第236页。

③ 《伯特为什么在匈牙利问题上沉默》。1957年1月23日《基督教世纪》周刊，第108页。



国防工业》。文章报道，美国成立了許多“公司”和“研究所”，它們雇用了各种专家，接受美国政府所給予的任务，从事战略战术、武器、外交政策、裁軍等問題的专题研究，提出各种报告。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就包括有神学。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現在美国的神学研究，已和制造枪、炮、导弹一样，被并列为战争“工业”，可以按照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規格”，用“訂貨合同”方式，加工制造出来。

下面就讓我們考察一下，西方基督教神学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作为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反映，西方神学的主流一直是以瑞士神学家巴特为代表的所謂“危机神学”。这一神学流派宣称，人类絕无希望，唯有等待天地末日来临，人类历史完結，由耶穌基督施行救贖。这个神学潮流受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风行到五十年代中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企图以新的世界战争威胁来建立它的世界霸权，实現在它統治下的“世界一体化”，把核讹詐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这一政策的需要，西方的一些神学家也把核讹詐政策演化成为基督教的历史观。他

們竭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說什么“在我們的时代中，这个星球和其上一切生物遭到灾难性的毁灭，已經可怖地成为真实”<sup>①</sup>。他們宣称：“历史只是一場噩梦”，“基督徒和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同样，看不出世界历史有任何意义”，“历史本身也是一部罪的历史”。<sup>②</sup>

从这种反动的历史观出发，他們竭力宣揚苦难的人生观，說什么上帝呼召人“自願地担当苦难”。他們不仅鼓吹忍受苦难，而且进一步提倡欣赏苦难和推崇苦难，說什么“上帝正以扩大悲剧的办法，促使人們改变过去的伦理观念”；“在受苦之爱中就与基督一同为王”。<sup>③</sup>

这种神学，只能称为核讹詐神学。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詐政策，到了这批神学家手中，已經演化出一整套反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美帝国主义給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西方基督教神学却为它加上了一个“圣光环”。

一九六一年，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新德里举行大会。当时，美国垄断資本家的喉舌《时代》周刊，特別推

① 見保罗·弗吉斯：《耶穌基督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的終极性》。《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10月号，第22頁。

② 見《世界信义宗》杂志1963年7月号，第264、262、263頁。

③ 保罗·弗吉斯：《耶穌基督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的終极性》。《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10月号，第22、24、25頁。





荐这次大会的美国讲員、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約瑟夫·西特勒。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认为，共产主义为人与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前景。对比之下，基督教已萎縮成为“我們軟弱中的支持，孤独中的伴侣，神經病患者的安慰和我們国家的在天之佑”。于是，他狂妄宣称：现在需要一个囊括宇宙的基督論，这种基督論要使“灵性的核心光”照到“經濟、政治和人类事务的一切方面”。<sup>①</sup> 西特勒这些话，充分透露了美帝国主义要求西方神学家制造一套新的神学体系来适应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意图。为此，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号召全世界教会，在今后几年內，集中研究所謂“在普世历史一元化的时代中，耶穌基督的終极性”<sup>②</sup>。

这一套新基督論的基本要点，就是宣传世界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实现“世界一体化”的全球战略服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些反动的西方神学家首先从人性論方面来宣揚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过去，他們为了宣揚世界末日，否定历史，就要大讲人的罪性，強調人的墮落敗坏，无可救药。而現在，他們却把十九世紀资产阶级的神学老調翻了出来，強調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与上帝一样拥有自由意志。

过去，西方资产阶级神学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基督教社会。当时，流行的讲法是，人們再也不能用违反聖經的幻想来欺騙自己，說可能出現一个合乎基督教理想的世界，世

界的罪恶决不是若干社会改革所能医治的。而現在，他們却大肆标榜资本主义社会，是合乎公义的“基督教社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研究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約翰·馬許并且說：“完全可能有一个社会，根据基督教对人生的理解来安排生活，而决不要求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在这种所謂“基督教社会”里，“十字架就使那本来不可能沟通的人們，……奴隶和自由人，……有文化的人与野蛮人之間，……得以跨越鴻沟，联結起来。”<sup>③</sup>

按照他們的說法，“世上一切生物都由創造的主宰把它們納入了一定的軌道，像太阳系中各个星球一样，必須在它自己的軌道上运行，在它的深处則与上帝联結在一起。”<sup>④</sup> 这就是說，帝国主义、剝削阶级按照剝削的軌道永恒运轉，殖民地被剝削的广大人民也必須按照被剝削的軌道永恒运轉，两者联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統治。他們认为，这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早已預示的，使普世历史与上帝和好”的图样，也就是所謂“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中，耶穌基督的終极性”。<sup>⑤</sup>

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世界一体化”就这样經過一些反动神学家的手，貼上了“普

① 轉引自《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7月号，第501頁。

②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研究組公报第8卷，第2期。

③④⑤ 《耶穌基督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中的終极性》。《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10月号，第7、9、10、11頁。



世历史观”、“福音里的自由”、“十字架上的和好”、“三位一体上帝的统治”等等基督教标签，推销到各国基督徒中去。

总之，为了密切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西方的一些反动神学家拿上帝作招牌，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种种自相矛盾、语无伦次的诡辩。他们一会儿说，上帝与罪恶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因此，人类的历史毫无意义、毫无希望，要求人们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放弃斗争；一会儿又说，上帝正在人类历史中加紧工作，使世上一切逐渐结为一体。过去，基督论强调所谓“耶稣基督的独特性”、“超越世界”，以此来否定世界；而现在却又强调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以致一切人类事务都俨然有耶稣基督插手其中，借此鼓吹基督徒要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事反动的政治活动。<sup>①</sup>在这些帝国主义神学家手中，上帝也好，基督也好，都是这样挥之即去，召之即来的。

## 二

近年来，一些反动的西方神学家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一反过去竭力抵制“和平共处”这个字眼的态度，也大肆标榜要从神学上来谈论“和平共处”了。

他们宣称：要把敌人、朋友的观念从人们心目中除去，才能得到“福音里的自由”。

在“福音里的自由”中，人性——无论敌人或朋友——都是一样的。谁要是揭露、指摘敌人，谁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这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们都不许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罪行。

他们宣称：为了“和平共处”，还要进一步“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体会它”，要“学习为对方而活”，要“紧密合作”，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战争，如老挝、刚果。很清楚，这是不许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帝国主义之命，并且企图要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的伙伴，同它们“紧密合作”，一起去镇压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sup>②</sup>

人们不难看到：这种神学理论，正是美帝国主义所竭力寻求的压制世界人民革命、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肮脏武器。长期以来，一些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西方反动神学家们，一直在利用这种“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妄想使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蜕化变质。

资产阶级分子完全懂得：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被打倒的资本主义的腐烂的臭气，还会从各方面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只要一有机会，幽灵似的旧思想又会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滋长起来。天主教神学家雅谷·马利坦就曾经这样说过，老的一套教育，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以

<sup>①</sup> 见《普世教会评论》1962年10月号，第13页。

<sup>②</sup> 见英国公谊会乌尔曼在1961年布拉格基督教和平大会上讲演。



及聖誕樹、生活娛樂這樣一些老的生活方式，還在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提供障地，它將使各種舊思想恢復和滋長起來。他特別指望宗教在其中發揮作用。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內，在無產階級清掃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過程中，那些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將利用基督教作藏身的堡壘。

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大肆誣蔑，但是，對於現代修正主義者丑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叛變行為，則大加贊賞，說這是有“創造性”的“自我批評”，這樣“悔罪”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與“饒恕”。他們還乘機大作文章，把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动說成是普遍人性的反映，宣稱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不了人性，企圖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sup>①</sup>



西方的一些反动神学家利用基督教神学掩盖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罪行。他们竭力宣扬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反动历史观，说什么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侵略，是由于“西方人富于进取心”和“西方文明富有生命力”。在这里，他们搬用了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理论，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高峰，把“西方文明”说成是全世界从古到今，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明”。按照这种反动理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没有罪过，倒

要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自己“不争气”，“没有进取心”。按照这种反动理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就注定了永远是劣等民族、次等国家，永远要处于“西方文明”的侵略和奴役之下。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下，西方的反动神学家詭称殖民统治是早已过去的历史陈迹，仿佛今天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些软绵绵的羔羊，在为他们的祖先作高贵的“赎罪牺牲”。而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则被歪曲为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心理隔阂”和“彼此猜疑”而引起的。这样，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都不见了，只剩下殖民地人民的“心理”问题，而基督教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不再“猜疑”西方帝国主义，转而与它们“信任合作”。<sup>②</sup>

为了掩饰新老殖民主义的残酷掠夺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帝国主义神学家们还大肆宣扬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美国一个天主教神学家最近援引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高级人员的话说：“今日的世界长了毒瘤，这个毒瘤的细胞就是人。”他还把所谓“人口爆炸”说成是仅次于核战争的全球性威胁，他认为，欧洲、北

① 见《普世教会评论》1962年7月号，第507—509页。

② 见1963年8月29日普世圣公宗大会上麦克斯·华伦演讲：《教会在宗教边疆上的使命》。



美不必担心所谓“人口爆炸”这问题，只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才构成严重局势。美国借对外“援助”残酷掠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财富，而这个神学家却把“美援”越多，剥削越残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越穷困这一事实，归罪于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太快。他甚至说，“不发达国家若不经过巨大的人类灾难，就很难有希望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前景是一个黑暗时代，其中充满苦难、饥荒……它将发展成为灾难，引起夺取日益减少的生存资料的战争”。<sup>①</sup>他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说明了自己对殖民地人民的刻骨仇恨，把殖民地人民看为毒瘤，看为世界灾难的根源。他还要求受尽帝国主义压榨的殖民地人民，承认自己是“多余的人”，心甘情愿饿死，心甘情愿让帝国主义任意宰割。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神学家侈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伪善，以及他们利用反动人口论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服务的阴谋。

西方的反动神学家特别重视利用神学来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一贯宣称，“基督的救赎”是世人的唯一希望，任何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的理想都是“偶像崇拜”，都是“犯罪”和“背叛上帝”。在当前，由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怒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帝国主义神学家又改变手法，伪称他们并不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流血牺牲。他们宣扬非暴力主义，鼓吹“爱仇敌”和“以爱去征服敌人”。他

们竭力向殖民地人民输出唯爱主义，仿佛这是他们拳拳服膺的基督教真理。但是，在美国的一些神学院习用的《基督教伦理学原理》教科书里，却援引圣经旧约说：“上帝就是一个战争之神。战争之得以发动是由于上帝的命令，战争成就了上帝对世界的旨意。……战争将要继续到时代的终结。”<sup>②</sup>显然，圣经如同一个杂货摊和垃圾堆，帝国主义需要什么货色，它的神学家就从圣经中拿出什么货色来。帝国主义有任何政策上的需要，神学家都可以从这个垃圾堆里拣出一点破烂，加以粉饰，把它装扮成“绝对永恒的真理”，作为基督教的信仰来欺骗人民。

帝国主义神学家特别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鼓吹“世界主义”，宣传“超国家”思想，根本否定国家独立主权原则。他们宣称，国家不是主权者，甚至人民也不是主权者，只有上帝才是主权者。美国新教神学教授白斯特认为，人的生存，重要的是他与创造主上帝的关系，民族国家是无意义的，世界的区域性组织也无意义，基督教应当训练人从“世界角度”来想问题；尤其今天，既然要谈裁军、谈和平，更必须放弃民族国家观念。<sup>③</sup>这种否认国家独立主权原

① 约翰·欧勃莱恩：《人口爆炸要求全世界采取行动》，1964年1月8日《基督教世纪》，第43—46页。

② 阿尔伯·纽德逊：《基督教伦理学原理》，1943年纽约版，第51—52页。

③ 白斯特：《幻想的彼岸》，1964年1月8日《基督教世纪》，第41页。



則的論調，只不过是為美帝國主義侵略和顛覆別國的罪惡活動作掩護，企圖取消民族解放鬥爭。雖然也有一些反動的神學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日益覺醒的情況下，被迫改換手法，說什麼這些地區的人民也可以接受和使用若干民族傳統，但重要的是通過基督教接受所謂“西方文明的真髓”。顯然，他們的這種做法，也只是為他們所鼓吹的“世界主義”披上一件民族化的外衣而已。

帝國主義利用神學掩蓋它的殖民統治罪行，反對各國人民武裝革命，鼓吹美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世界一體化”，這三項任務，經一個美國神學家概括成如下的所謂“傳教神學”口號：“普世的上帝、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一體化”。它的實質就是帝國主義的反動歷史觀、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世界主義”。這便是今天西方基督教領導人所鼓吹的“傳教使命”。

帝國主義為了進一步散播這些反動思想，正在不斷總結利用基督教從事反動活動的經驗。在這方面，西方教會中的反動政客提出：教會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不要再企圖從上面控制一切，而要參預一切，由下面去施加影響。他們說，“過去教會往往力圖控制各種世俗事務，結果引起人們對教會統治的反叛”；“要使時間倒退，再重建宗教的至高地位是毫無希望的；即使能夠作到那樣，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認為，“今天的教會應該比中世紀教會

謙卑，而同時又抱有更大的雄心”。<sup>①</sup>

但是，這些神學家與政客的反動本質，注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吸取歷史教訓。歷史事實告訴人們：自從資產階級革命打倒了中世紀的封建神權統治以來，中世紀神學那種不可一世的地位也早已消失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工人階級終於找到了歷史變革的秘密，並且從自己身上找到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芒已經照遍全世界。基督教與它的神學無論怎樣改換新裝，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施展它的騙術了。

一百二十多年前，馬克思就曾經指出：“宗教本身是無內容的，它不是靠天國，而是靠人間生活，而且隨着顛倒的現實（其理論便是宗教）的解体而會自行沒落的。”<sup>②</sup>

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們按照帝國主義的需要，不斷地老戲新唱，時而合十望天，時而頓足捶胸，時而輕聲細語，時而痛哭流涕，儼然以悲天憫人的救世主自居。但是，隨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被揭露，西方基督教神學的反動本質也正在日益被人們認清。世界人民總是愛革命的，無論西方神學家們玩弄什麼樣的花招，也挽救不了帝國主義死亡的命運，他們自己也必將隨着帝國主義的死亡走向他們的“天地末日”。

① 見1963年8月29日普世聖公宗大會上約翰·勞倫斯演講：《教會在文化邊疆上的使命》。

② 1842年9月30日致魯格的信。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頁。



# 红旗

HONGQI



23-24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

## 目 录

### 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 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

### 全世界人民同声讨伐美帝国主义

侵略刚果(利)的滔天罪行 .....本刊评论员 (3)

### 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 闻师润 (6)

工农兵谈辩证法 { 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 搞好管理教育 .....王玉文 (18)

一分为二是促进生产革命的思想武器 .....王升堂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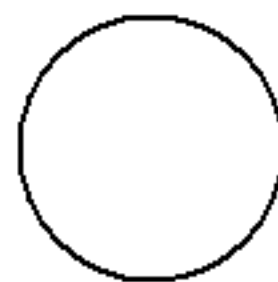
“合二而一”就是不要革命.....张子成 (27)

从农村阶级斗争看“合二而一”论的反动性.....黄学诗 (28)

### 战略上以一当十, 战术上以十当一 .....李作鹏 (31)

约翰逊政府是个什么货色 .....郭济洲 (48)

☆ 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



工农兵谈辩证法



# 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 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新华社十一月二十八日讯】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美国一直企图控制刚果。它利用联合国军在刚果做尽了坏事。它谋杀了刚果的民族英雄卢蒙巴，颠覆了刚果的合法政府。它把傀儡冲伯强加在刚果人民头上，并且派遣雇佣军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它又同比利时、英国结成一伙，对刚果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美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控制刚果，而且要把整个非洲，特别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重新投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罗网。美国的侵略，遭到了刚



果人民的英勇抵抗，激起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义愤。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侵略南越，干涉老挝，威胁柬埔寨，叫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它力图扼杀古巴革命。它要使西德和日本成为美国的两个重要核基地。它伙同英国一道制造所谓马来西亚，威胁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它占领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它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它到处横行霸道。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支持你们。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支持你们。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的斗争证明了这一点。越南人民的斗争正在证明这一点。刚果人民的斗争也必将证明这一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长期斗争，刚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 全世界人民同声讨伐美帝国主义 侵略刚果(利)的滔天罪行

本刊评论员

汹涌澎湃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怒潮,正席卷着全世界。

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帝国主义伙同比、英殖民主义者,悍然对刚果(利)发动了最野蛮的武装进攻,疯狂地对刚果(利)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

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世界人民极大的愤怒。他们一致指出,美帝国主义对斯坦利维尔的猖狂进攻,不仅是对刚果(利)的侵略,也是对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人民,首先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的罪行,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亚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也都一致怒斥美、比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和评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比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从刚果河畔到扬子江边,从亚得里亚海到马埃斯特腊山,到处都响彻了“打倒美帝国主义”、“要刚果(利),不要美国佬”、“要非洲,不要美国佬”的怒吼。

美帝国主义陷入全世界人民同声讨伐的重重包围之中。

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毛泽东同志的声明,阐明了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它受到了刚果(利)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声明,是对刚果(利)人民最强有力的支持,它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刚果（利）全国解放委员会就此发表公报说：“毛泽东主席的声明，使我国人民在他们自己历史的这一严峻时刻坚定了信心，它表达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对勾结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极端蔑视一国主权而在刚果犯下的强盗罪行的深刻愤慨。”世界舆论还一致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声明，“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狂妄贪欲和它逃避不了的必然失败的命运”，它“英明地把刚果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同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日本以及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同志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控制刚果，而且要把整个非洲，特别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重新投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罗网。”

尽人皆知，美帝国主义一直企图鲸吞刚果（利），作为它进一步控制和奴役非洲的基地。从四年前刚果（利）人民宣布独立的那一天起，美帝国主义就在所谓“维持秩序”的借口下，把它的魔爪伸向非洲的这块心脏地带。它利用“联合国军”谋杀了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颠覆了刚果（利）的合法政府，镇压了刚果（利）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并且把它一手扶植的阿杜拉傀儡政权强加于刚果（利）人民。为了独吞刚果（利），美帝国主义还不惜同比、英等老殖民主义者火并，排挤它们在刚果（利）的势力。当英勇的刚果（利）人民重新拿起武器展开斗争以后，美帝国主义在形势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又同比、英等老殖民主义者勾结，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面起用老殖民主义的走狗冲伯，施展所谓“全国和解”的骗术，妄图瓦解人民武装斗争，并使冲伯获得喘息机会，进行军事进攻的部署；一面加紧拼凑雇佣军，派出伞兵、飞机和坦克到刚果（利），公然把刚果（利）变成“特种战争”的另一个试验场。

但是，所有这一切阴谋全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图穷匕首见。美帝国主义终于拉下伪善的面纱，现出它的原形，从后台走出前台，公开挥起屠刀，大规模地直接进行军事侵略。这一事实说明，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罪恶目的，已经疯狂、蛮横到不顾一切的程度。它根本不把刚果（利）人民、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对它想霸占的任何地方发动进攻。今天它可以这样侵略刚果（利），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侵略别的国家。正如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所说的，“今天整个刚果已成了加丹加，成了非洲的加丹加，它威胁着坦桑尼亚、威胁着刚果（布）、威胁着赞比亚、威胁着乌干达、威胁着安哥拉，它威胁着一切有效的政权。”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严重警惕。



美帝国主义总以为仗恃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可以在全世界横行霸道，把世界人民置于它的奴役之下。它完全无视别国的主权，到处干涉，到处扩张，到处掠夺。但是，同它的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它越是这样做，就越使它同世界人民的矛盾扩大化、尖锐化，就越使世界人民认清它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也就更加激发起世界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斗志，积极动员起来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刚果（利）的武装侵略，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声讨伐，又一次证明了，而且今后还将会继续证明，美帝国主义每做一件坏事，就是向坟墓前进一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正确指出：“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的侵略范围越是扩大，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就越多；它的挑衅活动越是疯狂，抓在人民手里的绞索也就越被拉紧。美国侵略者被全世界人民判处绞刑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临近了。

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张牙舞爪、杀人放火的美国强盗，而是英勇不屈的战斗的刚果（利）人民。尽管美帝国主义可以强占刚果（利）的一些地方，残暴地屠杀刚果（利）的人民，但是，它永远也不能使刚果（利）人民放下手中的武器。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被迫把比利时伞兵撤出刚果（利），同时大肆宣传所谓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这显然是企图麻痹刚果（利）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意志，企图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实际上，它仍然在指挥着冲伯伪军和白人雇佣军继续屠杀刚果（利）人民，加紧策划新的武装干涉，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某些非洲国家拉下水去，实现它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恶毒阴谋。但是，已经觉醒了的刚果（利）人民和非洲人民，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罪恶计划。刚果（利）的英雄儿女们仍在顽强地战斗，狠狠地打击着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军和白人雇佣军。不论他们的斗争还将经历多长的时间，也不论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敢于斗争的刚果（利）人民和非洲人民。

刚果（利）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获得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刚果（利）人民的斗争也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坚决站在刚果（利）人民一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刚果（利）人民的斗争。

三年以前，不朽的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在他被杀害前留下的遗书中，曾经预言：“我从来一刻也不怀疑，我的同伴们和我始终为之奉献我们生命的事业终将获得胜利。……刚果人民不会放弃斗争，直到我们国家里不再有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雇佣军为止。”我们坚信，高举卢蒙巴旗帜的刚果（利）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从刚果（利）赶出去，取得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





# 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介绍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

## 闻 师 润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胜利进行，正在我国最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引起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在工农兵群众中，在基层干部中，涌现出大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以极大的毅力和决心，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学习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在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他们三人是最近几年来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的代表。

廖初江是沈阳部队的一个连队指导员，丰福生是空军部队的一个炊事班长，黄祖示是广州部队一个防化学连的班长。由于他们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思想上进步很快，工作上也取得好的成绩。廖初江当战士的时候是个好战士，当了干部，也是一个好干部。丰福生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年年都被评上“五好”，他所在的食堂也年年被评为五好食堂。黄祖示是五好战士标兵，他所领导的班也是四好班，班里的战士都是五好战士。

廖初江、丰福生和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

### 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毛泽东著作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取得显著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中怀



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都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幼年时都在旧社会受过苦难。廖初江的父亲给地主扛过活，母亲给地主当奴仆。廖初江是在他母亲快要分娩的时候，被地主赶出来，出生在江边的茅棚里的。后来，他母亲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蒋匪军的毒打和侮辱，受尽折磨死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先后饿死和病死。丰福生十三岁就给别人放牛，十四岁被伪保长抓去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劳工，十五岁离乡背井到一个资本家开设的饭店里当徒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生活。黄祖示出身于贫农家庭，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一直到解放那年，还欠下地主算不清的高利贷。他的祖父逃荒在外，死在一家地主的大门口，大哥从小给地主扛活，累成了驼子，二哥三哥也饿病而死。解放前的冬天，黄祖示兄弟几人轮流着穿一条棉裤。他们都是在解放后才脱离了苦海，翻了身，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内心里充满了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无限热爱。

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爱毛泽东著作，有着深刻的阶级原因。工人阶级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下，生活极其困苦，自然要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而世界上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了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指出了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因此，工人阶级最容易领会和接受这个理论。我国广大的雇农、贫农和下中农，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几重压迫，他们在旧社会所处的地位，同工人阶级大致相同，他们所经受的苦难生活，使他们具有很大的革命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生活极其艰苦的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人民解放军士兵都来自劳动人民，他们都是穿起军服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革命队伍中，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更易接受革命理论。一般说来，他们在接触革命理论的时候，对革命理论的了解，往往要比某些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人透彻一些。

毛泽东思想引导我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它最彻底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最彻底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同时，毛泽东思想也是当代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毫不奇怪，工农兵群众一接触毛泽东思想，就被这种思想所吸引、所启发，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共鸣。

例如，丰福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关于地主阶级的论述以后，就能够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看穿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他说：“我们家乡的地主，农忙时雇工让我们拼命干，农闲时就不要我们了。也就是清明时上工，到十月一日下工，下工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当我们没有饭吃的时候，地主就乘青黄不接，借给我们高利贷。一斗



小麦，不到两个月，就得还他两斗。地主就是这样残酷压榨，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当穷苦农民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地主更是催租逼债，逼得我们把房屋土地低价卖给他，害得我们劳动人民一年比一年苦，无法生活，抬不起头米。在我们家乡流传着一句话：‘今年盼着明年好，到了明年还是没棉袄’。毛主席说大地主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我感到非常对，这和我看到的完全一样。”

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广大工人农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变，生活有了逐步的提高。他们“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更加增长了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他们迫切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工农兵群众对革命理论抱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容易领会革命理论。但是，工农兵群众也只有经过学习革命理论，才能使自己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不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人阶级要具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廖初江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九五七年夏天，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放出了“今不如昔”的毒箭。他回忆起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对右派分子十分气愤，上台去声讨右派分子。但是，由于当时他对革命理论懂得很少，除了“右派分子是狼心狗肺”等几句话以外，往下就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了。这时，廖初江才认识到：“一个革命战士光会打枪还不行，还要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到具有真正的革命觉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实践的和学习的过程。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学习革命理论的需要和热情，学习了革命理论，又推动实践向前发展。在反复的实践、反复的学习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不断加深。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都有着这种共同经历。

当他们初读毛泽东著作的时候，很快便认识到：毛主席是为劳动人民讲话的，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劳动人民的腰杆就硬起来了。毛主席呼唤劳动人民起来闹革命，起来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劳动人民要翻身，只有听毛主席的话。

当他们进一步联系革命斗争的实际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就逐步加深了。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去学习毛泽东著作，而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又加深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感情和立场。

廖初江说：“过去我经常想，在旧社会为什么穷的穷，富的富？地主为什么那样狠？日本



帝国主义为什么那样残暴？我读了毛主席著作，心里就像敞开了两扇门，亮堂起来了，明白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认识到“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全世界人民彻底解放的思想”。

黄祖示在四年多的时间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三十多篇文章，领会到四个基本观点：第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第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打不倒，做一个革命战士，就要紧握枪杆，练好杀敌本领，同敌人斗争到底。第三，革命要革到全人类都翻身解放，决不能半途而废。第四，要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同时，当他们联系革命斗争的实际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意义又有了新的进一步的理解。他们认识到：

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们说：“毛主席的书是劳动人民闹革命的书，是指导工人农民翻身求解放的书。”“什么阶级的人，就听什么阶级的话。我们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他们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哪个时候，哪个地方照毛主席的指示作了，革命发展就顺利，否则，革命就遭到失败，人民就遭受损失。”“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总是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革命者一定要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我做人的依据，生命的灵魂，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针，战斗的武器，革命的根本。一句话，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的经验证明，培养无产阶级感情，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只有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它和掌握它。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或者不想把革命坚持到底，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或者是用处不大的。

### 从毛泽东著作中找立场、观点、方法，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作为当代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在分析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中间，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获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要求革命，要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真理，把它作为武器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是我国工农兵群众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根本目的。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

廖初江等同志，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廖初江说：“从带着问题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感觉到：学来学去，用来用去，离不开一些根本观点。”“从实际出发，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有意识地提高到根本观点上来分析，既能解决现实问题，又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

廖初江的这些认识，在他五次学习《愚公移山》的收获中，得到了生动的说明。第一次，在当战士的时候，学习了愚公不屈不挠的移山精神，克服了上不了单、双杠，翻不过木马的困难。第二次，在当班长的时候，想到愚公移山的办法，是子孙世代用双手一锹一镐地挖，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也要一个一个地去具体解决，因此，在搞农业生产时，自己动手修造工具，解决种子困难。第三次，在当排长的时候，领导上布置在大风雪天举行实弹演习，要求取得优异成绩，合乎实战要求，不冻坏一个人。他认识到必须像愚公移山一样，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于是发动大家坚定信心，千方百计去战胜严寒，顺利地达到了领导上所提出的要求。第四次，在当副指导员的时候，全连要进行实弹射击第二练习，当时，连排干部大部外出，靠自己一个人领导有困难。他从文中要取得革命胜利光有先锋队的觉悟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这句话受到启发，解决了一个群众观点问题，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实弹射击取得优异成绩。第五次，面对着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反华浪潮，着重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分析国内外形势的观点，懂得了“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大大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并且认识到要正确地观察形势，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有书呆子和教条主义习气的人，不可能懂得一篇文章为什么能够在各种场合发挥这样大的作用。这不是说明别的，这是说明文章中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普遍有效性，这种观点是被毛泽东同志异常深刻而又生动地阐明了的。

由于人们的工作不同，接触和处理的问题不同，因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



作时，在内容上各人有其侧重点。但是，有一些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武器，对指导各种工作都适用，因而是人们应该着重地去学习和掌握的。例如，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关于政治和经济相比政治不能不占首位、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关于人的正确认识来自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观点，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观点，关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观点，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观点，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和劳动的观点，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等。

现在，我们来看看，廖初江等同志是怎样运用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

先说改造思想。

这些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是被压迫被剥削者。但是，他们在入伍以前，仍然带着许多小生产者的习气，接受过旧社会各种思想的影响。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可能会影响他们。因此，他们也需要改造思想。他们自己十分强调，必须把学习理论的过程同时看做是改造思想的过程。他们把改造思想称做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突破口”。

廖初江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入伍到一九五九年三月服役期满这段时间内，个人思想上曾有过三次比较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刚刚入伍以后。他在入伍前有个打算，希望能够当一名坦克兵，学会开坦克，服役期满回家以后好开拖拉机。想不到领导上分配他当了步兵，而另一个同他一起参军的同志却调去开汽车了。这样，他就认为“好事情都轮不到自己”，思想上起了疙瘩。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冬天。当时，领导上调他和其他几个同志去参加团里的班长集训队，回来以后，有的同志当了正副班长，他仍然回到班里当战士。同人家一比，心里大不高兴，认为“我不够条件，就别叫我去参加集训，叫我参加集训又不叫我当班长，这不是存心给我难看”。第三次发生在服役期满的时候。本来他想干满三年就回家，当时他家里也写信叫他回家成亲。但是，部队又需要留下一批服役期满的同志作骨干。他究竟是请求留在部队还是回家呢？这又成为一个思想问题了。

廖初江这三次思想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第一次，他学习了《纪念白求恩》，把自己同白





求恩作了比較：白求恩是外国人，自己是中国人；白求恩五十多岁了，自己才二十岁；白求恩为了帮助我们打日本帝国主义来中国，自己为了保卫祖国来服兵役；白求恩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至牺牲了生命，自己老是考虑个人得失。一比，就感到惭愧，感到自己真是太不对了。再讀了毛泽东同志所說的“我們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段話，就下定决心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他就安心当兵了。第二次，反复地看了《为人民服务》，想到：“自己究竟为什么当兵呢？究竟为什么工作呢？毛主席讲的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而自己呢？却是为了个人名利，想当班长，这多不应该！”同时，也認識到“当战士和当班长，都是为人民服务。該当什么，不該当什么，这是领导上的事”。这样，才解决了思想問題，主动向同志們作了检查。第三次，他再次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想到张思德同志为革命貢獻了生命，自己也應該为人民服务一辈子，于是，坚决申請超期服役，并說服了家庭。

丰福生、黄祖示运用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思想的收获，同廖初江大体相似。丰福生原来不安心做炊事工作，他学习了《紀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以后，認識到在我們国家，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人好不好，关键不在于干什么工作，而在于有沒有自私自利之心，思想好，在什么工作崗位上都可以为人民做出貢獻，思想不好，干什么工作也是干不好的，从而克服了炊事工作“上不得台子”、沒有前途的錯誤思想。黄祖示在入伍以后，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当防化学兵有困难，在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以后，認識到大地主階級和大买办階級的代表蔣匪帮，还盘据在台湾，天天在叫嚣“反攻大陆”，自己出身于貧农，革命就是自己的靠山，因此，一定要握紧枪杆，保卫住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让过去的苦日子再来，不应当在困难面前打退堂鼓。有了这种觉悟以后，他刻苦学习，又得到同志們的帮助，进步很快。

廖初江、丰福生和黄祖示的思想斗争，归根結底，都是在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他們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認識到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階級思想，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果不克服，就不能够做好革命工作，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他們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解决了自己的思想問題，实际上是用无产階級的思想去战胜了自己的非无产階級思想。他們在学习中，看到毛泽东同志所贊揚的事，要是他們做了，就感到高兴、愉快，毛泽东同志所批評的缺点，要是他們身上也有，就感到臉紅、心跳，下决心克服和改正。他們的思想觉悟的



提高，他們的进步，就是这样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后获得的。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观察自己，经常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地同先进作比较，找差距，千方百计地学先进、赶先进。廖初江说，一个人“即使是在比较稳定和顺利的时候，情绪很高和成绩明显的时候，如果用‘两分法’来分析自己，缺点总是有的，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们最好经常地同先进的比，一比就会找到差距，发现问题”。这就是永远前进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用这个观点不断地鞭策自己进步。

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怎样运用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了工作中的问题，改进了工作。

廖初江当指导员以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结合自己的理解，归纳出在连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几个要点。这就是：“一，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始终。因此思想工作也必须贯彻到一切工作的始终，做到每个人的心上。不要以为先进的不可能有思想问题，因而放松思想工作，一出问题又大惊小怪；不要以为后进的就没有优点，不去发挥他的积极的一面。二，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思想也不断变化，思想工作不能一劳永逸。三，充分运用活的材料，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地进行活生生的教育，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的，必须坚持。四，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互相影响着，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会、家庭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五，事物都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过程，因此要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上下功夫。无产阶级思想多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少了。对后进战士要注意发扬他的点滴优点，鼓励他的微小的进步，逐步提高。六，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廖初江把这些观点运用到工作中，成为一个很好的连队指导员。

丰福生也是这样。他从学习《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受到启发，运用其中的一些观点，分析了炊事工作同其他工作（生产、学习等）的矛盾，把自己所在的食堂办成了五好食堂。

廖初江等同志的学习方法，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析自己的工作，找寻工作中的



规律性，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工作中的种种矛盾。毛泽东同志揭去了哲学的神秘外衣，把它变成广大群众手中掌握的锐利武器。廖初江等同志的经验证明，我国工农群众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能够更快、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

学习毛泽东著作，又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工作态度。举一个例子来说，黄祖示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所说的“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的话以后，工作责任心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次，连队里到外地去执行生产任务的同志缺菜吃，黄祖示主动地克服了缺乏运输工具的困难，冒雨走了一天，把七百多斤菜送到生产基地，直到当夜十一点钟才回到营房。回来以后，已经很疲倦了，营房的同志劝他休息，他为了减轻别的同志的负担，又接着站完一班岗。到半夜一点多钟，又在大风雨中，按规定执行了检查营区的任务。

送菜、站岗、检查营区，这些工作的本身都很平常。黄祖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在这些日常工作中坚决听毛泽东同志的话，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拣重担子挑。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主要收获是什么呢？第一，掌握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在观察国内外形势时，就能够正确地判断形势，认清敌我，辨明是非，站稳立场。他们说：“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我能从伙房看见国家的大事和全世界的大事，站得高，看得远”；“学习了毛主席在革命各个时期观察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大好时代，就认清了形势，进一步体会到党的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第二，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立即迎刃而解。他们说：“我们在工作中碰到矛盾，就找毛主席著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事，工作方法就改进了，矛盾也就克服了。”

### 正确的学习方法，坚强的学习毅力

我国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为用而学，学了就用，把学和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带着什么问题学呢？就是带着自己思想中和工作中的问题学，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学，带着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问题学。



总的说来，就是带着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中的问题来学。

廖初江等同志根据自己的情况，又具体地运用了 this 学习方法，如廖初江的“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想问题，碰到问题想毛主席著作”，丰福生的“五多一结合”（多读、多想、多比、多用、多记，学用结合），黄祖示的“对照检查，边学边用，反复学用”。

带着问题学，就是使理论学习密切地联系当前的现实斗争。或者如廖初江所说的：“带着问题学，要干的事，就是要学的内容，学习的效果，就是工作的成绩。”例如，廖初江是这样来安排学习的：在两亿三查、控诉美蒋暴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经常性的形势政策教育中，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坚持四个第一、培养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进行军事训练、贯彻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中，学习有关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的思想；在干部调动、军衔级别调整、遇有家庭问题时，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以及支援公社的劳动中，学习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在进行表扬批评、解决战士具体问题时，学习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和作风。

事实证明，采用这种学习方法，就可以一扫理论学习中的沉闷空气和书生派头，可以使人们关心现实斗争，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发挥人们在革命中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学习方法，使工作和学习完全一致起来，解决了工作和学习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为什么要带着问题学？他们说：不带着问题学，就学不起来，也坚持不下去；就达不到学习的目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学不懂，用不上。一句话，方法不对，学习就一定搞不好。

带着问题学，而又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必须多读、多想、多用，反复学习，反复实践。

带着问题学，并不是不要认真读书。相反，要以认真读书为前提。有阅读能力的同志，还应当有计划地通读毛泽东著作。廖初江说，要真正做到带着问题学，就应当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并且要多读、多记，碰到问题就能想起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论述。如果学得少，记得少，有了问题就不知道找寻答案的线索在哪里。有些重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更要熟读牢记，刻在脑子里，做到“武器随身带，用时拿出来”。廖初江所说的到毛泽东著作中去找答案，就是去找立场、观点、方法。

有的人对带着问题学有误解，认为带着问题学就可以少读书了，就达不到完整的、系统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目的了。这个看法不对。廖初江认为：“围绕解决一个问题，集中学习



几篇文章，求得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毛主席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比较全面、深透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样虽然不是完整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对一个问题来讲，就学得比较完整和系统。”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学深了，钻透了，许多问题联系在一起，就能够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地学到毛泽东思想了。而要做到这一点，书读少了是不行的。

带着问题学，要解决问题，就要多想。廖初江的经验是把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同毛泽东著作中的观点联系起来想。他认为“要多读，多想，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想”，不仅联系当前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实际，学习党的历史。丰福生认为：“不想就和毛主席著作结合不起来，就和工作结合不起来，就和个人思想结合不起来”，因此“最重要的是带着问题去想，要善于联想，要反复想，还要敢想”；黄祖示的经验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就是既要分析所带的问题，又要分析书上的观点（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并且要把两者联系起来，用书上的观点来分析所带的问题，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多用，这是带着问题学的根本关键。廖初江说：“要解决问题，就要反复实践。学是为了用，学了就要用，不怕用不好，而要坚持用。用是学的目的，又是学的方法，也是检验学得好坏的标准。反复实践比反复学习更重要。要学一点，用一点，在用中学，对照检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再反复实践。”这段话说明了用的重要，也说明了怎样去用。

关于怎样做到学用结合，黄祖示的经验是：一，对照检查思想行动。他认为，对自己思想检查彻底，行动才会坚决。二，多想几个“我怎么办？”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结合自己的思想情况想一想，想得具体，就能做得周到。三，想到做到，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办事的时候，要跟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严格要求自己。四，反复地学，反复地用。

多读、多想、多用，是互相紧密结合的。在学的时候要多想、多用，在用的时候又要多读、多想，学了就用，用了又学。如此循环往复，就能够学得愈好，用得愈好，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心和毅力，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们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读了好几遍，有些文章读了几十遍，同时还写了不少学习心得。

是不是他们的学习条件比别人好呢？不是。相反，和许多同志相比，他们的学习条件不是好些而是差些。首先是他们的文化程度低。黄祖示的文化程度算是最高了，也只是高小毕业。廖初江在入伍时还不会写家信。他们在开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许多字都不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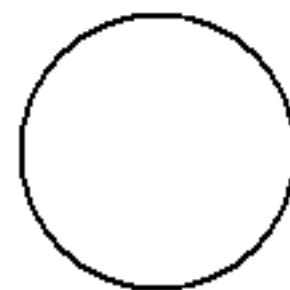


许多普通的名词也不懂。其次是他们学习的时间少。他们都在连队里工作，生活很紧张，只能从各种空隙中挤时间学习。但是，困难并没有把他们压倒。时间紧，他们就挤。他们牢记“整块时间固然可贵，寸阴片刻更应珍惜”的格言，那怕是几分钟也不放过，凑零成整，做到每天能学习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文化低，也没有难倒他们。他们勤读、苦钻、多问。连里的干部，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机关下连队的工作组的同志，都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还坚持写学习笔记，这样多读多写，不但学习了毛泽东著作，文化水平也提高了。

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巨大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呢？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自觉性。学习的自觉性来源于革命的自觉性。廖初江说：“当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担心不能坚持学习的时候，就想想在旧社会哪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想想革命前辈为了追求真理，在敌人监狱里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想想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写出了这么多光辉的著作，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想想全国全军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榜样；想想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就感到没有任何理由空度光阴，没有任何借口不坚持学习。要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就要活到老，学到老，使自己的一生，成为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生。想到这些，就有决心和毅力坚持学习了。”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做到了：文化低难不倒，工作多挤不倒，有了成绩夸不倒。

廖初江等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对于促进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化，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万岁！





# 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

## 搞好管理教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  
某部红九连班长

王玉文

### 吃了苦头，找到武器

去年，我在七班当班长，班里有个武建中同志，入伍前是个大学生。在工作中，我只看到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比如，在野外生产时，他不和同志们在同一个炕上睡，硬要支个铺单独睡。他说：“这是习惯。”班里同志对他很有意见，说他摆知识分子架子，他却说别人不了解他，不关心他。我对他也很不满意，半年多没表扬过他一次，批评他的次数却很多。有一次，部队搞夏锄生产，我把任务平均分给了个人，每人六垧。武建中从小就念书，没干过活，只完成了一半。连里批评七班没有完成任务。我想武建中锄得最少，连里批评了我，我回去也得抓一个。在班务会上我沉着脸说：“武建中，在文化上你是个大学生的，在生产上你还得老老实实当个小学生，把你的臭架子放一放吧！”他当场就和我吵了起来。第二天，他饭也没吃，提前一个小时上工去了。我很

恼火，心想你还给我赌气呀！到地里我又批评他一顿。我说：“武建中，昨天你没完成任务，批评你还不虚心接受，今天你又提前上工，跟谁请示啦？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结果他比第一天锄得更少。

团员马江看到班里天天完不成任务，就向我建议说：“班长，我看任务还是不要分到个人吧；把大家编成几个组，一个老同志带一个新同志，这样完成任务要好些。”我说：“合到一块他们依赖思想更大，就是得分开，非得好好锻炼锻炼他们不可。”马江同志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背地里说：“今后班长分我多少任务，我就干多少，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从此，他再也不提建议了。这样，班里的工作没有搞好，年终也没评上四好班，全班只有两人评上了五好战士。我想，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费了不少劲，连个四好班也没捞上，都是这些城市兵给我搞坏了的。四好总评时，指导员给我指出要改进领导方法，我还不服气。



总评后，我调到一排机枪班当班长。机枪班是个四好班。这使我不得不考虑：过去在七班为什么没有把工作搞好，现在又如何把机枪班搞好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我才认识到，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着矛盾，过去班里存在的问题，都是矛盾，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矛盾。班里有许多矛盾。我认为班长与战士就是一个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班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一个班建设的好坏，同班长的关系很大。过去七班工作没搞好，光怪战士是错误的，主要是自己的工作存在着缺点，需要改进。但是，到底怎样做才对呢？想了许多办法，效果都不大，思想很苦恼。正在这个时候，《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介绍毛主席一分为二思想的文章，我反复地学习了几次，进一步认识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正像《矛盾论》里所说的，每一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它的反面。因而我们对人对事都要一分为二，既看先进的一面，也看落后的一面，既看优点，也看缺点。可自己过去看问题，把人看死了，特别是对学生出身的同志，就只看到他们自由散漫缺乏劳动锻炼的缺点，没有看到他们好学上进的优点，批评多，表扬少，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提不起劲头来。找到了一分为二这个武器，我的心里才亮堂起来，有了信心。

## 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 搞好管理教育

### (一) 全面看问题，以表扬为主。

学了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我看问题的方法有了改进，懂得了全面地看战士，懂得了应该以表扬为主了。但是，初步的学习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弄不通。后来，又在用的当中反复学，才逐步做到这一点。

今年一月，连里掀起了练习投弹高潮，提出突破四十米的指标。班里的同志信心很足。经过了苦练，全班由平均三十四米上升到三十九米，眼看就要突破指标。正在这个时候，在后勤出差近三年的殷长春同志回到了连队。我在连部碰见他，他对我说：“在后勤种了三年菜，回到连队怕技术跟不上队。”一打听，他投弹只能投三十三米以内，我心里就叨咕开了。正巧指导员对我说：“殷长春到你们班里去吧！”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这四十米的指标要吹了，脱口说了一句：“我们班又来了个拖腿的。”对他的接待也很冷淡，扭过头去对他讲：“背上背包跟我走吧！”指导员一看我的表情不对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不仅有困难，困难还大着呢！”指导员要我好好想一想。回到班里，我又重读了有关一分为二的文章。用一分为二的思想一



对照，才发觉自己对殷长春同志又犯了片面性，只看到他缺点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优点的一面。认识提高了，思想包袱放下了。第二天，我帮助他练投弹，他不去，还说：“反正我是个拖腿的，练不练有什么用，我又快复员了，部队在大力培养接班人，我是个文盲，军事技术又差，能接什么班呢？”我一听他也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自己，对我还有点意见，就考虑从积极方面启发他。殷长春同志的家庭出身好，入伍后，服从组织需要，连续搞三年生产，毫无怨言。我就找他个别谈话，对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过去我没有用阶级兄弟感情来对待同志，看不起你，是不对的。”接着，我向他叙述了我家在旧社会受的苦。他没等我说完就抢着说：“班长别说了，天下穷人是一条苦根，我家过去也是祖辈给地主当长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就没有今天。现在自己怕训练跟不上，就不安心工作，有了点困难就不想克服，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们的认识一致了，训练劲头也就上来了。可是，练了两周，他的投弹成绩始终停留在三十三米。他又灰心了，说：“班长，帮我练射击吧，投弹我是上不去了，练好了射击一样可以消灭敌人。”我给他讲了手榴弹在近战中的作用，又请一班投弹能手刘银汉给他介绍了经验。同时，组织了全班测验。这

次，殷长春投了三十三点五米，上升了半米。段玉林投四十四米，上升了四米。这时，我考虑表扬谁呢？从数目字上看，应该表扬段玉林。但段玉林基础好，殷长春基础差，条件不同，不能单纯从数目字上看问题。殷长春上升半米就不简单了。在班务会上，我就表扬了殷长春，反复强调这半米是勤学苦练得来的。越表扬殷长春，他就越坐不住，马上说：“班长，你表扬错了，应该表扬段玉林。”段玉林接着说：“我看表扬殷长春不错，人家出了三年差，练的时间短，上升半米也是不容易的。”殷长春感动地说：“今后我一定要更加苦练，感谢同志们对我的鼓励。”以后，他由三十三米上升到了四十七米，终于提高了投弹的本领。

## (二) 在大力发扬战士优点的同时， 启发战士克服缺点。

在实践中，我认识到，在大力发扬战士优点的同时，也要重视启发他们认识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才能帮助他们大踏步地前进。例如刘国良同志，是今年二月份从三班调到我们班机枪班的。他想，我在三班是连续两年的特等射手，到机枪班就改用机枪了，怕争不上特等射手，就不愿意来。来机枪班以后，他也不安心，预习不认真，趴在地上画人玩。几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掌握射击要领。用什么办法教育他呢？我想起毛主席说



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sup>①</sup>刘国良预习不认真，固然是个缺点，但不能看不起他，而是要耐心帮助他一道前进。他爱护武器好，自从到班后，连里几次检查，他的武器都合格。我就表扬了他。并问大家：“刘国良同志为什么能这样爱护武器呢？”大家回答：武器是我们的第二条生命，只有爱护好武器，战场上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刘国良抢着说：“我看你们说的也对也不对，光武器爱护好，没有过硬的技术也消灭不了敌人。可我在预习中不好好学习，战场上是要吃亏的。”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后，我又指出：“刘国良同志说得对。没有过硬的技术，战斗中就会无代价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完不成战斗任务。”刘国良进一步认识到练好技术的重要性以后，他越练越感到一个战士的责任重大，很快地克服了两手使力不均、击发过猛的毛病，今年争上了特等射手。

### （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 高标准，严要求。

处理问题，既要看到这一面，又要看到那一面，想想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缺点。殷长春在后勤出差，把皮手套丢了，手上冻伤了几处，正好班里拾到一副新手套，问谁谁也没有丢。大家都说：“给殷长

春戴吧。”当时，我想也对，要不他把手冻坏了，会影响训练，影响出勤率。可又一想，不行，看起来这是关心同志，其实是损害了同志。因为拾到了东西应当交公，不能自己留用，这是个作风问题，不能用不好的作风去影响同志。我向大家讲清了道理，把那副新手套上交了，又把我的手套给了殷长春。殷长春感动地说：“班长不仅关心我的身体，更关心我政治上的进步。如果我戴上那副新手套，只是手暖心不暖，戴上班长的这副旧手套，才真是手暖心更暖。”

有些事，从这方面看是个优点，但从另一角度衡量可能是一个缺点。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努力去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联系。我们班的刘国良每次听起床号一响，总是第一个下床站队，经常受到表扬。可是，有一次全班都下床了，他还在床上躺着，殷长春叫他一声，他还没醒。段玉林说：“是班长把他表扬得骄傲了，应该狠狠地批评他一頓。”殷长春说：“偶尔一次算了吧。”两句话使我想到了，偶尔一次虽然不要狠狠批评，但也决不可以不教育地加以原谅，那样，偶尔将会变成经常。经过了解，原来是刘国良前一晚摘抄毛主席著作索引，写到半夜。我又想，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84—485页。



他积极学习是个好事,但不遵守制度,使第二天的工作受到影响,又是个缺点。我便表扬了刘国良刻苦学习的精神,又指出了他不遵守制度的危害性。接着,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一段话,“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sup>①</sup>教育大家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刘国良也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批评。

#### (四) 人人学习一分为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过去,我认为班长学好了一分为二,懂得全面看问题就行了。后来,学习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看到毛主席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sup>②</sup>我才认识到,光自己学好还不行,还要帮助全班同志学好用好。当时,我们班里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看自己优点多,看别人的缺点多,看到自己有点进步就认为差不多了。殷长春投弹由三十三米上升到三十七米的时候,练的劲头松了下来。他认为三班老战士潘传茂比自己入伍早半年,参加训练时间比自己长,投弹还只达到二十八米,觉得自己差不多了。我抓住这个苗头,组织大家学习报纸上的介绍毛主席一分为二思想的一篇文章,使大家认识到,事物发展是无止境的,原来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解决了,在更高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又展开了新的斗争。殷长春说:“我只和过去

比,和差的同志比,不求上进。今后一定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的同志看齐,在工作上向高标准的同志看齐。”以后,练投弹的劲头就更大了。

新同志伍永良在同志们热情的帮助下,投弹由原来三十四米上升到四十三米的时候,我班有的同志反映说:“伍永良投弹是上来了,但平时工作不主动,两星期(野营期间)担了一担水。”有人还讽刺地说:“连他自己的刷牙水都不够用。”我翻开平时工作登记表一看,他虽然担水少,可打饭多,只一星期就去伙房打了十六次饭。同志们只看到他担水少的一面,忽视了他的另一面。我又组织全班学习报刊上登载的关于学习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的文章。学习后,大家一致认为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对别人也要一分为二,对自己要多看短处和缺点,对别人要多看长处和优点。接着,给伍永良摆了七条优点,其中一条就是平时工作主动,打饭多。这样,他自己高兴,别人也服气了。以后,同志们不管打饭、担水都更加主动。伍永良看老乡水缸满了,就帮左右邻居也把水缸挑满。

#### 六点具体做法

通过学习和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只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眼界就开

<sup>①</sup>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11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7页。



關，工作就会胜利；用一点論的方法看問題，就是非不分，工作就必然要失敗。怎样运用一分为二方法进行管理教育，我的具体做法是：

**(一) 战士受一次表揚，帮助他找一次薄弱环节。**

新同志伍永良实弹射击第二练习打了优秀，受到連里表揚。大家也贊揚他技术过得硬，說他第三练习再打优秀准沒問題。他自己也說：“射击比投手榴弹省力气，不用怎么苦练，也可以打优秀。”我抓住了这个苗头，組織大家学习毛主席《論联合政府》中一段話：“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点一面，誰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sup>①</sup>我想：虽然伍永良这次取得优秀成績，但技术上还存在瞄准時間过长等不少問題；而且第三练习不同于第二练习，距离远，又有時間限制，如果不帮助他糾正这个缺点，到打靶那天，就有射击不出去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缺点不克服，在戰場上就会让敌人跑掉。以后，我就帮助伍永良练习快速占領陣地、快速装弹盒、快速瞄准、快速击发的动作。第三练习伍永良又三个目标全部命中，获得优秀成績。

**(二) 战士受一次批評，自己找一找責任。**

有一次，殷长春和新同志伍永良同班站哨，沒有把口令传下去，受到連里批評，我便找連长作了檢討。虽然是班里同志的問

題，但这是班长平时对同志們的教育不够。回来又領導大家学习內务条令，熟記哨兵職責。以后，再也沒有失传口令的現象了。

**(三) 班里受一次表揚，找一次缺点。**

野营初期，我們班內务卫生搞得較好。連里組織检查卫生，我們班得了全連第一名。我們便找了缺点，重修了廁所，第二次检查又得了第一名。連里組織正副班长到我們班进行了参观。越是受表揚，越要找缺点。第三次检查又得了第一名。

**(四) 班里受一次批評，敲一次干劲。**

有一次，連里夜間紧急集合，到排集合場时，我們班比其他三个班拖长了几分钟。排长批評了我們班。回来我就开班务会，会上沒有批評同志們，我自己作了檢討。然后，又向大家讲了遵守時間的重要性，并領全班同志到二班学习快速打背包的經驗。同志們克服了麻痹思想，又学了先进經驗，以后，集合仅用六分钟就到集合場了。

**(五) 别的班受到表揚，自己找一次差距。**

野营初期，連里表揚八班在分散条件下坚持毛主席著作学习好。有人說：“机枪班卫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1117頁。





生得了第一，学习可输了。”我想，干工作，落后了，只要肯接受教训，奋起直追，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就对照八班的经验找了我们的差距，也把学习开展起来了。我们决心要赶上八班，超过八班。全班除自己学习外，还帮助驻地公社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八班又来我班取经，也把社员学习带了起来。八班又激发了我们的干劲，我们就又学习兄弟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使天天读、天天用的活动更加活跃。

(六) 别的班受到批评，自己接受一次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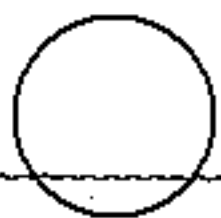
野营训练中，炮班搭床，砍了公社里一

棵小树，受到连长的批评。我们班有的同志说：“这里是一片钻进去走不出来的树海，砍一棵小树算什么。”我紧抓住这个思想，对全班作了教育。指出“算什么”和“不在乎”的思想是不对的。再次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大家懂得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要爱护群众一草一木，增强了同志们的纪律观念。

以上是我们班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改进管理教育的一点情况。我们还学得很不够，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原载 1964 年 8 月 21 日

《解放军报》)



## 一分为二是促进生产革命的思想武器

驳“合二而一”谬论

河北省保定市  
农业机械厂工人 王升堂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同志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进行了批判。不少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写了文章，我们看了觉得很高兴。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群众，当看到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歪曲

毛泽东思想时，挺身而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是个普通工人。解放前，我是贫农，给地主扛过活，我恨地主，地主也恨我，我们一天也没有“合二而一”过。这且不用说。解



放后，我当了工人。在工厂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里当然没有贫农与地主那样的对立关系。但是，能不能说工厂里的生产就是“合二而一”了呢？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呢？当然不能。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还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sup>①</sup>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一个工厂、一个车间都不例外。在一个工厂中，不仅有人和机器的矛盾，也有人和人的矛盾。有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一车间与那一车间的矛盾，同一车间内工种与工种之间、工序与工序之间的矛盾；还有生活和生产的矛盾，生产和安全的矛盾，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增加生产与降低成本的矛盾，产品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贯穿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甚至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一个工厂的生产，就是通过这些“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不断发展、前进的。这就是说，一个工厂不仅是一分为二地存在着，也是在一分为二地发展着，绝不是什么“合二而一”的。

“事实胜于雄辩”。杨献珍同志不是也讲客观事物的本性吗，那就看一看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吧。别的不说，就说我们铸造车间大炉子组。今年三月份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后，领导向我们提出了炭铁比为一比九的

新指标，这就是说一公斤炭要化出九公斤铁来。这个指标，既包括增加产量的要求，又包括降低成本的要求。当时，我们炉子的炭铁比是一比六左右，离领导的要求差得很远。炉子是个“老掉牙”的旧炉子。从工人来看，由过去的十三人，减少为六人，其中有四名老技术工人支援了其他单位。这个指标一公布，多数工人是欢迎的，他们认为，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向新的指标努力。可是，也有人认为工人少、炉子老，达不到。怎么办？按照杨献珍同志的“理论”，那就是说，领导提的要求，与设备情况、技术情况“不符合”，主观没有正确反映客观，只有提出一比六的指标才对。这样一来，就“合二而一”了，自然就没有上面这些新的矛盾了。可是，这正是少慢差费的主张，是不前进、不发展、不革命的主张。按照这种主意办，正是和多快好省对立的，因此，在实际上并没有“合二而一”，而恰恰是一分为二。我们没有那样办。因为多快好省是我们多数工人的要求。我们只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 and 解决这个矛盾。

毛主席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sup>②</sup>新指标不仅与设备情况、技术情

<sup>①②</sup>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1、788页。



况有矛盾，而且与工人的認識也有矛盾。誰是主要的呢？我們认为，設備和技术都是死东西，人是活的，人的問題解决了，別的就好办了。因此，人的思想認識的矛盾是主要的。当时，工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坚持多快好省的先进思想，对新指标欢迎、接受；另一种是只看到不利条件，不敢爭上游，不敢大胆革新的保守思想，对新指标怀疑、拒絕。这两种思想是对立的，它們之間自然也不能“合二而一”。对于这种思想矛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斗争，克服落后的、錯誤的思想，轉化为先进的、正确的思想。对有落后思想的人，我們采取了启发、帮助、提高觉悟的办法，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文章，特别是学习了《愚公移山》，振作起了克服困難的精神，批判了不敢斗争、不敢革新的思想，这样，就达到了認識的一致。在此基础上，我們又解决設備、技术方面的矛盾。对于炉子，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方法，既看到它老、旧的方面，又看到它存在着潜力的方面。原来的炉子，炉身短，熔化时許多“火”白白跑掉了，我們就把炉身加高了二百多公分。这样，就使温度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可以多加料。为了保证熔化中有足够的氧，又增加了四个风眼，通过这些改进，炭铁比不仅达到了领导的要求，而且还超过了，从五月份以来，一直保持着一比十的纪录。

这个矛盾解决了，事情还是一分为二的，炭铁比上去了，新問題又出现了。改进后的炉子适应了新的熔化要求，但是，上料

口抬高了，又出现了上料、加料劳动强度大，加料供不上熔化的矛盾。这个新矛盾，我們通过操作上的改进和設備上的改进才解决了。自然，目前的統一，也是暫时的、相对的，因为矛盾今天有、明天有、一万年以后还有，因此，一分为二的方法今天需要、明天需要、一万年以后也仍然需要。

上面这些事情，是日常生活和生产中遇到的千千万万矛盾中的一些个别矛盾。但是，仅仅这些就足以证明“合二而一”的荒謬。楊献珍同志說什么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呀，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呀，人为地把它們分开是违反事物本性呀，学习辯证法就是学把对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呀，是找它們的“共同点”呀，“求同存异”呀，等等，一句話，就是要掩盖矛盾，否认斗争，反对革命。試想，如果按照他的主意办，哪有現在的一比十？然而一比十說明的还不只是炭铁比，还說明了大胆革新、力爭上游的精神发揚以后所产生的物质力量。因此，把“合二而一”用到生产上，必然停止不前；把“合二而一”用到建設上，必然是少慢差費；把“合二而一”用到阶级斗争上，必然是阶级調和；把“合二而一”用到社会革命上，必然是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我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需要的是革命的思想武器——一分为二。“合二而一”还是去你的吧！

（原載 1964 年 11 月 28 日

《河北日报》）



# “合二而一”就是不要革命

大庆油田 张子成

目前，全国各地报刊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論战。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的一分为二的一边，反对反动的“合二而一”的謬論。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辯证法，是促进思想革命化的銳利武器。我深深地体会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就能不断发揚成績，克服缺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往而不胜。在大庆油田建設初期，条件差，困难多，到底打上去，还是退下来；到底坚持下去，还是被困难吓倒躺下来？二者絕不能“合二而一”。不是打上去，就是退下来，二者必居其一，这中間是没有調和的余地的。这时，我们就认真学习《矛盾論》和《实践論》，充分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揚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向自然展开了斗争。缺少房子自己盖，缺少工具自己造，車輛不足就人拉肩扛，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創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会战的胜利。这就是通过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的结果。如果按照楊献珍同志“合二而一”的謬論去办，那就是使矛盾調和，向

困难屈服，不去斗争，放弃总路綫，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們：“我們必須学会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sup>①</sup>这就是說，任何时候我們都要对自己的工作一分为二，愈是工作顺利和成績显著的时候，愈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薄弱环节。在工作中，每当我們取得胜利和成績的时候，每当我們的工作有缺点和錯誤的时候，我們就用一分为二的武器去观察和分析問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形成制度。这样，就使我們能永远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发揚优点，克服缺点，不断前进。例如，今年春天，工程一大队三中队三小队，通过一口样板井的施工，找出了許多毛病，深入开展了比学赶帮活动，苦练基本功，很快地就打出了新水平，使质量全优。事实证明：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证法去指导工作，不断揭露矛盾，和困难作斗争，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如果按照楊献珍同志“合二而一”的謬論行事，那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4 頁。



必然在胜利的时候，看不到缺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困难面前，看不到光明和前途，悲观失望，畏缩不前。因此，“合二而一”论，其实质就是否认事物的自身矛盾，否认对立统一规律，叫我们放弃斗争。可是，实践证明，没有斗争，革命就不能胜利，我们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就不能得到彻

底解放。

所以，坚持不坚持一分为二，反对不反对“合二而一”，其本质就是要不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总路线，要不要革命。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绝不能含糊，一定要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一分为二，粉碎“合二而一”论。

## 从农村阶级斗争

### 看“合二而一”论的反动性

安徽省桐城县南演人民公社 黄学诗

最近一个时候，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他提出了“合二而一”论，同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大唱对台戏。因此，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搞农村工作的干部，也应该关心这场论战，从这场论战中受到教育。

杨献珍同志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严重的歪曲。他说，“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我们说的求同存异，或者双方找出一个共同点”。如果把杨献珍同志的这种哲学观点，运用来处理农村的阶级关系，就必

然导致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革命斗争。

解放以前，农民与地主之间，毫无疑问是“矛盾的双方”。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来看，两者之间该是会有“共同要求”的，是用不着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是可以永远“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地主与农民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要求。那时，地主的“要求”是愈来愈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愈来愈巩固对农民的统一，好让自己永远过“朱门酒肉臭”的糜烂生活；而农民的要求却是摆脱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摆脱地主的残酷剥削，使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可见，互相对立着的两个阶级之间，它们的要求是针锋相对的，在最根本的利益上



是无论如何也“共同”不起来的。

那末，农民与地主之间是不是只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而没有斗争、没有转化的呢？也不。地主与农民，的确是有“联系”的，但是，在旧社会里，这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联系”，其实质是：地主占有土地，农民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向地主交纳租子，用血汗养活地主。这种“联系”，不是不可“分离”的，而是在经过反复的斗争之后，一定要发生转化，发生破裂的。农民忍受不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就一定要起来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来，斗争的结果，农民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原来的那种“联系”不就“分离”了吗？

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同全国革命人民一道，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成了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地主却由统治阶级变成被统治的阶级。这不就是地主与农民原先联系的“分离”的最好证明吗？怎么能说矛盾的两个侧面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呢？如果两者真的是“不可分离”的，那末，岂不是地主永远是地主，永远爬在农民头上吃剥削饭，作威作福？岂不是佃农、雇农永远当佃农、雇农，永远给地主当牛作马，万世不得翻身吗？所以，说矛盾的双方不可分离，而不讲双方的斗争和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地主阶级所需要的东西，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却实在不需要它！

不要说在过去，就是在农村已经公社化了的今天，地主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合二而一”的呢？也不是。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分子的确是无地出租了，不可能再靠剥削农民的血汗来生活，而要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了。有的人容易为这种现象所迷惑，错误地认为地主与农民已经是一个样子，区分不出也没有必要区分了，反正都凭劳动吃饭。其实，有的地主，表面看来的是像农民了，可是脑子里还在做复辟梦呢。他们梦寐以求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恢复失去的封建统治，好重新爬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从农村阶级斗争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当前，农民与封建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不可调和的。

我们公社有一个地主，表面看来，他也参加劳动了，穿的也不比人家强，装成一副可怜相，可是，骨子里还是满头脑的反动思想。一九六二年，当报纸上揭露了蒋介石匪帮叫嚣要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消息时，他顿时得意忘形起来，公开谩骂一位贫农、生产队长汪谋泽说：“小贼，你放清醒点！”并向汪谋泽追逼土改时已被取缔了的高利贷。如果按照“合二而一”的“理论”同地主分子“和平共处”，不向他展开激烈的斗争，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让地主分子兴风作浪，让阶级敌人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那样下去，人民还能坐得稳天下吗？不能。好在觉悟了的农民群众的头脑里，没有半点“合二而一”的思想，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及时





地揭发了地主分子的阴谋活动，在大会、小会上向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后，又把他严格地监督起来，只准他老老实实生产，不准他乱说乱动。这样，才把地主分子的气焰压了下去。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不管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能通过“合二而一”，通过阶级调和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一分为二，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解决。

不但农民与地主之间，就是在农民内部，也不是“合二而一”，而是一分为二的。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毫无矛盾的，而是时时处处都充满着矛盾。农民内部也是如此。当然，农民内部的矛盾，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敌我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办法当然也就不同。但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并不意味着不要斗争。

当前，农民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不同态度上。在农民内部，广大的贫农、下中农坚持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以富裕中农中间的一部分人为代表的有一些农民，却往往还留恋小农经济，热心于个人发家致富，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哲学观点，农民内部的这种在两条道路问题上所存在的“异”，“存”起来就是了，何必开展斗争呢？但是，试想想，这样一来，农民内部那种为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的团结基础，岂不有瓦解的危险？农业

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怎么可能？这个问题，我们搞农村工作的人感受很深。

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公社的情况吧。在桃园生产大队梁庄生产队，有个富裕中农，去年几乎成年在外面做投机买卖，不干队里的集体活。他自己做投机买卖不算，还把一些觉悟不高的队干部和社员也拉下了水，使队里的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对待富裕中农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行为，我们怎么能够同他“合二而一”？像这样的在两条道路上存在的“异”，我们怎么能“存”起来不开展斗争呢？如果“合二而一”，如果让“异”存起来不开展斗争，农民内部的这种矛盾只会加深和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有动摇以至失去的危险。正因为认识到这种趋势的严重性，公社党委领导这个队的贫农、下中农，对这个富裕中农进行了批判，揭露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量事实，对他进行了教育帮助，他才承认了错误，表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他才重新好好地参加劳动。被他拉下水的干部和社员也回了头，队里的生产终于恢复了正常。可见，就是在农民内部，也不是只有“联系”没有斗争的；农民内部存在的“异”，是不能“存”起来的，必需把它揭露出来，通过斗争才能很好地解决。

从上面谈的这些可以看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都是一分为二的，都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杨献珍同志想用“合二而一”来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那是白费心机的。

（原载1964年11月13日《安徽日报》）



# 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論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李作鹏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指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指针。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战胜国内外敌人，解放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通过不断地摧毁反革命军队，不断地在一块块地区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验，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在开始建立的时候，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相比较，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经常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下。因此，能不能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能不能在战术上以十当一，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观点出发，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建军原则，解决了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引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军的传统战法。这种作战方法，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sup>①</sup>又说：“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

<sup>①</sup>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19页。



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sup>①</sup>

认真学习和研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对于深刻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全面地学习我军几十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正确地认识敌我形势，建立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毛泽东同志根据长时期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以及当代国际形势，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形成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然貌似强大，但是，它们代表的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阶级。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了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因此，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革命人民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它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反复指出：和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具有两重性。在它们最后被消灭以前，它们暂时还有力量，在军事上暂时还占有优势，它们还要吃人。在这点上说，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因此，在战术上，在具体斗争中，革命人民必须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只有把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才能夺取每一次具体斗争的胜利，最后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曾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sup>②</sup>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也可以说是战略上“以一当十”、

<sup>①</sup>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6页。

<sup>②</sup>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222页。



“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的高度概括。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战术上重视敌人在军事斗争中的集中表现，是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具体化。由于我们在军事斗争上充分重视敌人，充分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因此每次作战都强调作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和 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一切侥幸取胜的心理和轻敌冒进的作法，力争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毛泽东同志说：“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sup>①</sup> 每战集中二倍、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于敌的兵力以对付敌人，就是以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这样，我军就有胜利的充分把握。同时，我军又十分讲究指导战争的艺术，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错误和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种有利条件，实行各个击破。毛泽东同志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sup>②</sup>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同时又体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因为只有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具有“以一当十”的革命气概和战斗精神，才能在强大敌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复杂环境所迷惑，敢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实行这个作战方法，不断地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又进一步教育了人民和军队，使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又必然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和军队对敌斗争的信心，鼓舞他们为夺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有人认为，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既然战略上“以一当十”，那么战术上就不能“以十当一”，否则战术和战略就相互矛盾。这些人看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了解战略和战术的辩证关系。说战术服从于战略，是说一切战术必须有效地保证战略方针的实施和战略目的的实现。战略和战术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区别的。战术隶属于战略，服从战略目的，这是它们一致的方面；但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术学是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这又是它们区别的方面。如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的作战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两者看来是相反的，然而，没有后者，前者就不能实现。同样，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战术上“以十当一”两者看来是相反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76页。

②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页。



的，但后者恰恰是实现前者的必要手段。如果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具体作战中也强调“以一当十”，就必然会犯轻敌冒险的错误。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群众基础、地形、天候、打击对象等条件对我特别有利，或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作战任务，在战役战斗中也有以少胜多的场合。但是，作为作战指导思想来说，作为主要作战方法来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多胜少，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由此可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既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又表现了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它是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 二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转变敌强我弱形势， 加速最后胜利的最有效战法

革命的人民武装，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比较弱小，总是处在强大敌人不断的进攻和“围剿”之中。这是通常的敌我客观形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种形势是可以转变的。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和被动的现实事物。在战争过程中如何推进、加速力量对比的变化，如何使弱小的革命力量，在敌人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夺取主动，摆脱被动，达到制敌而不受制于敌的地位，从而战胜强大的敌人，其决定因素是靠主观的努力，即运用正确的战法，多打胜仗，少犯错误，并经过持久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不断地消灭敌人，不断地壮大自己，将我之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sup>①</sup>这一正确指导，最主要的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于改变进退、攻守、内线和外线的形势，使我军由弱变强，由劣势转为优势，起

<sup>①</sup>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经受了一切考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深刻地分析了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既有顺利条件又有困难条件的两个方面，即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一整套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解决了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这一最困难的课题。

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运用上述的战略战术，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間，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发展了红军武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集中了七个师约十万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围剿”江西中央红军，妄图一举将红军歼灭。当时我军只有四万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采取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四万人的全部力量突然攻击敌张辉瓒师，全部歼灭敌人。继而又追歼谭道源师一半。第一次“围剿”就胜利地被打破了。一九三一年五月，敌人又以二十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只有三万余人，比上次反“围剿”时还少。我军仍然实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先打王金钰等部十一个团。初战胜利后，接着打其余各路敌人。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仗，缴枪二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亲自出马，组织三十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分三路长驱直入，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而消灭之。我军在上次反“围剿”中，苦战之后，没有得到休整补充，兵力仍是三万人左右。针对敌我情况，我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千里转战，机动灵活地在敌人大包围圈内，利用敌人的空隙，穿插转移，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寻找战机，终于在兴国、宁都地区三战三胜，缴枪逾万。在敌人退却时，又消灭其一个师和一个旅。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第三次“围剿”又被打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敌军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我军集中兵力先打其西路，一举歼灭两个师，继而又消灭其中路的一个师，两役缴枪万余，这次“围剿”也基本上被打破了。只有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才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使红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特点和国内外的形势，说明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地预见到了三个战略阶段的发展过程，从而规定了持久战这个总方针，并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具体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在新的情况和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和不同的运用。

毛泽东同志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高到战略地位，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明确地提出了“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sup>①</sup>的方针，批判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运动游击战”的错误观点。其次，强调必须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进行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而“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sup>②</sup>第三，游击战争的兵力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sup>③</sup>，即所谓时而化零为整，时而化整为零，忽南忽北，又游又击。对于分散、集中和转移三者的关系，强调指出：“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箝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sup>④</sup>在情况和任务需要时，游击队和游击兵团还必须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神秘地转移其兵力。第四，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发展之后，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因此，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sup>⑤</sup>如何打破这种围攻？毛泽东同志指出：“应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sup>⑥</sup>

我军在八年抗战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广泛地开展了敌后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日寇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粉碎了敌人残酷的“合围”、“扫荡”、“蚕食”和“封锁”。在最艰苦的时期，敌人曾集中了

①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②③④⑤⑥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403、400、419、419—420页。



絕大部分兵力进攻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仅在华北就用了八十余万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軍主力部队和民兵、地方游击队严密結合，在内綫和外綫灵活作战，一方面以部分主力部队分散配合民兵、游击队牵制敌人，襲扰敌人，用地雷、土枪、土炮、手榴弹杀伤敌人；另一方面，大部分主力部队則轉到敌人“合围”圈外，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八年抗日战争，我軍总计消灭了日寇五十二万七千多人和伪軍一百一十八万多人，創造了十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近一亿人口的广大土地。我軍由几万人发展到九十多万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有四百三十万人，在抗战结束时接收了日本侵略軍一百万人的装备，美帝国主义又为它装备了一百零六个师，而且拥有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綫，其实力不能不說是相当雄厚。我軍当时的兵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并且被分割在十几块根据地里，軍隊装备差，沒有外援。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内战，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軍覆灭。为了粉碎蒋介石集团的进攻，毛泽东同志規定了“我軍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輔”的作战方針，并且指出“在蔣軍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軍必須特別強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sup>①</sup>以后，又在闡述十大軍事原則时，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作了具体說明。我軍貫徹执行了这一战胜敌人的根本战法，在四年的战争中，共歼敌八百余万，解放了全国大陆。

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反动派以一百六十多万軍隊向我实行全面进攻。我軍实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針，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誘敌深入，集中絕對优势兵力，选敌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經過八个月的战争，歼灭敵軍七十一万多人，敌人被迫停止了全面进攻，并改变战略方針，对我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軍在山东地区孟良崗等战役歼敌五万余人，在西北地区七次战斗中歼敌三万余人，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这样，前后經過一年的战争，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迫使敌人轉入了全面防御，我軍則由战略防御轉入战略进攻。一九四七年七月，首先由晋冀魯

<sup>①</sup>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頁。



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接着各野战军相继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构成了全面性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并从此将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我军不仅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而且在战争中发展到二百八十八万人。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略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国民党五个战略集团，分别陷在东北、华东、华北、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只好被动挨打，作垂死挣扎。

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洞察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在蒋介石企图收缩兵力，向南总撤退之前，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战机，组织和实施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在三大战役中，对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运用，有了更高的发挥，达到了更加完善的阶段。在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战术的分割围歼，即在战略上将敌人的战略集团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强大的战略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一百四十一天中，总共歼灭了敌人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华北全境和其他广大地区。我军主力前进到长江北岸，使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作战方法，不仅在我处于劣势，敌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将我之劣势转为优势，而且在我处于优势，敌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可以加速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 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 基本思想是歼灭战思想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基本思想，就是歼灭战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sup>①</sup>歼灭战，是我军历来作战的基本方针和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伟大战略战术思想的精华。它贯彻在中国革命战争所有的作战指导原则之中。打歼灭战，就是力求每战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

<sup>①</sup>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2页。



人，使敌人被歼一个连少一个连，被歼一个营少一个营，被歼一个团少一个团，被歼一个师少一个师，这样不仅使敌人消耗了人力物力，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即使得到补充，也是越战越弱。这种战法，对削弱敌人最能发生重大影响。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sup>①</sup>这是对歼灭战思想的精辟论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打歼灭战的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与各个歼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只有集中了优势兵力，才有可能实现各个歼灭敌人；同时，只有采取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才容易形成和保持兵力的优势。正确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解决了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又解决了打歼灭战的具体方法。

集中兵力是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sup>②</sup>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sup>③</sup>战略、战役和战斗上都应集中兵力，但集中的形式、程度则是不同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战役、战斗来实现的，在我强敌弱的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直接的形式来实现。但是，不论是敌强我弱或我强敌弱，都应当集中兵力作战。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集中了优势兵力，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实施歼灭战，并且能够速决。当实施进攻作战时，就能够迅速地突破敌人的防御，就能够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增援和反突击，就有足够的兵力进行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就能够进行连续作战，快速扩大战果。当进行防御作战时，就能够大量消耗、削弱进攻的敌人，就能够争取时间，并且可能由防御转入进攻。反之，如果没有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也不可能求得速战速决，而可能形成战役战斗相持不下的局面，可能打成击溃战或得不偿失的消耗战，甚至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各个歼敌是打歼灭战的重要作战原则，是我军在战略、战役、战斗中必须贯彻到底的一个作战原则。当兵力集中之后，是企图一口吞掉敌人，还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逐次消灭敌人？很明显，只有采用各个歼敌的方法，才能顺利地歼灭敌人。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优势之敌，只能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法，造成我局部的优势，将敌人逐个歼灭。就是对

①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217页。

② 《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6页。



绝对劣势之敌，仍须采用各个歼敌的方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彻底地歼灭敌人。如淮海战役，我军在总的兵力对比上虽然略少于敌军，但在局部战役中集中了优势兵力，采取了各个歼敌的方法，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再歼灭黄维兵团，最后围歼丘清泉、李弥兵团，因而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sup>①</sup>。这就是说，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运用各个歼敌的方法，又必须是从小口小口吃做起，集小胜为大胜，逐步发展为大口大口吃。这种从小到大、逐次歼敌的方法，要求在战役战斗上与敌进行多次决战。这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所以只能从一次歼敌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做起，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逐步发展为一次歼敌一个师、一个军，最后则发展为一次歼灭敌人一个到数个强大战役兵团，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又辩证地解决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保守或夺取城市的关系，即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sup>②</sup>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或为了使我军主力避免被迫作战而遭受敌人的打击，不但完全允许暂时地放弃某些地方，而且必须以地方换取敌人兵力的分散，使敌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越陷越深。这个暂时的不保守，正是为了永久的保守；暂时的放弃，正是为了永久的不放弃。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sup>③</sup>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年，我军为了集中兵力机动作战，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主动地放弃了延安、张家口、承德、沈阳、安东等一百零五座主要城市，给敌人背上了包袱，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我军则避开了敌人进攻的主力，将兵力转移至敌人侧翼和后方，寻找战机，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不仅收复了失掉的城市，而且还解放了新的城市。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6页。

②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06页。



当然，不以保守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放弃城市和地方，可以轻易地兵不血刃地就把根据地大片土地和城市，让给敌人占领。毛泽东同志说：“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sup>①</sup>。我军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在战略防御阶段，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坚决保守了必须保守的城市与地方，作为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出发阵地。在战略进攻阶段，又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城市和地方紧密结合起来，既达到了歼灭敌人的目的，又完成了保守或夺取城市、地方的任务。

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消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战略上实行消耗战，在战役战斗上则必须是歼灭战，并通过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的消耗战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sup>②</sup>因此，在一切有利的场合，都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坚持打开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亦可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在战役战斗上，歼灭战是主要的，但也有消耗战。这种消耗战是辅助歼灭战的，不是在战斗上“拚消耗”。如当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实行歼灭战时，在其他方向上为了阻击和牵制敌人，就有必要进行消耗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我军为了全歼锦州之敌，在塔山和黑山进行的阻击战，就是属于阻止敌人、消耗敌人的性质。这种阻击战，正是为了实现歼灭战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 四 如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对实现歼灭战速决战，争取全部胜利，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在实践中，怎样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一战法，真正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呢？

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sup>③</sup>集中兵力的道理容易理解，但是要做到不仅是主观上或计划上的集中，而是战场上真正的集中，并且贯彻始终，确不是易事。要做到这样，战争指导者必须具有清醒的战略头脑，能够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不为复杂情况

①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





所迷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兵力，正确地处理如下的主要问题。

第一，正确选择作战方向。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和次要作战方向，是集中兵力并在部署上形成拳头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主要作战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毛泽东同志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sup>①</sup>为什么主要的作战方向只应有一个呢？这是因为，虽然战争的情况极其复杂，作战任务很多，但应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先后缓急，考虑兵力的可能，集中力量于当前急需的而又与战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方向、战役打击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夺取主动和保持主动，形成并保持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如辽沈战役，先打锦州，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这就推迟了可以推迟的作战行动，把主要兵力使用于急需的战场上，造成优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我们强调主要作战方向只有一个，不是说作战方向只许有一个。在确定了主要作战方向之后，还必须有机地组织次要作战方向的行动，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有主要方向，而无次要方向的配合，就不可能分散、牵制敌人，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主要方向的作用，保证主要方向的作战胜利。但是，如果主次不分，就是军事上的平均主义。因此，在兵力部署上，既要突出主要，又要照顾次要，并应尽量注意节约次要方向上的兵力，以保证主要方向上的优势，使二者在歼灭敌人的目的下统一起来。处于主要方向的军队，必须集中兵力实施主要的突击，而处于次要方向的军队，同样要集中兵力于自己的主要方向上，才能顺利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这就是说主中有次，次中有主，不论主要方向、次要方向，都必须确实贯彻集中兵力与节省兵力的原则。

第二，集中兵力，应集中到什么程度才算优势？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确定，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死公式和比例。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sup>②</sup>。又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sup>③</sup>这就是说，集中兵力的程度，要以确有把握地把敌人歼灭为标准，即每战中必须在兵力上造成对敌人的优势，有足够的分割围歼敌军的兵力，有发展胜

①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221—222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



利追歼逃敌的兵力，和一定数量阻击援敌的兵力，而不是盲目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集中。恩格斯说：“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sup>①</sup>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不是一切都要集中。”<sup>②</sup>集中兵力的程度，根据全局性的战场与非全局性的战场，进攻与防御，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战役部署与战役突破口，初战与续战，强敌与弱敌，驻止之敌与运动之敌等等情况不同，根据具体对象、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寇作战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对伪军就低一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锐气正盛，这时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到国民党军队连遭歼灭，士气沮丧，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低一些。在平津战役中，天津攻坚战我总兵力对敌是二点三倍，而在主要突击方向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兵力就更高一些，达到五倍于敌。

掌握集中兵力的时机，是极为重要的。过早集中会暴露企图，过迟集中则可能失掉战机。这都对战局的发展不利，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作战，适时的、迅速而隐蔽的集中和完成任务之后迅速隐蔽的分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集中兵力，有赖于指挥员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作用。从战斗开始起，就要随着战况的进展，敌情、任务的变化，适时地转移兵力，调整部署，不断保持优势。在战役战斗过程中，又要随时注意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转化，适时地把兵力集中到已经转化了的新的主要方向上去，以期取得战役战斗的全胜。

第三，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还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运用各个歼敌的战法。如何造成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一方面要及时利用敌人暴露出来的弱点，出敌不意，乘敌之隙，突然攻击；另一方面要以我之行动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例如运用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等办法。

为了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必须正确地选择歼击目标。当我面对着几路或几部敌人时，应当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一路或一部，一战获胜，再及其他，不应当同时打敌人的几路或几部。而且应当先打敌人的弱小部分，后打敌人的强大部分，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同时，最好是打击敌人的弱点和要害。分散孤立之敌，即使是强敌，由于处在分散孤立的地位，也就变成了弱敌。我集中优势兵力打分散孤立之敌，容易形成以强击弱，歼灭敌人的把握最大，有利于达到逐次歼灭敌人的目的。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辽沈战役开

① 《左茨的陷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4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始的主要方向，为什么不选择长春、沈阳，而选在锦州？这是从我军力量情况和全歼东北敌军的战略要求着眼的。当时锦州之敌虽较长春之敌为强，但比沈阳之敌为弱，而且是东北敌军战略体系中的要害。我军攻占锦州，就可以斩断东北敌人退路，为全歼敌军创造有利条件。又如同时期的莱蕪战役，为了粉碎敌人以三十万大军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军以少数兵力箝制敌南线部队，而集中八个纵队（军）的优势兵力首先围歼较弱而突出孤立的敌北线部队，一举歼灭该敌七个整旅，因而大大地改善了山东战局。

第四，正确运用包围迂回和穿插分割战术，是实现各个歼敌的重要手段。运用这一战术，能把敌军的有机整体分割成若干部分，使其失去战役的或战术的联系，形成孤军作战，有利于我达成全歼速决的目的。包围迂回和穿插分割，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对孤立驻守之敌，可先包围，后攻击；对运动之敌，既可先断其退路，再行攻击，也可边攻击边包围；对据有绵亘阵地、无暴露翼侧之敌，可先突破再分割包围等等。对已经被我包围之敌实行攻击时，应集中我攻击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和绝大部分火力，形成一把锐利而有后劲的“尖刀”，实施主要突击，而以其余兵力布置成两面、三面或四面的包围，与主要突击部队密切协同，实施向心攻击。只要采用上述的攻击部署，并实施强大的连续突击，那么，对于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阵地，总是可以突破的。一旦突破，被我打垮的敌人，在我多面包围之下，也是难以逃脱的。

### 五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难于利用和对付我们的战略战术

“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虽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所熟知，也是许多军事典籍所反复论述与强调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并辩证地加以运用。只有毛泽东同志才完整地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并将它辩证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战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又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



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sup>①</sup>。这是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实行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战争中，有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积极支援前线，巩固后方，直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破坏交通运输，牵制、分散敌人兵力，扰乱、威胁敌人后方，使军队的主力部队能够更高度地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同时，由于有民兵和人民群众参加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担任向导等活动，又为我军适时地隐蔽地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地包围和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初平型关之战，我军在距敌人前进道路之侧三十里至六十里的地点，集结达一星期之久，由于群众积极配合，封锁消息，使敌特汉奸失其作用，因此，敌人完全没有发觉。我军则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及时掌握了敌情，正确地部署了战斗，以神速的行动，歼灭了敌人。

相反的，由于敌人进行的是反人民的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配合，所以是孤军作战；侵占了我们的地方，又处处受到人民的反对，必须处处派兵防守。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他们兵力的集中。即使在某一地区集中了兵力，因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了解情况，找不到目标，自己的行动又经常暴露，所以处处被动，难以完全实现其企图。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以二十三万多人的兵力，进攻我陕甘宁解放区，由于人民反对，所以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集中大露营。

我军是工农的武装，是人民的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我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威力。任何战略战术都是通过人去实施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能不能得到贯彻，能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军队的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军有党的坚强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广大指战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因此，在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时候，具有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集中时，行动迅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在进攻时，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敢于大胆迂回穿插，孤胆作战；在防御时，能够抗住强大敌军的连续攻击，坚守阵地，顽强战斗。部队之间能够主动协同，密切配合，为了整体利益，不怕牺牲自己。全体指战员能够发挥最大的智慧，创造出许多战胜敌人的方法。所有这一切，都

<sup>①</sup>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



充分地保证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得到最好的贯彻，发挥出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

敌人的军队是反人民的军队。士兵绝大多数是被强迫或被欺骗而来的。他们同反动统治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尽管反动统治阶级也想尽办法，对士兵进行欺骗宣传，实施反动教育，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不高，缺乏旺盛的战斗意志。这种军队害怕近战、夜战，害怕包围、伤亡。军队各个集团之间，各个派系之间，互不信赖，互相倾轧，不能主动协同。由于敌人存在着这些弱点，因此，他们主观上虽然企图运用集中兵力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但是，在具体实施中，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危急的时候，往往不能实现。

我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指导战争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正确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由于能够正确地估计主客观形势，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在运用这一战法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诸如：全局与局部，集中与分散，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歼灭敌人与保守城市、地方，以及进与退，攻与防等等关系。所以，我们在与强大敌人作战中，能够无往而不胜，达到既消灭敌人，又保存、壮大自己的目的。

敌人则是唯心主义者，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全面地分析客观形势，不能从实际出发。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主观主义地判断情况，轻敌冒进。他们看问题往往是片面的，不能正确处理军事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付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忽而提出携带重装，“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缓不宜急”的所谓“密集平推战术”，忽而又提出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只走山头，不走大路的所谓“钻隙战术”。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莫衷一是。同时，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因此，战略意图和具体行动总是要发生矛盾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蒋介石也曾给自己定了一条“集中机动使用兵力”的原则。可是他要想占的地方那么多，中原、苏北、承德、沈阳、安东他都要，目标这样分散，而手中的赌本很有限，侵占了一个城市，就要派兵防守，就背上了一个包袱，占的越多，背的越重，能机动的兵力就越来越少。所以他定的那条原则，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或暂时在某一地区集中了相当优势的兵力，得到了某些便宜，但在其他地方就破绽百出。这些矛盾他们是无法克服的。



总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是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只有人民军队才能有效地运用。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一战法，也不能有效地对付这一战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sup>①</sup>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上的具体化，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它是中国人民长期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结晶。它不仅是战役战斗的作战原则，而且也是战略的指导原则。它不仅适合于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战争，也适合我强敌弱条件下的战争。它是进攻的原则，作为作战指导思想，也适用于防御。它不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起了光辉的作用，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加强国防建设，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但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适用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事业，都有指导意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虽然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一切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一样，具有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共同特点，只有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这一战法对于一切革命战争，都具有普遍意义。当然，在运用这一作战方法时，和运用其他指导战争的方法一样，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按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按照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地域，灵活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克敌制胜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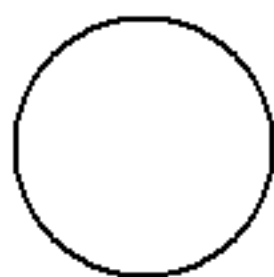
<sup>①</sup>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 約翰遜政府是个什么貨色

郭 济 洲



再过一个月，美国新任的約翰遜政府就要正式开张了。

美国統治阶级对于这一届政府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美国这届政府的前景，看来并不美妙，它的处境很狼狽，声誉很败坏，日子很不好过。

为了給这个在风雨飄搖中作垂死掙扎的新政府塑造一个“美好”的形象，加强它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的欺騙作用，美国垄断資本集团开动它們所有的宣传机器，竭力宣揚这个政府的头子約翰遜具有“现实”、“稳健”和“耐心”的“美德”，說他是一个什么“温和派”的代表。約翰遜自己也自欺欺人地一再宣称，他的政府是一个“对其他国家負責、对自己的公民負責的政府”，它将“不断为和平而努力”。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也忙不迭地为他們的主子帮腔，用各种好听的頌詞給約翰遜政府刷金。他們大肆吹捧約翰遜的当选“表达了世界輿論的意願”，說什么这是“和平政策的胜利”

和“理智的胜利”，它将“使人产生最好的希望”；并且一再表示，要同这个“和平政策的主角”“加强合作”。

但是，动听的謊言毕竟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

四年前，約翰遜作为肯尼迪政府的副总统进入白宮，并且在肯尼迪被刺身死以后登上总统的宝座。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特别是在他接替肯尼迪担任总统的一年当中，这个华盛顿的老牌政客就在充当美国垄断資本的忠实奴仆方面显示出他的“才能”。一年来，約翰遜政府为了执行美国垄断資本的意旨，不遺余力地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干下了无数的罪恶勾当，甚至做出了許多連它的前任也不敢做的坏事。

它蛮横地驅使美国侵略軍武装镇压巴拿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对手无寸铁的巴拿馬人民进行血腥屠杀，使数以百計的巴拿馬人民惨遭杀害。

它一再侵犯古巴的領海領空，对古巴进行軍事挑衅，并且指使反革命分子对古巴进



行轰炸。

它肆无忌惮地唆使巴西的亲美反动势力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推翻了奉行民族独立政策的合法政府。

它悍然派遣军事人员和军用飞机侵入刚果(利)进行直接军事干涉，把刚果(利)变成另一个“特种战争”的试验场。最近，它又明目张胆地伙同比、英老殖民主义者，并且指挥冲伯伪军和白人雇佣军，对刚果(利)人民发动了猖狂的武装进攻，残暴地屠杀刚果(利)人民，血腥镇压刚果(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它恶毒地在刚果(布)和坦桑尼亚策划颠覆活动，妄想用武力推翻正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共和国政府。

它任意践踏柬埔寨的国家主权，指使南越傀儡集团和泰国军队不断侵犯柬埔寨，杀害柬埔寨人民，并且收买柬埔寨的民族败类，图谋颠覆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

它粗暴地撕毁日内瓦协议，策动老挝右派推翻民族团结政府，破坏老挝三方面会谈，并且派出飞机连续轰炸老挝解放区，扩大老挝的战火。

它变本加厉地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加紧策划扩大对印度支那的侵略，甚至制造荒诞无稽的所谓北部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城市和港口滥施轰炸。十月中旬以来，它又一再派遣飞机和军舰袭击非军事区北部的许多地方，加紧

对越南北方的军事挑衅。

它完全不顾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硬把美国舰队开进印度洋，对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进行军事威胁。

它公然违抗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和平意愿，强行派遣核潜艇进驻日本，公开要把日本变为美国的核进攻基地。

它伙同英帝国主义，积极扶植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它阴险地利用英国殖民者在塞浦路斯制造的民族矛盾，积极插手干预塞浦路斯的内政，并且阴谋把美国军队开进塞浦路斯，进一步进行军事干涉。

它迫不及待地策划在西欧建立所谓多边核力量，企图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并进而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

这就是所谓“明智派”的约翰逊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

从约翰逊政府的这个罪恶记录中，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帝国主义强盗的一副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丝毫也找不到一点点“和平”的影子。把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强盗政府，说成是什么“和平政策的主角”，可以对它“产生最好的希望”，这不仅是对现实的莫大歪曲，而且是对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的最严重、最可耻的犯罪。

本来，在美国，资本从来就是统治一切、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总



統”，只不过是执行其意旨、维护其利益的忠实奴仆。不論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还是民主党的杜魯門和肯尼迪，也不論他們打着什么样的招牌，摆出什么样的姿态，或者玩弄什么样的花招，归根到底，他們都是一家兄弟，都是壟斷資本捏在手里的工具。任凭是誰上台，他們都只能是执行服从于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約翰遜当然也不例外。

战后以来，美帝国主义仗恃它在战争中大大膨胀起来的經濟和軍事实力，一直把夺取世界霸权作为它的战略目标，疯狂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走到美帝国主义的願望的反面。它越是进行軍事冒险，就越是激起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更加暴露了自己，孤立了自己，削弱了自己。到一九五九年，甚至连杜勒斯这样頑固的“冷战騎士”也不得不承认，光靠武力的一手不可能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必須把“和平”的一手也同时运用起来。

肯尼迪接受了杜勒斯的教訓，制訂了一套所謂“和平战略”，大肆玩弄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但是，他的处境也不比杜勒斯好，历史的潮流并没有如他所說的那样“順着我們走”。不到三年時間，这个搖晃着橄欖枝的宪兵头子，就在美国内外矛盾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被刺身死。作为肯尼迪的继任者，約翰遜不得不面对着一个到处都籠罩着阴影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約翰遜继承了肯尼迪的衣鉢，并且把肯尼迪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推行到更加疯狂、更加冒险的程度。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对美国壟斷資本的无限忠誠，证明自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最坚定、最可靠的执行者，并以此博得了美国壟斷資產階級的欢心和信任。

但是，約翰遜政府同它的前任一样，依然扭轉不了美帝国主义日益衰敗的命运。世界形势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正在日益猛烈地冲击和动搖着帝国主义殖民統治的基础，而帝国主义陣营却由于尖銳的利害冲突，分崩离析，陷于一片混乱。美帝国主义本身更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日子很不好过。所有这一切，用美帝国主义分子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糕”，美国不仅“在如此之多的地区里感受到如此之多的压力”，而且“在世界各地受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凡是可能出毛病的地方几乎都出了毛病”。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美帝国主义既然在全世界橫行霸道，以世界人民为敌，这就必然要越来越深地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現在，世界人民斗争的主要矛头都指向美帝国主义，一个世界范围的反美攻



势正在形成。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众矢之的”，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它的处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孤立，它的统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稳，它的国际地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落。

美国统治阶级面对着这种身陷重围、狼狽不堪的处境，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惊恐和慌乱。他们互相埋怨，互相攻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但是，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为这个病入膏肓的“泥足巨人”开出一付起死回生的妙方。深入骨髓的帝国主义本性，使这些吸血的魔鬼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他们大吵大闹一番以后，仍然不得不在反革命两手策略所产生的恶果中苟延残喘，妄图从加紧推行军事冒险和和平欺骗中，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就在这次竞选中，约翰逊毫不掩饰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帝国主义的这一战略意图。

他宣称，要“采取更富于挑战性的方针”，“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就像肯尼迪在古巴所做的那样来“坚决保卫自由”，绝不放弃“在世界各地的前哨阵地”。

他宣称，要“继续保持、增加和加强”战争准备，要“以实力为后盾”，“在必要时使用全面力量”从事一切战争；并且威胁世界人民“不要对美国的决心或美国的意志作出错误的估计”，“必须尊重（美国的）这种实力”。

约翰逊当选以后，立即用自己的行动来

实现他的这一“决心”，最近他在刚果（利）和印度支那所发动的军事冒险，就充分证明，这个政府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铁一般的事实表明，约翰逊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战政府，比起它的前任来，它具有更大的疯狂性和冒险性。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和平合作”，竟丧心病狂地吹捧这个双手沾满世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什么“明智派”，要人们同他们一起，匍匐在约翰逊政府的战旗下顶礼膜拜，祈求福祉。这真是荒唐透顶！无耻透顶！

新任的约翰逊政府就要上台了，不管它还要玩弄什么骗术，也不管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为它捧场叫好，披着羊皮的狼终究是一只狼，绝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东西。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刻地懂得，对于美帝国主义这样狡猾、危险的敌人，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斩断它的魔爪，拔掉它的毒牙，保卫住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同志最近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指出：“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这是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一个极其深刻的科学论断，它已经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响应。可以断言，在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空前高涨的新形势下，约翰逊政府必将遭到比它的前任更加惨重的失败。



# 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到第二十四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总页码)

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  
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3-24-9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15·631)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新闻公报..... (20·8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20·844)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 (20·847)

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  
转达我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  
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的建议..... (20·848)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  
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3·55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14·58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6·683)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  
中央的信 ..... (14·597)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给中共  
中央的信 ..... (16·686)

社论: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21-22-883)

## 学习毛泽东思想

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閻卿澗 (23-24-936)

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 搞好  
管理教育.....王玉文 (23-24-948)

一分为二是促进生产革命的思想  
武器.....王升堂 (23-24-954)

“合二而一”就是不要革命.....张子成 (23-24-957)

从农村阶级斗争看“合二而一”论  
的反动性.....黄学诗 (23-24-958)

战略上以一当十, 战术上以十  
当一.....李作鹏 (23-24-961)

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课题.....徐非光 (17-18-773)

反面教材不可不读.....陈展超 (17-18-775)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五周年

社论: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  
帜前进! ..... (19·799)

革命风雷.....曹 禺 (19·805)

战斗的社会主义文学.....刘白羽 (19·808)

科学技术工作的革命化.....李四光 (19·812)

受革命化教育的十五年.....周培源 (19·816)

学习毛泽东思想, 做好气象工作  
.....顾震潮 (19·819)

在建设事业中贯彻革命精神.....李瑞环 (19·822)

身居茅屋, 眼观全球, 脚踩污泥,  
心怀天下.....董加耕 (19·826)

永远做彻底的革命派.....黄祖示 (19·827)

在贫农下中农中扎根.....张 朝 (19·831)

## 国内政治

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宋任穷 (20·850)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

任务.....安子文 (17-18-739)

**社論：培养接班人是革命事业的**

千年万年大計..... (14 · 620)

站住脚跟，永不褪色.....原 冰 (20 · 876)

一絲不苟.....苏 星 (20 · 870)

論小事和大事.....徐道河 (20 · 872)

革命责任心和责任制相結合.....李智盛 (20 · 874)

**资产階級思想批判**

**哲学战线上的新論战**

——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

論的討論报道 ..... 本刊报道員 (16 · 689)

**通訊：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张启勋 (17-18-752)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燴.....陆 鋒 (21-22-895)

过渡时期沒有阶级斗争嗎? .....洗光位 (21-22-907)

敌我矛盾不容調和.....俞建平 (21-22-911)

英雄事迹从哪里来? .....李小林 (21-22-915)

駁“和平轉变”論.....陈瑞苗 (21-22-917)

評周谷城艺术观的哲学基础.....汝 信 (15 · 662)

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檜、贊成投

降、詆毀主战派的.....金应熙 (17-18-759)

文艺理論陣地上的革命精神和

反动精神的斗争.....文文宜 (20 · 855)

怎样看待妇女問題.....万木春 (20 · 865)

西方基督教神学是怎样为美帝国

主义服务的.....楊 真 (21-22-920)

**哲学 · 社会科学**

实用主义經驗論的主观唯心主义

实质.....汝 信 (17-18-788)

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孔 繁 (16 · 722)

学习列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

作的方法.....黃宗汉 (17-18-763)

**經 济**

放手发动群众，正确地领导农业

的技术改革.....王任重 (16 · 694)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針.....李成瑞 (16 · 703)

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許辛学 (16 · 708)

評介三本經濟史料书.....(17-18-778)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民族工业的

命运.....王 城 (17-18-779)

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沙为众 (17-18-782)

私营商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典型調查.....徐道河 (17-18-785)

讀者与作者：农业向集約化方向

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 (14 · 626)

**文学 · 艺术**

在京剧現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彭 真 (14 · 604)

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

服务.....柯庆施 (15 · 633)

为革命的京剧現代戏欢呼.....陈其通 (15 · 653)

坚决将京剧革命进行到底.....李 琪 (15 · 657)

坚持革命方向.....王朝聞 (16 · 726)

更好地为下乡上山的知識青年塑

像.....牧 惠 (19 · 834)

**国 际**

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設的伟大十年.....朱其文 (14 · 611)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

进.....許建国 (21-22-891)

全世界人民同声討伐美帝国主义

侵略刚果(利)的滔天罪行

.....本刊評論員 (23-24-933)

約翰逊政府是个什么貨色.....郭济洲 (23-24-978)

美国垄断資本与原子軍事工业... 修維仁 (15 · 673)

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

美洲石油資源的最大掠夺者... 施經緯 (16 · 711)

